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陳芳明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light gray watermark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ogo. The logo is circular with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國立政治大學' around the top an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round the bottom. In the center is a stylized emblem with the characters '政大' (Chengchi University) inside a cloud-like shape.

鹽分地帶文學的政治與美學
——以《吳新榮日記》的閱讀為中心

研究生：陳奕伶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中文摘要

本論文研究的時空範圍自一九三〇年代日治時期起始，至二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約 1967 年)為止，以吳新榮日記(1933-1967)的閱讀為中心，擴展至鹽分地帶的政治思想、政治活動、地方派系等政治議題，與鹽分地帶所形成的文學團體、文學理念、創作手法等美學問題。在探討吳新榮的思想部分，首要關注的是吳新榮的左翼思想脈絡。本文將從吳新榮的成長背景開始介紹他的思想淵源，敘述他留日期間接受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啓蒙，進而與左翼社會運動接軌，形塑鹽分地帶文學集團的寫實風格。其次，吳新榮在戰後一度面臨國族認同的問題，本文對於參戰立場的態度將進行討論；另有語言轉換的困難、遭遇二二八事件逃亡歷程，對他打擊甚鉅，影響他於戰後轉入鄉土文獻考察的工作。而其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二二八事件等重大史事，皆為特殊的生命經驗，對於研究日治時代的台灣戰爭史，或是戰後作家的心理轉折分析，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日治時代、鹽分地帶、寫實文學、國族認同、二二八、鄉土文獻

Abstract

The time span in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 1930s to around 1967 when KMT took over Taiwan. The main focus of the thesis centers around Wu, Xin-rong's diary and extends to such political issues as political thinking,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local factions in Salt Zone. The thesis also deals with the aesthetic scope of literary circles, literary ideas, creation methods, and so on. When Wu, Xin-rong's thinking is researched into, the main concern is his left-wing ideology. The thesis will start by introducing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n narrating the enlightenment he acquired from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while he was studying in Japan. His thinking later fit in with left-wing social movement and was shaped into the realistic styl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terary groups in Salt Zone. Moreover, as far as his national identity is concerned, this thesis will have a discussion about his attitude towards WWII. Furthermore, the difficulty of language conversion after war and being an exile from 228 incident were both a merciless blow on him, which motivated him to investigate into documents of country culture. Such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as WWI, WWII, and 228 incident become his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which has a very profound meaning for him as he conducts research on Taiwan war history in 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analy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fter-war writers' psychology.

key words: Japanese colonial era, Salt Zone, realistic literature, national identity, 228 incident, documents of country culture

目錄

第一章 序論	0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0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04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	06
第二章 吳新榮成長背景與思想淵源	08
第一節 家族背景與土地經驗	08
第二節 吳新榮的思想歷程	12
一、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啓蒙	12
二、吳新榮與左翼政治運動的銜接	15
第三章 日治時代台灣文壇的掙扎與反彈	20
第一節 單一文化的灌輸與自我意識的覺醒	20
一、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	20
二、覺醒的力量—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與轉型	23
三、日本政府的教育政策與文化策略	27
(一)台日共學制	27
(二)日本統治階層拉攏舊文學	29
四、仕紳階級與民間底層的文學社團創作路線	30
(一)傳統文化的存續	30
(二)西方現代文學思潮來襲	32
(三)左翼文學的萌芽與擴展	33
第二節 戰爭時期皇民化運動下民族自覺的努力	35
第四章 吳新榮與鹽分地帶文學流派	44
第一節 鹽分地帶文學創作理念	44
一、「鹽分地帶」的定義與形塑	44

二、與機關雜誌的往來	51
(一)《台灣文藝》	52
(二)《台灣新文學》	53
(三)《民俗台灣》	54
(四)台灣新民報系	55
三、與革命家的往來	56
四、作品文字使用的問題	57
第二節 吳新榮的文學觀	61
一、寫實主義的理論與落實	61
二、社會主義思想與鹽分地帶文學的結合	62
(一)對殖民統治的批判	63
(二)抵抗資本主義潮流	64
(三)社會改革的發聲	67
三、鹽分地帶文學中的鄉土意象	68
四、與風車詩社的對照	69
五、鹽分地帶文學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定位	73
第五章 吳新榮作品分析	75
第一節 戰前作品分析	75
一、詩歌內容中的戰鬥意識	75
(一)〈題霧社暴動畫報〉	75
(二)〈不但啦也要啦〉	78
(三)〈農民之歌〉	79
(四)〈煙囪〉	81
(五)〈疾馳的別墅〉	85
二、日記的出版—〈亡妻記〉	87
第二節 戰後創作轉向與政治、文化意識之衝突	91

一、語言轉銜與國族認同	91
二、戰後的政治處境與遭遇	94
三、左翼文學的實踐：鄉土文獻考察	95
四、新舊版本日記的對照—以「參戰立場」及「二二八事件」為主	99
(一)參戰立場	99
(二)二二八事件	101
第六章 結論	106
附表	109
參考文獻	113



第一章 序論

日記是生活的寫照，
日記是心靈的過濾器；
日記是遺留給子孫的悲歡記錄，
日記是樸質無華的人生檔案。

吳新榮〈逝去之春〉¹卷頭語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鹽分地帶，是我土生土長的故鄉。然而這個名詞，直到我負笈北上，才在課堂上第一次聽到。我的父親是將軍鄉馬沙溝人，母親是佳里鎮番仔寮人，而我是佳里人，但是父母、長輩從未提過鹽分地帶的相關人物或事蹟；從小到大所讀的國文課本、歷史課本也從來沒有介紹過吳新榮這個名字。當我遠赴他鄉求學，聽見故鄉的名不斷被喚起，而在一次次翻閱家鄉歷史資料中，我才明白：原來我唱了六年的國小校歌歌詞是吳新榮所寫、我每天反覆踏過的延平路、中山路是吳新榮所命名。在我生長的地方，發生過武裝抗日、社會運動、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戒嚴，而後走到解嚴。我出生的時代是民國七十二年，台灣尚未解嚴，距離白色恐怖時期並不遠，但為什麼我對這些歷史的記憶如此貧乏、片面、瑣碎不堪？我甚至不知道，童年時期跟著外婆祭拜阿立祖，原來是珍貴的原住民文化資產；也不知道荷蘭井就在外祖父的墳墓附近；更不知道番仔寮有程天與這一號「飛番」人物的存在……這些知識不是來自於學校教育，也不是來自長輩的口耳相傳，而是來自於吳新榮的鄉土考察文獻。我想知道，為什麼一個關心底層人民、反抗強權政府、組織地方知識分子、創作大量文學作品、深入研究家鄉歷史的，課本卻

¹ 吳新榮：《震瀛隨想錄—亡妻記：逝去之春》，1978年3月27日重版，瑋琅山房發行，頁73。

對他隻字未提？家鄉的人們似乎也快遺忘他？後來，我到佳里鎮立圖書館查閱《佳里鎮誌》，發現地方重要人物欄位竟然沒有吳新榮，也沒有其他北門七子等人，面對這樣的結果，我只有心冷，默默闔上《佳里鎮誌》。然而，我意識到手中緩緩關上鎮誌的同時，心底也悄悄開啓了這本論文的研究動機。

吳新榮的思想與文學印證了殖民地台灣現代化的過程。他赴日習醫，卻全然不受殖民者的價值觀所影響，這正是他在近代不斷受到學術界討論的主要原因。醫學是現代化的科學知識，是所有殖民地社會最早接觸現代化的思想；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毅然參加左翼政治運動，大量吸收社會主義思想。他爲了所追求的左翼批判精神付出極大代價，不僅遭到警察逮捕，而且長期受到高等特務的密切監視。但幾次被逮捕的經驗，從未使他退卻，不僅完成醫學訓練，而且也決定返鄉服務。作爲左派知識分子的吳新榮，在故鄉經營佳里醫院之外，也號召同鄉的文學愛好者，從事新詩創作的活動。然而這些重要的史事，被政府、社會忽略，連土生土長如我都不知道故鄉發生了這麼多令人熱血沸騰的事蹟。

在整個日治時代的社會中，吳新榮可能是少數留下豐富日記書寫的其中一位，他思想的幽微變化，文學的細緻營造，以及社會關懷的實踐，都相當完整記錄在他的日記裡，經過將近三十年的編輯、翻譯，終於宣告問世，這部保留豐碩記憶的史料，如今已經成爲台灣文學史、醫學史、現代化歷史的珍貴寶物，可供後人挖掘，成爲深刻的殖民地歷史經驗。從前所有投入吳新榮文學研究的成果，並沒有機會接觸這份珍貴的文獻，這篇論文便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嘗試從吳新榮日記中挖掘更細緻，不爲人所發現的重要心路歷程，或許可以填補過去研究者未曾探索的議題和領域。

吳新榮現存的日記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以日文書寫而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台灣光復後，翌日起即以中文記載，書寫語言的轉換代表政治環境的改變，也嶄露他的意識形態。在他的日記中，包括國際時事、政治觀點、來往友人、醫學新知、科技發展、藝術欣賞、家族情感、乃至日常生活瑣事都有詳細的記載。而吳新榮日記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人的日記，是因爲吳新榮

以知識份子的獨有的觀察和熱愛鄉土之心，寫下他橫跨兩個時代的所知所感；再者，吳新榮與鹽分地帶深厚的地緣關係，不僅表現在文學領域上，還包括晚年全心投入的鄉土文獻之研究。既以鹽分地帶為題，吳新榮的日記便位居首要的研究資料。

「日記」本身作為一種文類，在台灣歷史的脈絡中應視為重要的佐證資料，它代表某個人，或者某個族群、某個社會階層的觀點，而且往往不同於官方的歷史記載，是另一種歷史詮釋的角度。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當代知識份子的日記或書信往來，都是時代的側寫紀錄。因此本文以吳新榮日記的閱讀為中心，擴展至鹽分地帶的政治思想、政治活動、地方派系等政治議題，與鹽分地帶所形成的文學團體、文學理念、創作手法等美學問題。研究人物的生命經歷乃至於精神思想，皆可從日記中一窺究竟；值得注意的是，日記的主觀性甚強，研究過程中必須與歷史加以對照，以客觀知識貫通時代與事件，並詳察相關人物彼此間的認同或對立；若涉及難言的隱喻筆法，或經由吳新榮本人塗抹導致無法辨識的人名，甚至為了保全身家性命故說反話的情況，則需要更細緻的分析與判斷，才能篩選出接近事實的原貌。而這又牽引出另一項問題：如果無法直說，那麼吳新榮的日記是否存有預設觀眾之心理與立場？歷史上不乏欲把日記作為史料或預備傳世之例，故從史料價值的角度觀之，日記可畫分成：準備日後公開、不願公開、部分公開成為文學篇章(如吳新榮的〈亡妻記〉)、偽造、特定時代的違心日記等，尤其大人物的日記更容易出現曲筆或諱飾。吳新榮作為一個跨時代的醫生作家，在政治敏感時機仍堅持撰寫日記，是否有意將日記留給後世觀看？或者完全相反，為了防備日記被搜查成為不利自己的證據，因此寫完後又有塗抹。關於讀者預設的問題，不僅影響日記裡某些內容的可信度，更可能突顯了當時知識份子掙扎的心態。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七〇年代《夏潮》雜誌於一九七七年特別發行「吳新榮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專集」，刊載張良澤撰文〈吳新榮先生傳略—為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而寫〉、楊達撰文〈追思吳新榮先生〉、吳南星撰文〈父親的生平軼事〉，屬於介紹吳新榮生平之作。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吳新榮選集》收錄巫永福〈吳新榮兄二三事〉；另外鹽分地帶同人的作品中其中也有追憶吳新榮的文章，如：郭水潭撰寫〈從「鹽分地帶」追憶吳新榮〉。這類文章平面地敘述、追思吳新榮生平事跡，但未能深入賦予一個人物之時代意義。

八〇年代，張良澤主編的《吳新榮全集》出版以後，羊子喬的《蓬萊文章台灣詩》和王曉波的《台灣史與近代民族革命》相繼出版。²羊子喬介紹鹽分地帶詩人的文章標題，以「熱愛鄉土」形容吳新榮，王昶雄也以「愛鄉志士」刻畫之，相對於《夏潮》以「熱血愛國」來形容吳新榮，顯然表達了不同的意識形態。³

九〇年代出版的《吳新榮選集》收有各篇探討吳新榮作品的文章。包括：陳芳明〈吳新榮的左翼詩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個轉折〉以帶有國際色彩的左翼青年之觀點，分析吳新榮的文學創作具有階級問題及民族主義兩層重疊色彩，回歸本土意識；呂興昌〈吳新榮「震瀛詩集」初探〉一文，找出失落的《震瀛詩集》，針對詩集中收錄的篇章詳細分析，探討作品中所呈現的台語詩(漢詩)、左翼詩觀與對戰時體制的反應，擴充了關於吳新榮文學創作的研究。黃琪椿〈農村與社會主義思想—吳新榮日治時期詩作析論〉由社會主義的觀點出發，分析戰前詩作中的戰鬥意識及熱愛土地、人民的情懷，並依此定義吳新榮為農村社會主義者。林慧姪〈吳新榮的精神歷程—以文學創作為中心〉是繼《吳新榮研究》之後的文章，將創作階段分為四期，但只停留於史料介紹。葉石濤〈吳新榮文學的特色及其貢獻〉認為吳新榮在思想方面屬於亦左亦右、不左不右，不排斥左傾作家和作品；

² 林慧姪：《吳新榮研究》，台南：台南縣政府「南瀛重要作家研究文集」1，2005年，頁17。

³ 施正鋒：〈語言政治與政策·語言的政治關聯性〉，前衛，1996年，頁17。

然探究青年時期的思想、政治活動，和後來鹽分地帶時期與左派份子的交遊狀況，吳新榮的確是左派份子。

王曉波〈論吳新榮和他的思想〉以民族主義闡釋吳新榮的思想背景，將吳新榮與日據時期受日本殖民教育的知識分子，視為當代第三世界自覺的知識份子的先進典型。⁴當時留日的台灣知識份子吸收了近代日本與西方的文化觀念，但王曉波只篩選了吳新榮的民族主義思想成份，至於早期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則被轉移了。陳芳明另外二篇〈吳新榮與日據時期左翼文學〉、〈台灣左翼詩學的掌旗者——吳新榮作品試論〉收入專書《左翼台灣》，本書為陳芳明之論文集結，內容主要針對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文學的探討，並指出左翼思考一直存在於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文學創作裡，除了具備社會主義色彩的文學，其重要特色更表現於作家的抵抗心靈與批判精神，透過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表達了台灣社會底層最深沉的抗議。陳芳明透過「左翼詩學」的觀點詮釋吳新榮，相對於之前的研究者，更有力地標舉出吳新榮作品的中心思想，並指出台灣文壇於三〇年代受世界普羅文化思潮的影響，吳新榮戰前的詩歌呈現出「弱小民族的聲音」及「本土意識」的特色，對以吳新榮為首的鹽分地帶文學集團予以高度肯定，為往後的研究者指引了明確的研究途徑。

專書方面有曾士榮的 *From Hontojin to Bensheng Ren*，是最早研究吳新榮日記手稿的著作。本書以陳旺成及吳新榮的日記手稿剖析台灣人的國族意識，從政治及環境背景著手進行研究，認為二次大戰對國族認同的影響遠大於皇民化運動；並以數據性的實證方式分析吳新榮的族群意識。另外，施懿琳撰寫的《吳新榮傳》，耙梳了吳新榮各時期的思想與創作關係，並將日記提及的政治活動與家庭生活做了相當詳細的整理與介紹。

學術論文部分則有林慧姪《吳新榮研究——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相當詳細地介紹吳新榮思想、文學及政治活動，傾向資料整理及片面式的闡述，對於當代知識分子的心理轉折尚未有更深入的分析。鄭雅黛《冷徹的熱情者——吳

⁴ 王曉波：《台灣史與中國近代民族運動》，台北：帕米爾，1986年，頁6。

新榮及其作品研究》從吳新榮的思想背景出發，著重探討文學作品中的新詩、隨筆、回憶錄，並未包含日記的相關研究。除了〈亡妻記〉是日記中唯一出版的部份，其餘並未提及。

其他篇章如：王昶雄〈吳新榮的志節標誌—紀念塑像該豎立的〉，談了吳新榮戰前的文學作品〈亡妻記〉，及戰後創作本色是以「南瀛文獻」為主軸，未提及其他類型的作品。高坂嘉玲〈失去之後，才知道是愛〉偏重於吳新榮的家庭生活、傳田晴久〈《吳新榮日記》讀後感〉以日本觀點解讀台灣仕紳與日本政府的關係、松田良孝〈由《吳新榮日記》看沖繩人的疏散體驗〉談日人疏散至佳里地區的事實，並論及吳新榮以醫生觀點談瘧疾、環境衛生的看法，屬資料性質的整理。

綜觀前人研究成果，多集中於吳新榮在日治時代的思想、作品之研究，戰後作品僅止於討論文獻考察與地方志之部分，故本文嘗試以其日記為主線，搜索吳新榮的思想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並藉此討論戰前、戰後的時代變化，予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衝擊。而吳新榮與鹽分地帶文學流派之關係，對台灣文學又構成何種程度上的影響？將成為本文討論之重點。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限制

本文將以張良澤所編的十一冊《吳新榮日記》⁵為閱讀中心，探討鹽分地帶的政治與美學。這套日記是二〇〇八年由台灣文學館出版發行，距離一九八一年舊版日記的出版年份，前後相差二十七年。舊版日記出版時台灣尚處在戒嚴時期，許多敏感議題不允許被討論，因此舊版刪去許多內容，致使新舊版本在內容

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十一冊，台灣文學館，2008年6月初版一刷。

上有相當大的差異。本文所依據的日記版本，新版即以張良澤編譯，台灣文學館於二〇〇八年發行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十一冊為主；舊版以遠景出版社於一九八一年發行的《吳新榮全集》卷六《吳新榮日記(戰前)》、卷七《吳新榮日記(戰後)》為主。這二套日記是本文的研究主線，從日記裡探知吳新榮的政治立場如何影響他的文學創作觀點。吳新榮的文學作品種類繁多，包括新詩、散文、自傳、文學評論……等，皆為豐富的研究素材，與他同時代的作家作品，如郭水潭、林芳年、莊培初、徐清吉、王登山、林清文等人亦在研究範圍之內；文學社團方面則有出身於鹽分地帶的詩人楊熾昌，於一九三三年創辦風車詩社，移植法國的超現實主義，恰好與鹽分地帶的寫實主義相輝映，本文將一併比較，以共時性研究進行各作家全集式的閱讀；並採訪地方耆老，如吳新榮次子吳南圖、主編鹽分地帶文學期刊的林佛兒。此外，再以歷時性的研究，從台灣文學與政治、歷史的發展關係，探討鹽分地帶文學流派的創作理念及構成背景，探究左派文學發展的原因。至於吳新榮所接觸的社會主義思想，奠基於於國家、種族、人民之上，本文對於社會主義思潮興起的時代背景及發展，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將進行介紹，探討其對吳新榮產生何種影響。因此在章節安排上，先介紹吳新榮的成長背景與思想淵源，再談他面對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以帶領鹽分地帶文學流派與之對抗。在探討他的思想脈絡過程中，日記內容恰可補足文學作品背後的創作理念。

不過，吳新榮赴日求學期間的日記，因四一六事件被日警全數沒收，對於青年時期的思想研究，僅能從當年日警審訊的口供去了解，由於口供內容全為日文，尚無中文譯本，造成研究上的困難。再者，口供內容在審訊過程中是否能完整呈現真實的思想？可信度也尚須持保留態度。留日時期正好是吳新榮接收各方新知、新思潮最豐富的年代，但關於這時期，卻僅能從零星片段的資料逆推他對當代時事、人物的看法，是本文無法突破之處。目前吳三連基金會保存了留日期間吳新榮所閱讀的雜誌封面影本，可做為研究他左翼思想的參考。

第二章 吳新榮成長背景與思想淵源

第一節 家族背景與土地經驗

吳新榮，原名春榮，自號震瀛、蘆溪、夢鶴、史民、兆行、延陵生。出生於西元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年)，登記的出生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⁶，出生地在台南將軍庄。

祖父吳玉瓚是白手起家的大商人，在家族中地位崇高、目光精準、影響力深遠。他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經營事業更顯其手腕高明。在雜貨店「協吉號」初具規模後即開始多角經營，先後設置釀酒廠、糖廊，富甲一方。日本政府投資糖廠後，台灣經濟走向資本主義化，原先以人力為主的糖廊終究敵不過機械生產的糖廠，從此吳玉瓚只能收起糖廊，轉買土地魚鹽，農商並進；並擔任漚汪區長，藉由參政掌握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力。

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期間物價飛漲，吳玉瓚投資失利；戰後的經濟恐慌又連帶影響家業，吳玉瓚只得歸鄉賣地，財產為之一空；父親吳萱草則投入農場作苦力。吳萱草本是吳玉瓚的螟蛉子，具有詩人氣質，個性浪漫而不善經營。吳玉瓚本欲栽培吳萱草經商，然而吳萱草的文學興趣遠大於經商。他十歲開始讀四書五經，學會作詩填詞，二十歲從台南糖廊賬房許景山學詩；吳玉瓚擔任漚汪區長後，網羅了許多優秀人才前來，比如學甲吳乃占、西港王克明、學甲吳克讀、北門王大俊⁷等人，吳萱草與之交遊，感情日深。其中王大俊又為著名的漁村詩人，在許景山與王大俊的薰陶下，吳萱草的文學根基深厚。家族事業衰敗後，吳家經濟陷入困頓，當時吳新榮的叔叔吳本立就讀台北醫專，吳新榮則就讀台南商業學校，

⁶ 鄭喜夫：《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台中縣潭子鄉：鄭喜夫，1977年。據本書於民國24年9月29日記載，吳新榮實際出生日期是「明治40年新曆10月12日，舊曆9月6日。」因當時有「臘旬」習俗，滿月後才登記戶口，故出生日期登記為11月12日。

⁷ 施懿琳：《吳新榮傳—臺灣歷史名人傳》，台灣省文獻會，1999年初版，頁6。

二人的學費、住宿費、生活費常發生問題。

吳新榮在六、七歲時就到祖父家裡幫忙，放學後要牧牛、割草、巡田，巡園後要報告人畜的損失，收穫時要去看收割的情形。此外還要幫祖父洗水煙吹、痰壺、尿桶，以食鹽清理祖父痰中的血。還時常跟著祖父到台南市做生意，因祖父曾被蔗葉傷及眼睛，導致雙眼皆盲，故吳新榮必須每天念報紙的行情給祖父聽。⁸幼時的經驗讓他深切體會創業守成之艱辛，比一般同齡小孩早熟、冷靜，見識也更廣闊。當吳新榮就讀台南商專時，正值家道中落，十四歲的他初嘗貧窮滋味，與同學間的貧富差距對他造成內心劇烈的衝擊，在他的自傳中曾提到：

夢鶴的同學不是名家的公子就是各地的秀才。和這樣公子秀才同宿於一個學寮，這給剛自鄉下來的窮村童，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是很大的刺戟。…這個少爺……偏要叫夢鶴做奴才。但是夢鶴不是那樣乖巧的奴才，尤其對「草狸」這樣蔑稱，他感覺非常的恥辱，心內已對這樣阿舍(少爺)們萌出厭惡的感情。⁹

這段因貧窮而受辱的經驗對吳新榮造成心理上的傷害。財富、地位本無罪，但在吳新榮年幼的心靈已蒙上了另一層象徵意義：它與強權、霸道、壓迫產生連結。尤其貧窮的學生在學校中若只有少數人，更容易使這群少數人的聲音逐漸被湮沒，自尊受到屈辱。或許這樣的經驗引發他往後厭惡霸權的心情，進而願意替弱小族群發聲，選擇服務貧苦大眾，而終致走上社會主義之路。

貧富差距不僅深化了吳新榮的內在思想，即連外在的職業選擇也受到影響。當時日本政府的人事任用依民族做區分，官方高層一律聘用日本人，才能出眾的臺灣人只能屈居下位。在這種情況下，從事公務永無高升之日，若從事商業則可能因政令而一夕破產。再者，日本治理台灣的過程，無不展現了新時代的科學，

⁸ 鄭喜夫：《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頁 8。

⁹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三《此時此地》，台北：遠景，1981 年，頁 53。

如：金融操作與管理的新思維、製糖會社的運料火車、嘉南大圳的灌溉系統……這些在吳玉瓚的眼前不斷發生，因此他認為，必須順應新時代的科學才有機會重振家族。當時代表科學新知的幾項職業當中，祖父吳玉瓚認為「醫生」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可以濟世利人，可以保護家庭」¹⁰，即使吳氏家族日後承受莫大的經濟壓力，仍極力培育子孫朝醫界發展，可說是這種觀念的延續，吳新榮及其叔父吳本立正是在這種期望下選擇了醫業。

日治時期的醫生除了象徵崇高的社會地位，還象徵了科學新知的接受者。由自然科學投入社會科學的例子，除了吳新榮之外，尚有蔣渭水、賴和、王昶雄、詹冰、陳遜仁、周金波……等。以台灣而言，醫生在當時具有社會領導階層的象徵意義，因為醫學代表新科技、新知識、新觀念，出國留學也必然認識世界潮流。他們除了具備清晰的頭腦與專業知識，更心繫台灣人民的命運，為理想投入大量心力、時間、金錢，從事政治、社會、文化運動，有些甚至不惜拋棄優渥的經濟與美好的家庭生活而入獄或逃亡。

吳新榮從醫是為了負擔家計，真正的興趣卻在於文學。吳新榮的文學興趣或許是遺傳自父親吳萱草，早年吳萱草曾自組詩社，名為「白鷗吟社」，日夜擊鉢——雖有相當成就，卻未傳授吳新榮一字一句的漢文，因此吳新榮的漢文底子是靠自學而來，可見其優秀的語言天份。

他所立業的佳里地區人文薈萃，出現許多詩人、作家。一九三三年，吳新榮與當地青年共同創立了「佳里青風會」，這是一個地方性質的文學團體，期望能提升佳里青年學子的學習風氣。其後，大部分志趣相同的成員又另組文學團體，即以吳新榮為首的鹽分地帶文學作家群，尚包括：郭水潭、徐清吉、王登山、林精鏐、陳培初、鄭國津、葉向榮、黃清澤、莊培初、黃炭、曾對、黃平堅、郭維鍾、陳挑琴等人，設立了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由此匯入台灣文學的洪流，形成貧困之地而學風鼎盛的特殊現象。這一連串的行動，代表吳新榮希冀鹽分地帶

¹⁰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三《此時此地》，頁 37。

在台灣文學裡佔有一席之地，相較於其父吳萱草創立詩社與詩人交遊，吳新榮顯然將更多心力投注在培育後起之秀，努力將文學種子扎根於鹽分地帶。至此，吳新榮與其父最終走向不同的文學風格，文學不再只是吟風弄月的案頭之作。他把文學與生活二者結合，以關懷人民、注意時事為主，抒發個人所思所感，朝向寫實主義的創作。某些作品中爲了更貼近群眾的心聲，選擇使用台語，如：〈題霧社暴動畫報〉、〈故鄉的輓歌〉，詩句直抒胸臆，因而念起來親切自然、情意真摯。

寫實主義立足於生活，必然關懷社會、民眾與鄉土文化等議題。日治時期的將軍(吳新榮出生地)、佳里(吳新榮立業地)皆屬於北門行政區，此區尚包括：西港、七股、學甲、北門，共有六街庄，古稱鹽分地帶。鹽分地帶因土地濱海，含鹽量高，不利農業發展，多數人民從事漁業維生，困頓艱辛，長期以來必須克服先天惡劣的環境，與瞬息萬變的天象、大海搏鬥；由於濱海，常成爲外族登陸入侵的入口；加上地勢低窪，每年夏季定期的風災常造成海水倒灌，家具泡水腐爛，漁塢水漲魚流，財物損失無法估計。環境艱困，生活不易，但也在無形中造就當地居民樂觀奮鬥、豪邁不屈的性格，這樣的環境對吳新榮堅毅奮鬥的個性養成深具影響。在他早年的文學作品中，到處可見充滿戰鬥意識的作品，如：〈題中山全集〉、〈題霧社暴動畫報〉、〈呈南方的青年〉、〈新生的力量〉、〈巨人〉、〈躍動〉、〈故鄉的輓歌〉等詩，這些作品的誕生，除了生長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裡，因而激盪出熱烈的火花之外，更大的因素是吳新榮有著天生不屈服的性格。面對外在環境的巨變，他一手執刀從醫、一手執筆爲文，以濟世的理念行世。他的力量來自於土地，而吳新榮後來帶領鹽分地帶文學的發展，晚年全心投入文獻考察活動，不僅是對土地抱有深切的期望與熱愛的情懷，也是他回報鄉土的方式。

第二節 吳新榮的思想歷程

一、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啓蒙

面對日本政治、經濟高壓獨裁統治，民族主義必然是最初的情緒。日本據台之目的，並不僅在於擴張其勢力範圍，更主要的目的乃在於榨取豐富的資源，以追求巨額的利潤¹¹。更明確的說，日本以武力進行對台土地的侵略、以種種手段對人民進行剝削，是商業經濟的掠奪，其概念類似於「東印度公司」。只不過「東印度公司」是由貿易走向政治，從「公司」逐漸發展成「國家」性質；而日本對台灣，則是以政治全權掌控經濟，以「國家」法制進行「公司」活動。

自吳新榮出生(一九〇七年)以來，新竹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羅福星事件(苗栗事件)不斷，當時尚停留在武裝抗日階段，台灣人民普遍存在反日情結；直到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戰爆發，日本參戰，隔年發生「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掀起反日、抗日的熱潮。於是台灣與中國在情感上聯合對日，民族主義油然而生。當時台南的西來庵事件(礁吧岬事件)除了本身目的是反抗日本強權統治，實則也受著辛亥革命的鼓舞、日本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等諸多時代因素的刺激。吳新榮生長於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自然深受影響。西來庵事件發生時，吳新榮正轉入漚汪公學校就讀，時年九歲，在這似懂非懂的年紀，內心已懷有民族主義的熱情。直到一九二五年，吳新榮到金川中學留學時，他才發現並非所有日本人都是壓迫者。他在晚年回憶錄《此時此地》中寫著：「這裡的日本人和在台灣的不同，他們沒有統治者那樣高慢的態度，沒有支配階級那樣看不起台灣人。」¹²而且當時的金川中學校長服部純雄，還是受過美國教育的自由主義派，並不認同日本軍人的侵略行爲。

當時吳新榮與中國留學生有頻繁的接觸，常與他們到中華會館集合。某次前

¹¹ 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祕史—霧社事件至抗日全貌》，武陵出版，1995年5月，頁14。

¹²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三《此時此地》，頁68-69。

往聆聽孫文在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宣稱：「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¹³孫文指摘日本的帝國主義行徑，並提供亞洲弱小民族解放的大同理想，激發了台人追求民族平等地位的渴望。其後吳新榮便寫下此篇〈朋友啊！睨視那爭鬥的奔流〉，抗議日本侵華政策，自由主義派的校長服部純雄將這篇文章刊登於校刊《秀芳》第三十號的卷頭，吳新榮為此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在〈此時此刻〉寫著：「夢鶴的思想萌芽，到這時候，已經成長為嫩幼的雙葉了。」¹⁴這裡指的思想，指的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

然而某次參加鶴見佑輔演講，主題是談論威爾遜的新自由主義。當他聽見鶴見氏高喊：「不久的將來，日本在滿洲要再演一回的流血！」¹⁵方才認清鶴見氏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最終竟淪為帝國主義的招牌。年輕的吳新榮聽到鶴見氏的口號，無疑造成心理上的打擊，讓吳新榮對新自由主義徹底失望，思想的嫩葉至此不得不枯萎。鶴見佑輔素來崇尚強人政治、英雄政治，所著作的《俾斯麥》不僅明顯地表現了崇拜英雄人物的心情，書寫方式也若隱若現地透露出對於日本帝國的崛起，他寄予相當熱烈的期盼、興奮。吳新榮在一九四二年的日記裡提到閱讀此作，對這樣的作品並沒有給予很高的評價，只當作消遣閱讀的閒書。雖然仍是學生身分的吳新榮對日本所提的新自由主義感到失望，但值得慶幸的是他認清一個事實，就是各種主義都有機會被有心人士扭曲原意或過度延伸，最終導向偏激路線進而被利用。這一層重要的體悟，讓他養成謹慎思考的習慣：面對諸多思想、主義他意識到必須深入研究，認識核心價值，方能避免走向極端；另一個更大的影響是形塑他實踐各種主義的謹慎態度，往後吳新榮即使強調改革，也不同于激進的革命家。

¹³ 《大亞洲主義——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詞·孫中山先生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神戶高等女學校)，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3月。

¹⁴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三《此時此地》，頁72。

¹⁵ 同上註。

早在吳新榮進入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時，他已接觸當時日本的國木田獨步的國民主義、德富蘆花的自然主義、夏目漱石的現實主義等文藝思想。西方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前身即是現實主義，擅長對環境的變化鉅細靡遺逐一書寫，將入微的觀察力聚焦在現實世界裡，以細膩的筆調描摹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或心理環境。文學作品中這一脈相承的文學觀，在其後吳新榮所帶領的「鹽分地帶文學」社團上得到發揮。

吳新榮傳記中提及他在赴日期間，「還接觸了中國老子的虛無主義、孫文的革命主義等社會思想，這使吳新榮開始對祖父的功利主義與父親的享樂主義感到反感。」¹⁶，並反省自我對民族、社會的意義。前述的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創立於一九二一年，正是吳新榮畢業於滬汪公學校的那一年，期間發行刊物、設立讀報社，並舉辦各類講座，談論內容範圍極廣，舉凡文化理念、教育政策、社會改造、婦女問題、農村問題、世界大勢¹⁷均在此列，吳新榮就讀商業學校後，便時常與鐘濱到關廟聆聽文化協會講座，針對重要議題彼此論辯。當時文化協會成立之目的，是欲透過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提升台灣人民的思考，進而對抗日本殖民政權。除了邀請連雅堂主講台灣史和漢文、哲學博士林茂生主講西洋歷史外，身為醫生的蔣渭水也下場主講公共衛生。更有擔任律師或學有所長的會員主講法律和經濟學。從一九二一年創立算起，聽眾日趨增多，勢力之大，使田健治郎總督也不得不約見林獻堂與文化協會幹部。吳新榮受到文協講座的啓發甚深，不僅思考時代潮流對國家、民族、社會等影響，並關懷鄉土文化與大眾議題。早年他與蘇新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對他後來留學日本參加左翼運動，以及晚年所進行的鄉土風俗研究，都有深遠的意義。其中主講西洋歷史的林茂生，是吳新榮就讀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時最景仰的人，直到一九二八年吳新榮考上醫學院，再度踏上日本，此時他的心中已肯定社會主義的本質。

¹⁶ 施懿琳：《吳新榮傳》，南投：省文獻會，1999年，頁13。

¹⁷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年，頁127。

二、吳新榮與左翼政治運動的銜接

金川中學畢業後，吳新榮返台準備考試，於一九二八年考進東京醫學專門學校，開啓了留日的第二階段。

在這個階段，吳新榮先後參加了「台灣青年會」與「台灣學術研究會」。這二個組織左翼色彩濃厚，與台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當中蘇新雖無直接拉攏吳新榮加入左翼組織，但他本身是激進的左派革命份子，活躍於中國、日本、台灣三地的共產黨之間，在思想影響與交情上與吳新榮相當應合深厚。

吳新榮在第二階段留日期間所加入的「台灣青年會」，原本是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的「高砂青年會」，由最初成立的同鄉聯誼性質轉變為反抗日本統治的組織，成為「台灣革命人才的搖籃」¹⁸，如蔡培火、吳三連等都是當時的幹部。至於「台灣學術研究會」原是「台灣青年會」內部發生左右二派思想對立分裂而出的。學術研究會的前身原是台灣青年會中的「社會科學研究部」，一九二七年三月，由蘇新、許乃昌、黃宗壺等左派運動先驅者所設置，並有計畫的在青年會的選舉中取得領導權，右派遂告退出，青年會分裂。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政府下令禁止社會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部」便改稱為「台灣學術研究會」，實際上仍以原班人馬繼續進行台灣留學生間的共產主義活動。

最初，日本共產黨是在政府宣佈非法情況下所成立，曾遭檢舉而解體，一九二六年再度成立時，目標為「廢除天皇制」，隔年更進一步訂立對外關係綱領：「完全撤退朝鮮、中國、台灣、庫頁島的軍隊」，訴求「殖民地完全獨立」，與當時軍國主義政策背道而馳。一九二八年四月底，陳來旺從上海的「台灣共產黨」的建黨大會回到東京，立即成立了「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台共的分支機構，於是原以許乃昌為首的「台灣學術研究會」改由陳來旺領導。學術研

¹⁸ 林忠勝：《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台北：前衛，1994年，頁96。

究會的組織實則受到「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的幕後領導。而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又是受「第三國際」及「日本共產黨」的支援及指導。其目的是宣傳共產主義革命，擴展在日的台灣人革命組織，主張解放殖民地台灣，若有需要則派遣幹部返台協助。如林兌等返台支援島內的「台灣農民組合」，又如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台灣島內農民組合幹部被大逮捕時，立即派蘇新、蕭來福、莊守等返台協助重建工作等。

距離吳新榮第一次赴日求學才三年，但當時潮流已從自由主義革新時代演變至社會主義革命時代¹⁹，此時的吳新榮不再留戀自由主義，而相當熱衷於左派思想。因吳新榮曾擔任「東醫南瀛會」及「東京里門會」的負責人，遂成為青年會會計部的幹部。當時他被編入戶塚町班，被賦予「積極接觸校內的台灣人，鼓勵其加入研究會，利用研究會發布的新聞，提出時事問題加以指導」等任務²⁰。

日本政府畏懼共產黨的勢力延伸，開始進行掃蕩，比較大規模的兩次逮捕行動分別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分別稱為「三一五事件」、「四一六事件」。其中四一六事件拘捕了「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及「台灣學術研究會」的幹部四十三人，其中有三人是共產黨員，連帶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幹部也被捕。如此，「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從成立到遭受日本帝國的摧毀而結束只有短短的一年。吳新榮因擔任台灣青年會委員，在「四一六事件」中亦受牽連，被拘留二十九天，自商專時代起之日記全被沒收，日警從這些日記循線逮捕許多吳新榮的同鄉同志，吳新榮感到內疚，遂決定停止寫日記；自此以後，他成為日本當局密切注意之人物，無論上船、登陸、歸鄉、出外、交友、言語、文字記錄……一切生活起居都受到監視。「四一六事件」過後，共產黨員幾乎被消滅殆盡，日本的社會運動逐漸消沉，此後難以再見到街頭的學生示威遊行。吳新榮隱匿潛居之餘，不再撰寫日記，改以充滿左翼思想的文學作品宣洩熱情，不僅展現他個人強烈的戰鬥意識，且指涉民族問題、階級鬥爭，在這

¹⁹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三《此時此地》，頁 78。

²⁰ 王乃信：《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7)第一冊，文化運動》，台北：創造，1989 年，頁 38。

些作品中展現社會主義思想，並勾勒出社會主義世界的藍圖。

早期吳新榮一連創辦了《蒼海》、《南瀛會誌》、《里門會誌》²¹。其中主編的文藝雜誌《南瀛會誌》，同時也是東京醫專時期台灣人所組織的「東京南瀛會」的機關報，他在發行一共三期的會誌裡撰寫了：五篇評論、五篇隨筆、十八首詩、一篇小說，幾乎全是他的作品，甚至連封面與圖案都出自其手。較重要的篇章如一九三〇年發表的〈醫業國營論〉、〈醫藥分離論〉、〈產兒限制論〉之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不僅呈現了他在醫學科學方面的專業，更淋漓盡致地貫徹了他社會主義的思想，例如：〈醫業國營論〉云：「醫業由國家來經營，才能夠期待醫療設備的完全，附帶的理由是醫業由國家來管理，才能夠對患者非營利而施最善的治療。」²²這段話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醫業應當為非營利事業，達成此目的之手段是由國家經營。國家經營的理想亦即由國家來分配醫療資源，縮短貧富不均所造成的醫療差距，進而促使每個人都能享受公平、相等質量的醫療品質。建設這樣的制度為什麼需要國家介入？主要原因是他認為當時醫療制度由執業醫生各行其是，需要強大的力量進行統合，才能保障社會底層人民的醫療服務。

這種為普羅大眾設想的醫療制度，希望免除貧窮與疾病之間強烈的連結，使貧者也能以均等價格享受均等的醫療服務，這一點與他的社會主義與左翼思想恰可呼應。另外他在〈醫藥分離論〉中他談到：「其目的說是要防止醫師的暴利……醫業國營問題若能解決，這個問題也自然消滅。」²³因此這篇可視為〈醫業國營論〉的延伸，意即國家若能開放公立醫院給大眾使用，醫師也無法從用藥牟取暴利，自然無須醫藥分業。況且根本的問題不全然在於「醫藥是否分業」，因為吳新榮認為，醫藥分業的結果只不過將消費者的金錢從醫師轉移到藥劑師身上，藥品買賣間仍存在著巨額利潤的問題，最根本的解決之道仍是國營醫療，消除病患、醫師、藥劑師三方的對立，成為一體。至於〈產兒限制論〉底下括號寫著「生產調節論」，主張利用避孕的方式，降低生產人數。當時有這樣的理論提出，背

²¹ 「里門」之命名是取「佳里」、「北門」此二處地名之合稱。

²²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二〈醫界二三題〉，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頁3。

²³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二〈醫界二三題〉，頁4。

景原因在於無產階級對於「負擔多兒」是有困難的，一旦無法教養，又受著經濟壓力的壓迫，便容易造成社會秩序等問題。然而，他並不認同以不自然的方式進行人工流產，「我們反對脫胎、手術、照射這樣不自然的方法，要者只是防止那群營養不良兒及那種死產的原因而已。」²⁴人力對於國家社會是基本資源，所以吳新榮強調的是以「量的減少」控管「質的提升」，等到人口素質上升，再來提高人口數量，「到那時候應該多生呀！多產呀！生產滿地上，要強壯，要健康！」²⁵要達成如此目標，關鍵在於國家必須重視人口的質量的培育，但前提是國家要照顧無產階級的生活，才可能使整體國民進步。只有提升無產階級的思想觀念，才能使其明瞭品質的重要性；而要提高思想觀念，「受教育」正是最關鍵的方法。可以說，吳新榮所關照的面向不只在於國家人力資源的質與量，更在於政府應該設法推廣、宣傳新思維，改善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在這議題中，其實還隱隱透露著「教育程度低落」的隱憂，無產階級的經濟壓力與教育程度低落形成惡性循環，進而引發社會秩序等問題，長遠來看相當不利於國家發展。

整體而言，吳新榮表現在醫學上的觀點，凸顯了他長期以來關心的社會議題。只不過他是以醫生的身分，深入探視了社會各階層所存在的各種現象，不僅在龐大的經驗中苦心耙梳、挑出主要毛病；更理性地分析因應之道，推求新制度實行的可能性；並藉由文學之手，紀錄一個知識份子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

一九三二年春，吳新榮從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旋入山本宣治紀念病院—五反田病院—從事研究及實際醫療工作。五反田病院的成立是基於服務無產者信念，規模小而病患多，吳新榮每日工作至下午十時才能歇息，且必須遠赴工廠地帶、農村近郊，及韓國人住宅區巡診²⁶。

深入醫療現場後，他看見當時的醫療制度不僅無法全面照顧社會底層的民眾，而且觀念落後，認為應進行改革。同年九月他再度發表〈社會醫學短論〉：「政治家若不顧大眾生活而一己奔走，這個後果當然是可怕的，假使醫師也是做過這

²⁴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二〈醫界二三題〉，頁 6。

²⁵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二〈醫界二三題〉，頁 6。

²⁶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三《此時此地》，頁 82。

樣行為，也是當然要予以排擊而加以唾棄…他們兩者均不是以大眾為對象嗎？可是大眾不是為他們而存在的，反之他們才是為大眾而存在的。」²⁷此時他已有執醫的實務經驗，終於得以落實過去所學的理论、所懷抱的理念，進到第一線的醫療環境，對醫療問題有更深刻的見解。文中出現的「大眾」一詞，在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裡，指的是「無產階級」²⁸。政治家與醫師在社會階級中屬於較高層，他們握有知識、思想、權力與財富，居於強勢地位，所以他們應該服務無產者、幫助社會弱勢，以最大的資源回饋社會。他進一步指出：「工廠地帶要設工人病院，農村地方要設農民病院…對無產者的診療一律免費。」²⁹這段話揭示無產者是經濟弱勢，「免費」不僅是最直接的幫助，而且是合乎道德的方法，何者？因為無產階級的工作環境往往不潔，傳染機率大增；工作時數又常超出人體負荷，導致過勞，使免疫力下降，「在工廠的工人多患梅毒塵肺，在農村的農民多患破傷風威爾斯氏病，在學校的教員多患肺結核，患腳氣病的工人多是衝心型的，患傷寒症的肉體勞動者患後多不好，而且醫治條件也較差。」³⁰病菌本身雖沒有窮富之分，職業病卻有階級之分，受到的醫療照顧也隨著經濟條件而有差別。政府需要將其視為責任，平均分配醫療資源，使大眾廣泛受到照顧。

吳新榮接觸社會各階層的病患，對於社會底層的民眾生活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體會。尤其他出生於台南市將軍區³¹，當地屬於貧苦漁村，他更能體認醫療資源的匱乏與分配的不公。學成返台後他於佳里開業行醫，從此紮根於佳里。

²⁷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二〈社會醫學短論—大眾病院〉，頁 11。

²⁸ 無產階級出自於拉丁語proletarius，其拉丁文本字原是指古羅馬最低下層的社會階級，字源由Proles（子嗣）一字所衍生，意味該階級的唯一貢獻是延續香火並供應人丁，帶有輕蔑之意。直至 19 世紀，馬克思以此字形容沒有資本工具的工人階級，此字才正式走入社會及經濟學說。在中文，Proletarius可譯作普羅大眾、平民百姓，但論述馬克思主義時，則譯作無產階級。左翼知識分子認為無產階級才是真正的「大眾」，普羅文學（亦即無產階級文學，proletariat literature）是基於大眾生活之上所開創的文學。

²⁹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二〈社會醫學短論—大眾病院〉，頁 11。

³⁰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二〈社會醫學短論—醫學的偏在性〉，頁 10。

³¹ 原台南縣將軍鄉。西元 2010 年 12 月 25 日起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等改制為直轄市，「鄉鎮市」改為「區」、「村」改為「里」。

第三章 日治時代台灣文壇的掙扎與反彈

第一節 單一文化的灌輸與自我意識的覺醒

一、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

日本原先是抵抗歐美世界資本主義的亞洲國家，其後卻由明治維新轉型成功，成為亞洲世界第一個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往往與資本主義有著類似的形成模式，二者都是以強大的力量鯨吞或者蠶食弱小族群。以資本主義而言，其主要經濟模式包括了自由的資本和雇傭流動、市場競爭、以及價格機制的運行。在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裡，經濟是決定社會型態與社會階層的基礎，強大的資本主義一旦掌握經濟命脈，小額資本必然面臨被消滅的命運，它所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衝擊，隨之而來的階級劃分將促使勞資雙方不斷進行對話或發生衝突。觀察所謂帝國主義的本質，主要是以國家的軍事力量奪取其他國家的領土、奴役其人民，進而建立起經濟及政治霸權，並從中獲取暴利。被侵略的國家或民族屬於被剝削的一方，除了經濟被掠奪，思想被箝制，個人主義被消滅，乃至於種族之滅亡，歷史詮釋之扭曲，無一可倖免——規模之廣且深，遠非資本主義所能及。此外，比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更令人恐懼的是它可能衍生出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或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例如一九三〇年代後期，中野正剛於日本奔走鼓吹法西斯主義，被稱為「日本的希特勒」，他主張「軍國」、「極權」或「新秩序」，這樣的思想在一戰及二戰期間，影響菁英份子甚深，甚至在一九三七年的選舉中獲得了百分之二的選票。以極端主義而言，百分之二是不容忽視的數字，也正是在同年的七月七日，爆發了蘆溝橋事變，軍國主義被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以台灣而言，殖民地社會的勞資關係又加入了民族變因，此一變因持續增強彼此間的緊張關係。日本政府除了掌握台灣社會的經濟命脈，即連人民的職業都

享有優先篩選的權力——爲了保障日本人在台的地位，日本政府在教育政策上強調義務教育及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只對台灣人開放培育教師的師範學校和扶植醫師的醫事學校。殖民初期日本政府並不鼓勵台灣人就讀人文學科，因此台灣人無法獲得社會科學的啓蒙，日後更不可能擔任各機構的高層決策人員。然而，日本人很清楚這樣的控制方式只能在一時，若要長遠保有決策位置，須從文化力量著手。文化思想的力量作用於社會，可蔚然形成一股風氣；若推展進行在政治上，勢必成爲政治力量的工具。這種全面性的控制，最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的就是文化灌輸，文化改造使民眾產生觀念上的混亂，企圖將台灣人徹底換血，脫胎成爲爲天皇奉獻的犧牲品。陳芳明所謂「遲到的現代性」³²指出，具有歷史意識的知識分子，在面對殖民社會的現代化，能夠保持自己固有的文化主體與歷史經驗；反之，若無法分辨現代化背後所暗藏的殖民本質，就容易誤以爲現代化即等於日本化，如此一來，弱小經濟體乃至弱小民族被單一價值觀的巨流吞噬，豐富多元的各民族性必然消失，並失去解釋歷史的發言權。

原始的資本主義並非由政府管理，相反的它反對政府的干預，而以市場自由競爭爲考量。無論擁護者和批評者們，都同意資本主義指的是私營及私人所有權，自由而相互競爭的企業、追求利潤、財富不平等分配、市場（包括勞工市場）的存在。然而，放置於日治時代的台灣此一時空環境下的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反對政府介入，反而憑藉帝國主義的擴張而迅速壯大。台灣民眾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面對的是三井、三菱、住友、與安田等大型綜合財閥，加之偏袒日資的財政措施，形成財閥獨大的經濟型態。自十六世紀航海時代開始，資本主義便與帝國主義締結，在創造市場追求利潤的需求下，依靠科技與軍事力量達成目的。隨著經濟體系而來的價值觀入侵，民眾若毫無認知上的抵抗能力，殖民地舊有的文化根基將輕易地被連根拔除，因此知識分子的努力於此時就顯得格外重要。

日本政府在台灣所實施的掠奪手段，除不平等的法令之外，實則也一步步在消滅台灣民族性。例如：推行日台共學制，共學的實際意義是以種族爲經，以教

³²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麥田，2011年9月，頁59。

育制度為緯，預先劃分職業與社會地位，構築不平等的社會模型，不僅加深了日人台人的種族仇恨與階級裂痕，更龐大的企圖是以就業機會令台人屈服在制度之下。官方教科書的民族意識更為氾濫，例如歷史教科書，內容是純正的「日本史」，全然漠視台灣社會的獨特發展；音樂教科書是日本童謠，據日本音樂教育史學者岡部芳廣《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公学校唱歌教育》(公立學校的歌唱在台灣殖民教育)所言，音樂與語文教育同樣具備「同化」與「啓蒙」的雙重內涵。只不過，「啓蒙」一詞使用在殖民社會中相當諷刺，當政治力量強勢主導統一文字、語言之時，單一的歷史思維就愈加被彰顯出來。換言之，台灣人的文字只能是日文，歷史觀只能是日本史觀，擁有的思維只能是帝國主義下的思維。一旦台灣的主體被邊緣化，在一代又一代的交替更迭中，台灣意識很可能在最後被乾淨的抹去了。這斷然不是「啓蒙」的意義，而是「刨根」，意在徹底刨除台灣意識之根。戰爭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漫天蓋地鋪捲而來，觸及所有層面。皇民文學促使人民效忠天皇並讚揚戰爭具有偉大意義，進而要人民為戰爭奉獻金錢及犧牲生命；又如改良宗教，教導民眾在重要節日要到神社參拜，並禁止廟會喜慶，使布袋戲團、野臺戲失去在廟會的演出機會，被迫改業，舊有的信仰與民俗活動在這波潮流中從此噤聲；如果說，改變生活習俗只屬於外在層面的變化，那麼改姓名運動就是觸及漢人意識的核心。漢人重視家庭、家族、籍貫與祖宗家法，強調落葉歸根的原鄉意識。姓氏是家族的標記，也是祖先的象徵，改姓名等於抹滅自己的來歷，暗喻著重新出生。近年來台灣原住民認同部落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恢復自己原來的部落姓名，回歸所屬之地與原有血統。當進一步改變文字語言，從教育制度涉及文化渲染，再經由文化渲染造成輿論氛圍，由輿論氛圍深入到集體意識，在這一層又一層的鋪排下，推廣的力量便將以等比級數向外擴張，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徹底從精神意識脫胎換骨。

新的國家總督制度、新科技帶來新建設、開發經濟、創造工業化及都市化……這些政策經過不斷強化與放大，不僅是要取得台灣人民的認同，也是向世界宣示帝國主義的成功，而這一點正是台灣知識份子所擔憂的。台灣資本家林獻堂等人

與典型的資本主義家不同的是，他們出資讓留學生到日本進修，所投資的期望是回報台灣社會，而非個人利潤。這一點說明了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已進步到追求心靈意志的階段。

二、覺醒的力量—台灣文化協會的創立與轉型

追溯台灣的新文學的歷史，可從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的出現為起始，台灣的留日學生受到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風潮及日本國內的大正民主思想的影響，在東京發起「新民會」，認為殖民統治下所謂「內台一體」、「內地延長主義」等口號，仍無法消除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和經濟剝削政策，因此欲以組織進行社會改造運動。一九二一年蔣渭水在台北舉行了「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並於隔年在東京發行《台灣民報》，號稱為「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不僅鼓勵學生運動、社會改革運動、婦女解放、議會設置請願，也提倡新文學及白話文運動，發行量破萬份，足與當時最大的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相抗衡。日本帝國主義所主導的資本主義化，帶來現代化的政策與技術，留學生則帶回世界潮流與革新思想，台灣社會在各個層面開始接受世界的資訊，台灣現代文學便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發展出它獨特的面貌。

自一九二〇年起，世界各地的民主思潮洶湧澎湃，在中國有孫文發起的辛亥革命，推翻長達千年的世襲制度、日本國內興起自由民主思想（大正民主思潮）、朝鮮三一事件大喊「大韓獨立萬歲」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蘇俄十月革命，無產階級推翻臨時政府取得政權、歐洲新民族國家的出現、印度不合作運動等等，這些帶給台灣知識份子很大啟發、鼓舞，在世界局面劇烈動盪不安，瀰漫著一股民族自決的風潮的情況下，台灣的知識分子(尤其以留日學生為主)開始思考台灣的未來，尋求不同於往日的武裝抗日行動。在報紙、雜誌逐漸擴張為交流平台後，知識分子得到發表政論的機會，既可避免流血漂櫓而廣為社會大眾接受，又可吸納

有志之士成爲討論時事的基本社群，遂積極展開長達二十餘年「非武裝抗日運動」，爭取另一塊意識型態的版圖。

首先由林獻堂、蔡惠如、蔡式穀、林呈祿、王敏川、黃呈聰、莊垂勝、吳三連、鄭松筠等人先在日本組織「聲應會」，取「同聲相應」之義，企圖結合中國與臺灣旅日知識分子之力量，但這時期尚在聚集各方意識的萌芽階段，未有具體活動。直到後來的「啓發會」出現，林獻堂在東京招待數十名專科以上的留學生，舉辦「對台灣當如何努力」爲中心議題的座談會，提出撤廢「六三法」的概念，並設立「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才算落實了初期勾勒的草圖。「六三法」等於獨裁體制的法源依據，是日本政府賦予台灣總督的絕對權力，目的是鎮壓台灣人民的反抗與鬥爭。在東京座談會中，推行撤廢六三法的運動是初步的想法，同時也是對啓發會成員的一項考驗：在沒有軍事武力作爲後盾的現實情況下，該如何推行撤廢運動？唯有組織文化啓蒙團體，爲當時封閉的台灣社會輸入世界知識與發展現況，才能喚起民眾覺醒，造成廣大的輿論壓力，進而促使日本政府正視這個問題。隨後成立的「新民會」，著手創辦《臺灣青年》、《臺灣》等報章雜誌，成爲新文化運動的先聲，並把新文化運動的刊物傳入臺灣，做爲啓蒙運動的推行工具。

與此同時，林呈祿主張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取代「六三法撤廢運動」，要求設立適合台灣民情的法律，以避免內地延長主義同化台灣人的可能性。相較於撤廢六三法，請願設置議會似乎較爲溫和，但仍引起日本政府不滿。總督田健治郎在二次請願運動後，召見林獻堂予以施壓，並要求台灣銀行向其催促付清貸款，林獻堂在龐大壓力下聲明退出請願議會，聲望一度受挫。不過，台灣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遭遇瓶頸之際，技巧性地轉而從事文學運動，台灣文化協會也就應運而生。

「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立引發了新文學運動，以及白話文的討論，知識分子接受新時代的科學思想，並嘗試以改變文學的形態呈現新知識，將文學視爲宣揚社會教育之工具及推動改革的手段。以往武裝抗日或議會設置請願活動由少數人

努力，現在要借用文化、文學的力量將民主思潮推廣到民眾生活，啓蒙民眾對世界思潮的認識。

台灣社會被猛然推進現代化的改造過程中，對二〇、三〇年代的知識分子而言是一股莫可抵禦的潮流。傳統文化衍生的價值觀，與原有的記憶所堆疊而成的龐大架構，於一夕間被殖民主義、現代主義、資本主義的洪流衝撞激盪，台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是挾帶強烈殖民性質的現代主義來襲。在這種情況下，身處當代時空背景下的政治環境，該如何保持距離，重新喚醒批判意識，離析現代化與殖民化彼此之間的關係，便成為知識分子重要的課題。問題是，有多少人能夠清楚認識「現代化」並不同「殖民化」？並非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明白區分二者的內在差異，以致於有認同混淆的現象，遑論大眾對此一議題的陌生。受到衝擊的知識分子亟欲拆下現代化種種象徵進步的表象，暴露深處內部的殖民本質。他們由政治活動走入文藝界，包含文學創作與美術音樂的結合，成為前所未有的文藝結盟，推行啓蒙大眾的工作。

迫使知識分子由政治活動走入文藝界的原因，肇因於三〇年代政治運動受到迫害，知識份子轉而從事看似較溫和的文藝運動。繼林獻堂之後，台灣島內知識份子蔣渭水等有識之士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期望民族覺醒，向日本統治當局要求自由平等權利及尊重民族性之民族運動，成為民眾的思想啓蒙。台灣文協的成員網羅當時作家與美術家、音樂家，以文字、繪畫、音樂作品傳達台灣社會渴望自由的聲音。此時，總督府的統治政策在一九二〇年代也產生重大變化。一九一九年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得到素有自由作風的總務長官下村宏的幫助，並在原敬內閣的指示下，在台灣實施「內地延長」同化政策。台灣文化協會在這樣的氛圍下，將進步而革新的思想迅速傳播到各地，迫使總督也不得不正視文協的力量。能夠使總督正視台灣文協的關鍵，在於台灣文協善於運用媒體傳播的力量——報紙、雜誌、講座、文宣、音樂會、畫展、文學作品、電影、劇團、夏令營……甚至是被駁回的文化義塾³³。當時台灣人民多數仍是文盲，文字宣傳的效果有限，

³³ 文化協會原先欲設立文化義塾，以幫助家境貧困的小孩上學，不過向日本政府申請時被駁回，

因此以演講會的傳播力量最為強大，由都市遍及至農村，從社會根基開始散播思想。這股滴水穿石的力量，如影隨形，源源不絕的傳播爭取自由的思想到每一個角落，後來的農民運動或者也可說是受到文協演講的啟發。台灣文協的成功經驗不僅引起政府高度重視，迫使總督田健治郎約見林獻堂，也讓人民見識到媒體驚人的傳播力量，這個經驗影響深遠，正如戰後二二八事件中有識之士在抗爭初期占領廣播電台，因為他們了解一個事實：掌握媒體才能掌握發言權。

受到「台灣文化協會」啟蒙思想的影響，各地青年團體的活動開始甦醒活躍。與此同時，隨著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蔓延，原本僅發生於俄國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也迅速波及世界各國，尤其是鄰近的日本和中國，幾可說是隨即展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這些激進思想的抬頭，也隨著留學生的返台，反映在島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年團體大多傾向「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路線，與文協舊幹部的主張有落差，這也是導致「台灣文化協會」日後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造成分歧的主因可以說是來自雙方背景不同。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成員以醫師、地主、公學校畢業生、留學回國的學生為主，是一個由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為主所組成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希望以文化活動啟蒙台灣人的思想；而海外留學生則是走向較激進的社會主義路線，雖然彼此之間激進的程度不一，但普遍認為不應侷限於文化活動，而應積極轉向政治活動。總的來說，當時台灣文協內部存在各種反省路線的聲音，整理成如下表格³⁴：

路線	派別	代表人物
右派	中國國民黨	蔡培火、林獻堂
中間	中國國民黨	蔣渭水
左派	山川均主義	連溫卿
極左派	福本和夫主義	王敏川、翁澤生、蔡孝乾

並沒有成功。

³⁴ 本表參考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2006年，麥田，頁21-22之思想光譜所修改。

台灣文協種種意識型態的分化鬥爭，終於在一九二七年爆發，由連溫卿和王敏川聯手取得領導權，屬於中間路線的蔣渭水因與連溫卿意見紛歧，遂與右派人馬一起退出文協，另組「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文化協會第一次分裂。新文協成爲左派陣營後，積極介入政治運動，不僅辦理激烈言論的演講會，支持農工抗爭，更努力發展各地的群眾運動，引起日本總督府打壓與禁制，使得許多幹部入獄。此時蘇聯第三國際裁決支持福本主義，山川主義失勢，埋下了連溫卿下台的導火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新文協舉辦第三次全島大會，在上大派與王敏川合作之下，開除連溫卿會籍，改由王敏川領導，從此新文協與上大派關係密切，而上大派一直想積極介入台灣共產黨的運作，新文協至此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一九二七年是關鍵的一年，當時莫斯科共產國際本部裁決指示支持「福本主義」。中國共產黨開始清算黨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改走激進路線。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從溫和的文化啓蒙走向農工抗爭性質的政治運動。吳新榮此年三月於金川中學畢業歸台，眼見台灣文化協會走向一個未知的變動，內心不知做何感想？翌年他考進東京醫專，一九二九年擔任台灣青年會委員，期間受日本政府鎮壓日本共產黨之「四一六事件」牽連被拘留二十九天，自商專時代起之日記全被沒收，故現今已無法得知吳新榮對於文協分裂的看法。

三、日本政府的教育政策與文化策略

(一)台日共學制

田健治郎既爲文官總督，自然深明教育力量。總督府於一九二二年頒布《改正台灣教育令》，標榜「日台共學」，撤廢日台人差別教育，推動「共學制」。

本質上即秉持積極「同化主義」的原則，將教育視為完成同化政策的主要工具，以求培養順從之國民。矢內原忠雄說：「制度上名為平等，台灣人亦可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卻是多方限制，使更能確保日本人的支配地位。」因為，初級教育仍維持台日隔離教育(台灣人子弟就讀公學校、日本人子弟就讀小學校)，中等學校以上才採用台日共學制，然而中學的入學考試依據日本小學畢業程度進行，考試一律以日文作答，台灣人不僅在語言上失利，即連教材都較日本人的「小學校」程度低，考試內容又涉及日本歷史、國家民族觀念，因此入學考試往往無法與日籍學生競爭。所以台灣學生在初級學校雖占了大多數，但中等學校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卻以日本籍學生為主，台人子弟升學依舊困難，只有以招收台灣人為主的「總督府醫學校」及「師範學校」才有較多的台籍學生，前述的蘇新即在此政策下就讀台南師範學校。日本人認為，醫學本為科技知識，與社會學無關，而就讀師範學校多數為窮困農家子弟，性格上多純樸敦厚、較為順從，可以開放給台灣人就讀。田健治郎表面上提供了相當良好的升學管道給台灣人，實際上是箝制了台灣人的思想，分配了台灣人日後職業的走向，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皆被排除在外，真正目的絕不在與日本人同化，而是使台灣人順化、完全服從。實際上，共學制遠比武力鎮壓的效果來的長遠，無論是同化或順化，台灣人在這樣的制度下，必須閱讀並接受日本的歷史觀點，等於接受皇民化的浸濡。即使一九四一年總督府又將小學校和公學校全部改為國民學校，表面形式上平等，但在課程與教學上仍各有差異。換言之，若要落實真正的台日共學，到內地(日本)留學或許較能接近此一目標；殖民地的教育只能停留在發展專業技術的層面，至於社會科學的相關科目，牽涉到社會意識、社會運動等敏感議題，是經過官方精心篩選後放置在教科書裡的，學生學習到的往往是官方觀點。學校教育負責塑造出官方認可的文化知識背景，使台灣人自幼耳濡目染，對內地(日本)文化產生嚮往。

(二)日本統治階層拉攏舊文學

南菜園是台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私人別墅，他在台北城南買地，約三十七坪，蓋了一座木造農舍，有花園、瓜棚、水井、菜蔬。一八九九年，南菜園落成之時，兒玉源太郎還特別做了一首絕句：

古亭庄外結茅廬，畢竟情疏景亦疏。

雨讀情畊如野客，三畦蔬菜一床書。

平時總督仍住在總督府，閒暇時才到南菜園讀書寫詩，種菜賞花。這種生活莫不像是陶淵明的寫照嗎？所創作的詩並非日本流行的俳句，而是中國的絕句，在在都具有濃厚的中國田園隱居意味，乍看之下，兒玉應該是嚮慕中國文化的文人了；然而仔細檢視兒玉源太郎的官職履歷，自一九〇〇年起，他擔任陸相(陸軍部部長)，後改任參謀部次長，適逢日俄戰爭爆發，即出任大本營參謀次長，並由中將擢升為陸軍大將，同時也是滿州軍參謀長。直至一九〇六年擔任參謀總長，才辭去台灣總督一職。期間他雖擔任過內相(內政部長)兼文相(教育部長)，但是這二個職位只擔任二個多月就解職。整體而言，兒玉源太郎主要職務都在軍事武力，不是教育文化，但他懂得文攻武嚇二者並用的效果。日本治台初期，各地抗暴事件層出不窮，前任總督如樺山資紀或桂太郎，皆以鎮暴方式對付台灣人民，付出相當高額的代價。因而當時日本朝野出現了「出賣台灣」的聲音，兒玉源太郎於此時自告奮勇來台擔任總督。他制定一連串開發台灣資源的政策，例如台糖，就是日本主要的經濟來源，其他如土地、森林、水利等調查與利用也如火如荼進行，使台灣搖身一變成爲日本寶貴的資產，從此日本朝野不再出現「出賣台灣」的論調。一八九九年兒玉源太郎再提出「有關台灣統治的既往及將來」備忘錄，提出在廈門設置台灣銀行支店(分行)的想法，以便爲日本南進政策鋪路。此外，兒玉源太郎與其助手後藤新平暗中資助中國的陳少白，支持並援助孫中山

革命，對抗清廷。兒玉源太郎擅長以經濟或外交手段，協助達成軍事統治的目的。南菜園裡的文學集會，絕非單純嚮往中國文化的表現，而是利用在台灣島上的中國舊文學團體，對抗強調鄉土意識的台灣文學。這樣的文化策略，仍附屬於統治手段之下。

四、仕紳階級與民間底層的文學社團創作路線

(一)傳統文化的存續

日治時期漢學詩社的成立如雨後春筍，相較於清朝時期的十二個，一九二三年後增加到六十二個，一九四三年時更遽增至二百二十六個。短短二十年間，詩社林立，且規模遍及全台灣，乃因原先漢學宿儒們藉此以文會友，其後日本政府統治階層不僅不嚴加禁止，反之以鼓勵態度、懷柔手段、拉攏方式進行文學主題的轉移，將內容聚焦在吟風弄月、鋤花品酒等韻事，自然有親日派詩社出現。另一方面，深具民族意識的台灣文人也選擇從事文學創作表達其反抗思想，主要作品集中在詩與散文，這些文人集結成詩社，其後與報社密切連結，陸續發表作品。在保存舊文化方面，當時較具影響力的漢詩詩社主要有三。

其一是櫟社，它是日治期間最具聲望與影響力的舊文學團體。櫟社發源自台中霧峯林家，一九〇二年由霧峯林家的林俊堂（號癡仙）首倡及其侄林南強，結為詩社，並取名為「櫟」。「櫟社」之名出自莊子：「今夫櫟，不材之木也。」可知「櫟」之意，乃是隱喻其消沈自棄的遺民心境，有消極抵抗之意味。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瀛社曾舉辦全台詩社擊鉢聯吟大會，以氣節著稱的櫟社詩人林幼春曾出席擔任詞宗，並受邀擬題，而他當時已經列名台灣文化協會的評議員。連橫本亦為創社成員之一，後因支持日本的言論，被開除會員資格。林獻堂、蔡惠如等人加入櫟社後，從此櫟社的政治色彩更為濃厚，社運亦因而推至顛峰狀態，

更非普通詩社可比。

其二是一九〇六年成立的南社，由台南文人蔡國琳(前清舉人)、趙鍾麒、連橫等人組成，主要功能是保存漢學文化，除每月定期舉辦擊鉢吟，也對外參與全台詩人大會。一九一一年，梁啟超來台，南社以東道主的身分於兩廣會館召開大會作為迎賓之禮；一九一二年前清進士許南英返台省墓，也與南社會員在台南吳園聚首。在舊文化名人圈中，儼然成為交流平台。一九三〇年後，詩社成員有感於民間對漢詩此種雅文學的陌生，趙雅福等人創辦了三六九小報，藉此讓民眾了解詩人另一種生活面向；謝星樓則提倡以燈謎向民眾推廣漢文化。不過，相較於櫟社，南社的性質偏向保存漢學傳統文化，對於政治議題保持一定的距離。儘管如此，它對於台南地區其他詩社，卻有助長聚集的作用。

其三是瀛社，一九〇九年在台北成立。瀛社約有一百五十餘名社員，成員除台灣本地詩人外，亦涵蓋日本寓居文人。重要成員如洪以南、謝汝銓、顏雲年、許梓桑、李碩卿、黃玉階等人。一九二四年，北台灣各詩社引薦社員加入瀛社，如瀛東小社、天籟吟社、星社、小鳴吟社、萃英吟社、高山文社、潛社、松社、聚奎吟社等，或以全社加入，或以個人身分參與，瀛社儼然為台灣北部詩社聯合社。

總計日治時期台灣大約有大大小小二百多個詩社³⁵，而這些詩社與三大詩社之間的共識是保留漢學文化。但是，正如南社成員所認識到的問題：儘管漢詩勢力龐大，但社會底層對漢詩的接受度並不高，三六九小報能帶動的流行有限，原因是當時台灣人民普遍為文盲。真正廣為流行的舊文學是歌仔戲，它發源於臺灣宜蘭，屬於本土漢文劇種。歌仔戲的文化價值在於摻雜了古典漢詩、漢文的文言文及閩南語（台灣腔、漳州腔），演出內容讓大眾也能接觸到文雅辭彙，或忠孝節義的故事。由於帶有娛樂性質，甚能受到民眾的歡迎，從民間出發，進而躍上許多重要慶典的舞台。

³⁵ 見附表。

(二)西方現代文學思潮來襲

西方世界的文化觀念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強行灌注到亞洲地區的各個種族。對於許多亞洲國家包含台灣而言，所謂的現代化，並非是順應當地時間推移的結果，而是單一價值觀在一夕之間猛然衝撞，並企圖吞噬原有的生活模式與文化區域。拆除「現代化」嶄新的包裝後，赤裸裸地呈現出的殖民地問題，包括區分現代化與殖民化、種族對立、階級矛盾、環境保護……等議題，不斷重複出現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作品當中，顯見當時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層面。

在駁雜的文化衝擊下，無論是文學創作的內容，或者新的文學理論與技巧都有重大突破。自一八九〇年起，西方現代文學主義³⁶從孕育、萌芽乃至於一九三〇年代的鼎盛時期，包括象徵主義³⁷、表現主義³⁸、未來主義³⁹、意識流(精神分析學)⁴⁰、意象主義⁴¹、超現實主義⁴²等等，流派多元且複雜，也有各自的主張，不過這些主義所反映的強烈現代意識，共同呈現出一種創新且亟於掙脫框架的新思維。這些主題討論的範疇，都是以「人」為出發點，重新探索並企圖定義一個已然進入混亂毀滅的新世界。

文學思維向來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相當緊黏，文學活動既然表現人生，某種程

³⁶ 現代主義文學，又稱現代派文學或現代文學，1890年到1950年間流行於歐美各國。前承古典主義文學、浪漫主義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後接後現代主義文學。

³⁷ 現代主義文學諸流派中發展最為持久、成就最高的一個流派，以詩歌和戲劇為主。早期以法國為中心，後擴及整個西方世界。代表作家：瓦雷里、馬拉美、蘭波、魏爾倫、葉芝、艾略特、里爾克、梅特林克等。

³⁸ 主要發生在德語國家，後來也擴及美國。主要涵蓋詩歌和戲劇，其中尤以戲劇成就為高。在小說領域也有重大建樹。代表作家：尤金·奧尼爾、卡夫卡、愷撒、托勒、斯特林堡等。

³⁹ 未來主義文學是在新科學與新科技之下產生的文學思潮。早期在古典物理學如達爾文的進化論與牛頓的力學理論體系下，實證、理性是文藝思潮的主流觀點。20世紀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之後出現的電子論、控制論和信息論，不僅撼動了科學界，也改變了語言符號的舊觀點。

⁴⁰ 現代主義諸流派中唯一以小說創作為主的流派，波及整個歐美國家，尤以英語和法語國家成就最高。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引入小說創作，顛覆了傳統的小說敘事模式。代表作家：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吳爾芙等。

⁴¹ 主要發生於英美兩國，僅涵蓋詩歌一個門類，有時被看作是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在英美的分支。代表人物：休姆、龐德、弗林特、羅厄爾等。

⁴² 現代主義文學諸流派中興起和發展得最晚的一支，擁有廣泛的國際影響，涉及文藝所有領域，誕生於法國，其前身是盛行於1916年—1923年間的達達主義。代表人物：布勒東、艾呂雅、阿拉貢、蓋斯科因、埃利蒂斯等。

度上必然受到政治活動的影響：以歐洲而言，發生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具有重大影響，乃因戰爭徹底打破了歐洲社會原有的舊秩序，帶給歐洲巨大的災難，迫使敏感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和倫理關係，從嚴重的懷疑滋生出反叛情緒。而在俄國，一九一七年爆發的十月革命，同樣是資本主義遭遇質疑的時候，使得馬克思主義一躍成爲一種重要思潮。在中國，現代主義批判的精神與激進的革命觀點產生共鳴，知識分子的自覺引發爲五四運動。台灣文學在政治環境大變動、留學生帶回新思潮的衝擊下，也從單線的一元發展轉變爲多元發展。台灣知識分子開始從各個角度去思考，重新審視資本主義下的繁榮景象，發掘現代化的真實意義，以筆爲劍，批判帝國主義中的殖民本質。在世界瀰漫著一片質疑資本主義的浪潮中，台灣文學中左翼思想的文學作品在這種時空背景下於焉誕生。

(三)左翼文學的萌芽與擴展

一九二〇年初期，台灣新文學開始發端，在這段時間當中，社會主義的思想廣爲流布，經過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衝擊與洗禮，更形成推波助瀾之勢湧向社會各個角落。一九二七年是台灣文化運動關鍵的一年，導致文協分裂的主因即是左翼思想積極奮起，以濃厚的馬克思主義引導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三〇年代之後，可說是台灣文學的黃金時期，此時政治運動接連受挫；相對的，文學領域則因爲有更多知識份子投入經營而得到發展，文學也就成爲帶有政治目的的利器。但要釐清的一點是，台灣的左翼文學是在殖民地中發展，與中國、日本的左翼程度有別。由於台灣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除了原本的階級矛盾之外，還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指出，三〇年代台灣文學左翼發展的困境，例如沒有出現「旗幟鮮明的聯盟」，且因缺乏完整的左翼文學理論，

相較於其他地區的左翼文學，成就相形居下。這些現象乃因當時左翼思想在台灣沒有獲得良好的發展空間。其他地區以農民工人運動發跡，反抗對象十分明確地指向地主財主等權貴階級，要破除的是經濟地位的落差；而日治時期台灣左翼思想卻挾帶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容易混合在地因素而形成特有的左翼思想，在這樣的時空條件下，就不能將台灣的左翼文學，與中國或日本的左翼文學相提並論。如果以寬容的條件去看待台灣發展的左翼思想，便可明白，其他地區的左翼思想能夠獲得足夠的支持，必須是人民普遍擁有自我覺醒的意識。換言之，台灣在留學生剛帶回新思潮，多數人民仍是文盲，尚處於觀望猶豫的狀態中就面臨了混亂的變動。大部分的民眾能明白對抗的是日本人，但對於階級問題的處理往往放在民族認同之後。或以為，韓國與台灣同屬於日本殖民地，但左翼思想的發展上大相逕庭，台灣不如韓國激進。追溯台灣歷史，日治時期之前隸屬於中國清廷，清廷對於台灣一向採取羈縻政策，島上多數為原住民部落，生活模式與漢人迥異，對於國家或民族意識的認知也大不相同，他們的民族意識是部落意識，崇尚原鄉是指歸屬大自然、敬畏大自然，陳第〈東番記〉記載：「(原住民)飽食嬉遊，于于衍衍，又惡用達人為？其無懷、葛天之民乎！」足見當時清領時期的台灣與上古的中國相類似，國家意識的輪廓尚在模糊發展中。自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三〇年，在短暫的廿五年之間台灣被迫拉進世界漩渦之中，無論是外來思潮的衝擊，或民族的覺醒，摸索的過程是極度緊張混亂的，遑論充滿明確反抗意識的左翼思想在台灣能擁有強力的支持。

吳新榮觀察到世界急速變遷的事實，每日大量吸收新資訊以了解外在變化。個人的努力之外，他認識到地方組織有機會結合台灣新文學的洪流，其父吳萱草與各漢詩社的交流模式，提供吳新榮一個模仿的原型。他組織了佳里青風會，解散後，大部分的成員又成立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實際上支部的成員多為親左派。

隨著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局勢開始，為了讓台灣成為支持侵略行動的工業化基地，政府對左翼組織進行檢舉、解散、逮捕、肅清等動作，左翼媒體的

空間又再度被壓縮，左翼文學只能尋求與右翼文學的聯合，藉此淡化左翼色彩，但也暴露出路線不明確的憂慮，這股隱憂終於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成爲事實，左翼組織從此禁聲。

第二節 戰爭時期皇民化運動下民族自覺的努力

皇民化運動是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開始大規模實施極端的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意圖把殖民地人民改造成「天皇制度」下的子民，藉此逼迫台灣人爲天皇效忠犧牲，從精神上完成皇民化的改造。在戰爭前，日本政府一向採取懷柔的同化政策以拉攏人心，戰爭時期開始進行地毯式的剔抉扒羅，以「去台灣化」的手段，企圖探進這塊殖民地的精神深處，拔除台灣之根並徹底置換成日本靈魂。如此大費周章，實際的終極目標是要台灣全島提供戰爭中所有可動用的資源消耗。皇民化運動最主要是精神文化層面的改變；而其軍事手段是實施志願兵制度。日本政府向民眾宣示要成爲皇民，要能夠與內地(日本)人獲得平起平坐的機會，那就是加入志願兵、爲天皇戰死，以犧牲生命來換取獲得認同的代價。周金波的小說〈志願兵〉描寫的就是這類願望。台灣人民既不被視爲正式的日本人，自然不具有當兵的義務，沒有所謂的徵兵制。但戰爭所需的人力資源，迫使日本在朝鮮及台灣實施體制外的徵兵制度，美名爲「特別志願」。台灣島先徵召陸軍志願兵四千二百餘名，後徵召海軍志願兵一萬一千餘名，其後戰況日益疲敝，人力短缺到必須徵召「學徒志願兵」，以在校學生爲主要對象(高等學校、專門學校、大學預科、大學)，倉促應戰。許多人把周金波視爲皇民文學的代表作家，因爲作品中的主角視日本爲祖國，爲國犧牲而感到光榮；但戰後也有爲其平反的聲音，至於周金波本人則選擇沉默。另一位鬧得沸沸揚揚的陳火泉，則是在你來我往的辯駁中澄清自己是在逼迫下而扭曲變形的皇民文學。無論是肯定皇

民文學的作品、疑似皇民文學的作品、認同混亂的作品等等，要從這些作品去尋求作家內心真正的聲音是有困難的，光憑文字表面如何探知作家真正的意念，除了需要分析環境、心理等因素，更重要的是「人性」因素。某些作家爲了爭取容納作品的空間，的確有可能躲在高喊協力戰爭的口號下，進行所謂的皇民文學作品，然而字裡行間又隱隱透出掙扎與反語。又，某些作家更可能是沒有選擇沉默的權利，受於脅迫下必須寫出符合官方期待的作品。吳新榮曾在日記中寫著：

昨晚，應台灣唯一的文藝雜誌《台灣文藝》⁴³之邀，寫了一篇〈響應全島民總蹶起運動〉，僅寫了兩張稿紙，自己覺得堆砌了美詞麗句而得意。經常下定決心不寫、不說了，但遇到情況還是寫出來、說出來，真不可救藥。⁴⁴

何以下了決心卻又遇到「情況」而不得不寫、不得不說？最後給自己的評論竟是「不可救藥」。除了吳新榮之外，執筆撰寫的尚有張文環、楊遠、呂赫若、陳火泉。「響應運動」題目下的文字或許是漂亮的，但吳新榮在日記裡卻顯得不情不願，這篇被動之作不僅只有短短兩張稿紙，還是堆砌出來的文字，實際上並沒有認同政府的響應運動，只是應付了事。吳新榮年輕時曾被日方大量搜索日記，應該明白日記文字非常有可能會成爲定罪的依據，若不是真心感到無奈，沒有必要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寫下這類文字。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並非不明白官樣文章的矯情，但仍要大力推行，乃因「文學」運動是皇民化運動其中重大的一環，它包含文字作品及語言(聲音)作品，也是影響民眾最直接的層面。日本政府希望作家們以作品表現對皇民運動的認同，

⁴³ 《台灣文藝》雜誌至少有四種不同時間發行的版本：一是指明治 35 年(1902 年)「台灣文藝社」發行的文藝雜誌，二是指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聯盟」的機關雜誌，三是指 1944 年「皇民奉公會」的機關雜誌，四是指吳濁流在 1964 年創刊的文學雜誌。此處的《台灣文藝》當指「皇民奉公會」的雜誌。

⁴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1944 年 5 月 21 日語，頁 406。

創造輿論氛圍以達到政治文宣的效果，便極力鼓吹所謂的「皇民文學」。皇民化文學自中日戰爭爆發後便如火如荼地展開，不過「皇民文學」一詞的出現甚晚，直到一九四三年五月西川滿在《文藝台灣》(六卷一號)刊登的〈文藝時評〉一文中先喊出了「皇國文學」，而後在同刊下期(六卷二號)才出現了「皇民文學」一詞。當時的台灣人對於日本政府御用作家的居心了於心，因此許多二〇年代及三〇年代中期的台灣籍作家常以批判性的角度描寫這一段「皇民文學」，其中大多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事實上，早在皇民化文學開始之前，日本政府已經成功推行日本文化教育，三〇年代已經出現以日語為主要寫作語言的作家群。他們與二〇年代的中文作家之間存在斷裂，吳新榮與其父吳萱草恰好分別站在這個斷裂點。

吳新榮的日記中寫著他常在結束工作後換上和服與木屐，吃壽喜燒、坐榻榻米、以日語交談書寫，思考處理各種事物，行為舉止與思考模式已然是日本人。但他明白這樣做的原因只是「方便」，他說：「我們是迫於方便和必要性而被同化了的台灣人。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我們是日本人。」⁴⁵這段話很清楚的說明自己是「被迫」成為像日本人的台灣人，雖說「不能否認我們是日本人」，但特別強調「不能否認」意即「可能被否認」或「已經被否認」。從各個政策、社會氛圍來看，在日本人眼中，被同化了的台灣人依舊是台灣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吳新榮在另一段日記文字中道出「被迫」的原因：「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戰爭時期)所採行的強制手段和愚民政策無法認同。我們只認同時勢的力量。」⁴⁶他所認同的是「時勢」比人強，無法接受的是政府採取的政策，因此官方主導下的文學作品也因帶有政令宣導色彩，而被吳新榮屏除在外。一九三八這一年出版了許多戰爭作品，但吳新榮卻說：「瀏覽今天寄到的《中央公論》後，最先讀的是低音歌手伊藤武雄的〈在戰場上直到喪失一隻手為止〉，讀來讓我熱血奔騰，心情激

⁴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二 1938年1月19日語，頁192。

⁴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二 1938年2月14日語，頁206。

昂。……迄今未曾讀過有關這次事變的戰爭文學作品。」⁴⁷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擁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但戰爭已經發生一年多，吳新榮卻未曾讀過事變相關作品，也令人好奇他對戰爭時期的(皇民)文學作品是否刻意保持距離。他對於定位不明的文學社團也抱持試水溫的態度加入，「郭水潭介紹我加入在台北組織成立的台灣詩人協會，今天寄出二篇詩稿(〈南部悲歌〉和〈舊都回想〉)和入會費。該會是楊雲萍君和西川滿氏主持的，先加入看看再說。」⁴⁸台灣詩人協會十二月發行《華麗島》，僅出刊一期。由於日本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已全面禁用漢文，《華麗島》刊載的作品全是日文。楊雲萍本身是藝術愛好者，與日本文學報國會也過從甚密；西川滿則有他的文學目的，企圖以異國風情美學的風格另闢蹊徑，重新返回日本文壇。吳新榮以觀望的態度加入後，未料一九四〇年元旦就改組為「台灣文藝家協會」，結合《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民報》學藝部，發行《文藝台灣》。改組後的協會，刻意忽視現實政治環境，在意識型態上支持皇民化政策。《文藝台灣》向來是提倡「外地文學」的刊物，以在台日人為中心的文學觀點，書寫異國浪漫與鄉愁，並延續這樣的耽美主義將戰爭唯美化，忽視殖民地長期以來所有的民族矛盾、階級壓迫、民眾運動下的抗爭等問題，並批判台灣本島作家的白話文學多為模仿之作；戰爭期間又與日本官方互通聲氣，淪為官方廣告刊物。吳新榮對於《文藝台灣》的放棄，在於他無法認同唯美主義的偏頗，從他帶領的鹽分地帶文學集團就可看出他提倡寫實的文學觀，認為文學的現實性應該表現在人民真實的生活層面，從生活提煉素材。他的日記寫道：「今天也讀完了《台灣藝術》四月號，相對於《文藝台灣》的貴族氣息，此書是較為平民化的。……因為太平民味、台灣味而顯得過於通俗貧乏，但是我們仍然要支持它吧。」⁴⁹吳新榮知道《台灣藝術》有過於通俗的缺點，但不同於《文藝台灣》以戲謔而嘲笑的态度看待台灣作品，他選擇支持與鼓勵。處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作家，當時不約而同地寫下反抗殖民思想的文章，傳達民眾的心聲，所以文學作品需要放置

⁴⁷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二 1938年11月30日語，頁331。

⁴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三 1939年9月16日語，頁273。

⁴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四 1940年4月25日語，頁217。

在政治環境中來理解。

吳新榮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說：「我提到西川滿氏，說他有蒼白的貴族性。……西川一派貶低我們寫作技巧之幼稚，但他說對我們的人性熱情，應加以高評。」⁵⁰「西川一派」的貴族文學集團具有「蒼白的貴族性」，「蒼白」形容了他們筆下的文字沒有生氣、毫無血色、失去活力、缺乏熱情，是一種「貧血」的文學。西川滿批評台籍作家的寫作技巧尚未成熟，然而左翼文學作品所要凸顯的政治議題、社會議題才是當代作家們共同的目標，這也是貴族文學從不碰觸的領域。隨著中日戰爭進入緊急狀態之後，日本文壇也接連出現大動作，準備對台灣文學界進行顯著的控制，一票日籍作家不惜遠渡重洋到台灣進行戰時演說。吳新榮的日記寫到這一段：

先是日本文壇的中堅人物久米正雄氏呼籲以文藝魂來處理事變的題材；其次由新進的中野實氏曝露了重慶政府的宣傳戰，使人感動。接著也是中堅作家的吉川英治氏呼籲大家站起來，在戰線的後方做心理建設。同是新進的火野葦平氏向大家報告戰線的實況。最後是日本文壇大師菊池寬是述說死之武士道。這一票的通俗小說家或文藝大眾家或戰爭文學家的論點，均無法以高級理論說服我們。……我們幾個人沒有等菊池寬演講完，就從爆滿的聽眾中，擠了出來。⁵¹

這次的演講是以「文藝家銃後運動」為題而展開的訪台之行，不過演講者的背景大不相同。久米正雄在戰爭期間曾擔任「日本文學報國會」理事，該組織負責統合日本原有的大型文藝團體，包括：日本俳句作家協會、全日本女流詩人協會、經國文藝會、大日本歌人會等等，刊物統整後，各類文章經由文學報國會的審查以《文學報國》之名發行；所舉辦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更清楚明確地指

⁵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五 1941年8月15日語，頁242。

⁵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四 1940年12月21日語，頁301。

示：發揚決戰精神、擊滅英美文化、共榮圈文化確立的理念與實踐。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久米正雄所謂的「文藝魂」所指涉的就是「戰爭魂」，而非字面上「文藝至上」的思想；有「日本國民作家」之稱的吉川英治除了代表作《宮本武藏》外，最著名的就是他成功譯介了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為日本暢銷作家。來台演講之時，日本土曜會館報系的連載小說刊欄上仍繼續在連載《三國志》，其後他還打算譯介《水滸傳》與《西遊記》；然而熱愛漢學的吉川在政治立場上選擇(或被迫選擇)站在軍國主義一方，提倡大東亞戰爭，支持日本侵華、南進等政策。菊池寬則多次積極參加軍方部門策劃的「大後方文藝運動」、「日本文學報國會」、「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大日本言論報國會」等活動，並在這些活動中扮演活躍的領導角色。除了上述作家，川端康成、秋田雨雀、宮本百合子也名列在這次的演講會。特別的是，宮本百合子曾加入「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與非法的「日本共產黨」，和丈夫宮本顯治同為左翼革命家，原本就是日本政府密切監督的人物，在戰爭的巨浪襲捲中竟也無法保持沉默，必須翼贊政府的軍國主義。日本政府要這些內地作家聯合發表支持戰爭的聲明，甚至連左翼作家都不遺漏；而在台灣方面也要求具有影響力的台灣人發表支持戰爭的言論。陳逸松回憶皇民奉公會時說：「日本宣傳聖戰，要動員有名望、會說話、平時肯替台灣人講話而獲民間信賴的台灣人，出來替日本人說話。……這個任務對具有「台灣意識」的我們來說，實在是件苦差事。」⁵²這段話不僅是陳逸松的回憶，亦可為同時代的台灣菁英們做了內在掙扎最貼切的心理素描。吳新榮在戰爭動員中曾被要求宣講推廣「志願兵」，他在日記裡寫：「下午三點起在公會堂舉辦志願兵制度實施的宣傳演講會，……我是召集人兼司儀。」⁵³吳新榮是地方上深具影響力的人士，所以日本政府選擇他擔任召集人。舉辦演講會一方面要達到日方要求的政治性效果，一方面又要不違背自己的良心，措詞往往只能藉題發揮，避開詳細而精準的語彙。除非是不直接指涉戰爭的外圍事務，才能暢所欲言。例如一九

⁵² 陳逸松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1994年6月，新台灣文庫，頁234。

⁵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六1942年2月9日語，頁208。

四二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記：「昨天，皇民奉公會北門郡支會的委員會開會，對於農村的娛樂問題，提出我的看法。……本人提議，新文化是由舊文化演變產生的，所以可多加利用本土的樂器於娛樂活動。」⁵⁴ 早期流行於台灣民間的歌仔戲，在日治期間備受批判，一向被日本人視為猥瑣粗俗，甚至傷風敗俗。厲行皇民化運動之後，禁絕歌仔戲等漢人傳統戲曲演出，歌仔戲藝人被迫說日語、唱日本軍歌、改穿和服、佩帶武士刀演出、出演日本戲碼、甚至宣揚日本當局政策；某些日本作曲家更引進西方交響樂團的概念編制演出音樂。舞台表演包含演員、劇情、語言、服裝、音樂、動作等多項元素，日本當局掌控了最主要的劇情、語言、服裝，台灣人只能在音樂、動作方面努力保留本土特色。吳新榮提出本土樂器的使用，可視為爭取歌仔戲回歸本土性質的方向。

在日本政府嚴密監視下，台灣作家或藝術家要想找到立足點，進而往外推展思想版圖往往不可得，文學領域中的爭奪尤其激烈。吳新榮在日記中提及：「《台灣文學》第二號出刊了。台灣文學運動終於以張文環為中心，走上正軌，由創刊號到第二號的執筆者，精英群集，有黃得時、呂赫若、張深切、張文環、陳逸松、吳天賞、陳逢源、陳紹馨、張星建、郭水潭等十大作家齊集。我視他們為台灣文學之正統派，並應大力支持之。」⁵⁵ 其中張文環、張星建都是日本政府大力栽培者，吳新榮之所以認為他們仍是台灣文學之正統，主要在於他們在縫隙中努力維護台灣人的權益。一九四三年二月，皇民奉公會主辦的第一回台灣文化賞揭曉，得獎者為西川滿、濱田隼雄，還有以〈夜猿〉、〈闖雞〉得獎的台籍作家張文環。當時的西川滿逐漸脫去唯美文人的外衣，露出政治御用的形貌。吳新榮的日記裡記錄了「台灣文學決戰會議」的過程：

突然，西川一派提出陰謀性的文藝雜誌合併案，引起一場一片譁然。結果，《台灣文學》和《文藝台灣》兩陣營決裂了。……這場決戰下的會議，

⁵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六 1942年11月8日語，頁352。

⁵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五 1941年8月28日語，頁249。

可說是歷史性的會議，至少此後的文學家非再度的決心一切為戰爭而奉獻不可。⁵⁶

「雜誌合併」的模式早在日本文學報國會成功實行過，合併案背後的掌權者是日本當局。此次決戰會議充滿火藥味的激辯中，龍瑛宗說要有「八紘一字⁵⁷的精神」；張文環發言說沒有非皇民文學，如果有寫出非皇民文學作品者一律槍殺。張氏的言論或許是一種自清、自保的方式，但也側寫了當時日本政府亟欲掃蕩非皇民文學的決心。吳新榮說「一切為戰爭而奉獻」指的是這場決戰會議最後的結論，凡無助於戰爭的文學作品不得發表。因而即使雜誌名稱沒有合併，實際上這結果已經形同內容的合併，亦即政府握有最終的刪稿權。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後，吳新榮在返鄉的車程上開始反思這一條文學之路是否值得再投入。這一條文學之路幾乎等於政治之路，而戰爭的危機意識正處於高度敏感時期，左翼文學陣營勢必與日本殖民政府誓不兩立，也難再為弱勢的台灣人民而發聲，只能說些違背良心之言聊以充數，斷然非吳新榮所願。在此之前，吳新榮曾在《興南新聞》發表〈好文章，壞文章〉，文中一針見血的刺中西川滿的心槽：「西川滿早已不知在何時拋棄了『美的追求』，而以『悲壯的決意』再出發了！」⁵⁸一向標榜外地浪漫文學的西川滿，在進軍日本內地文壇失敗之後，重新找到了再出發的方向。他在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後發表〈一個決意〉(〈一つの決意〉)轉向為支持大東亞戰爭的皇民文學家，據此作為立足點。吳新榮所謂的「悲壯的決意」一句，充滿了嘲諷譏刺的意味。無論是「美的追求」或是「悲壯的決意」，都不過是探測日本文壇的風向球，同時也是取得發言權的工具，這個方向不行，就再轉向另一個方向，直到成功，如此而已。一個追求藝術至上的文學家，不會讓政治凌駕於藝術之上；反觀西川滿批評《台灣文學》作家群沒有具備皇民文學的精神，不就正好

⁵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1943年11月13日語，頁228。

⁵⁷ 大日本帝國時期的國家格言，指的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意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口號而在日本家喻戶曉。

⁵⁸ 陳映真、曾健民編譯：《噤啞的論爭》，1999年9月出版。當中收錄吳新榮的〈好文章·壞文章〉，頁135。原文以日文發表於《興南新聞》，1943年5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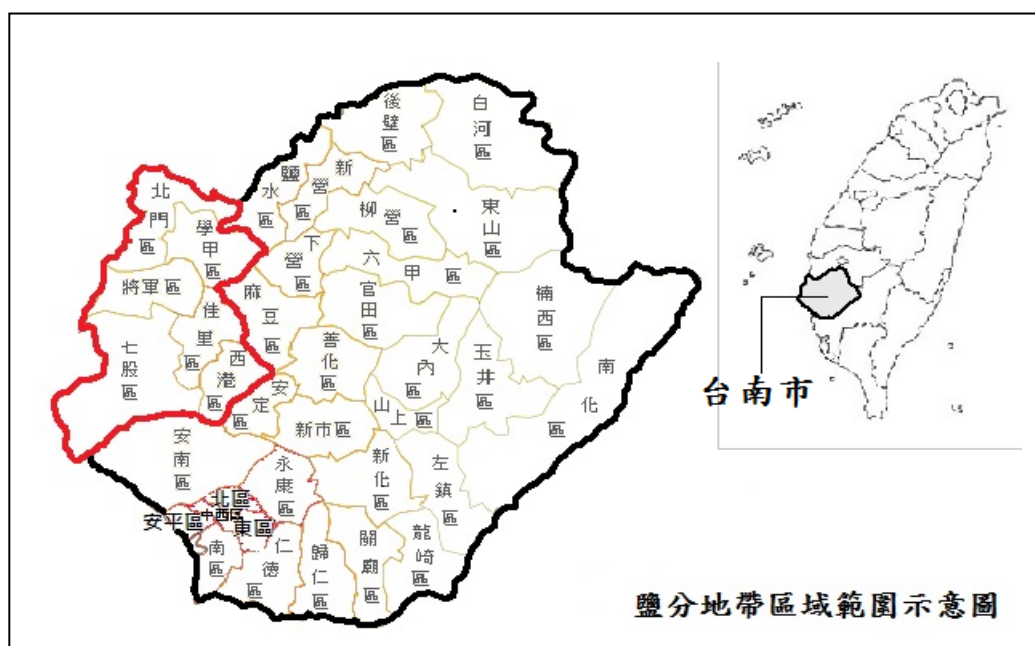
自我揭露是政治導向的傀儡嗎？更諷刺的是，「唯美主義」沒有成功將他帶回日本文壇，而他所深惡痛絕的「糞現實主義」，卻在吳新榮所領導下的鹽分地帶文學中得到了發展。



第四章 吳新榮與鹽分地帶文學流派

第一節 鹽分地帶文學創作理念

一、「鹽分地帶」的定義與形塑



◎原始圖片截自台灣地圖空白版及台南市政府行政區域圖

鹽分地帶指現今台南市的北門、將軍、七股、學甲、佳里、西港六區，日據時代隸屬於北門郡。吳新榮出生於將軍區、立業於佳里區，皆隸屬鹽分地帶。歷來談到鹽分地帶往往引用郭水潭的一段闡述：

我們傾向普魯文學，故被世人稱為『鹽分地帶』派。其所謂『鹽分地帶』另有原由。惟佳里本來是個富庶的地方，但其接隣の鄉村，如七股、將軍、北門等鄉，鄰近海邊，土壤多含鹽分，嘉南大圳未開鑿以前，在行政劃分

上稱『鹽分地帶』，而佳里鎮上的文學同人，其文藝作品，多取材於『鹽分地帶』，且帶有濃厚的鹽分氣質，所以文藝批評家，冠以『鹽分地帶』文學，我們也樂以接受這一名稱，由來如此。⁵⁹

這段話說明了鹽分地帶文學有二個明顯的特徵，一是作家群出身於鹽分地帶；二是文藝作品取材於「鹽分地帶」，對象以鹽分地帶的民眾生活為主。這二種說法可以兼容並蓄地包含鹽分地帶文學的範圍。鹽分地帶中的北門、將軍、七股都是靠海的區域，這裡的土壤普遍有高含量的鹽分，屬於無法種植農作物的貧瘠之地，居民多半藉曬鹽或出海捕魚、養殖魚塭維生。相較其他區域而言，學甲、佳里是市集群聚處，商業活動頻繁。尤其是佳里屬於相對富庶之地，同樣也聚集了許多文人。

鹽分地帶鼎盛的文風其來有自，早在一九一二年就有北門庄的王大俊、王炳南，將軍庄的吳萱草三人共同組成漢詩社「嶼江吟會」；二年後改名為「蘆溪吟社」，共推吳萱草為社長；一九二一年北門嶼和蕭壠二支廳合為北門郡，吳萱草等人商議，於一九二四年組成全郡性質的詩社「白鷗吟社」，通訊處為吳新榮的佳里醫院。其後「白鷗吟社」與麻豆的「綠社」共組「曾北聯吟會」，即曾文溪以北區域的聯吟大會；又與七股陳峻聲創立的「竹橋吟社」、謝源的「學甲吟社」、佳里興的「登雲吟社」、吳丙丁（吳新榮堂叔父）的「將軍吟社」合組「曾北六社聯吟會」；其他尚有北門的「北門吟社」、西港的「竹林詩學研究會」。總計台南地區在日治時期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成了二十四社⁶⁰，而以鹽分地帶為主要成員的白鷗吟社是全郡性質，成員最多、規模龐大，橫跨佳里庄、學甲庄、北門庄、將軍庄、七股庄、西港庄，每月定期有二次課題，創作首數不限，以漢詩延續文化。在文風鼎盛的環境薰陶下，使吳新榮自幼對文學產生了興趣，他曾

⁵⁹ 郭水潭：〈從鹽分地帶追憶吳新榮〉，本文收錄於《吳新榮選集》卷三《震瀛回憶錄》附錄四，頁 314。

⁶⁰ 詩社資料參考自龔顯宗：《台南縣文學史》上編，台南縣文化局，2004 年 12 月初版，頁 126。

說：「假使先人對我有多少影響的話，就是給我愛詩的精神這一點。」⁶¹其父吳萱草雖是社長，但沒有直接給予吳新榮太多漢學指導，而是潛移默化地培育了他的文學靈魂。不過，漢詩內容畢竟與一般民眾所認知的情趣距離較遠，在吳新榮的成長歲月中，現實生活的歡愉或苦痛更能激發他的創作能量，屬於他的文學風格在生活壓力下與思想茁壯中逐漸成形，文學與現實生活找到了契合點，吳新榮說：「這個地方是濱海的鹽分地帶，當時日人官吏也有改良這樣土地的意志，而地方民眾也曾做過這樣的努力，現在已變成一片的美田了。這樣環境的變化，影響著農村的每一個青年，誰都朝氣蓬勃，想要為社會人群做些事情。」⁶²不僅是吳新榮，鹽分地帶文學流派的作家群，各個滿懷奮鬥熱情。他們以文學為號召，進行實質的民眾運動，致力於推廣立基於民眾的政治理念。誠如林芳年的自述：「鹽分地帶新文學運動背景，絲毫沒有受到傳統學派的影響；是不滿異族統治手段。出於反抗異族的民族自決革命運動。」⁶³漢學詩社所注重的是保存傳統文化，而鹽分地帶的新文學流派在意的是當前的政治現象。二方雖屬不同性質的文學集社，想要保存原有文化的內部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一點不能否認。但舊文學發軔的動機相對保守，發展文學活動的過程中容易受到拉攏；再者是內容往往吟風弄月無關社會脈動；語言並非民眾熟悉的白話文，而是文言文，成為一般大眾讀者與創作者之間最大的隔閡；最後是階級問題，舊文學詩社的成員多為仕紳，交遊日方官員者不在少數，以當時大部分民眾懷有被欺壓的情緒而言，該如何理解舊文學圈與現實社會的貼近程度？這四點使舊文學緩緩游離民眾苦海而莫可歸岸，也間接導致新文學的興起。

吳新榮的日記中提到：「台北帝國大學中村哲教授將『佳里』與『台中』、『台南』並列，認為有『培養文學』的必要。」⁶⁴中村哲是法學與政治專家，對文藝、民俗等文史議題亦頗有鑽研。他所點出的台中、台南、佳里這三地，都是台灣島

⁶¹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一〈我也談詩〉，頁 426。

⁶²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一〈鹽分地帶的回顧〉，頁 455。

⁶³ 林芳年：《林芳年選集·鹽分地帶作家論》，台北：中華日報，1983 年 12 月，頁 385。

⁶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六 1942 年 7 月 12 日語，頁 298-299。

上政治運動蓬勃發展的搖籃，也是新舊文學交迭興盛之處。如：台中在政治上有林獻堂的「臺灣文化協會」，有臺灣共產黨的謝雪紅等人物；文學方面有舊文學的林癡仙、蔡啓運，以及莊太岳、莊幼岳父子等參加的櫟社；新文學有左翼文學家兼聲樂家呂赫若、張深切的「臺灣文藝聯盟」等組織。

台南地區的舊文學陣營有連橫、王則修等詩人，新文學陣營有以楊熾昌爲首，標舉超現實主義的風車詩社。佳里的舊文學集社有吳萱草爲首的白鷗吟社、新文學是鼓吹現實主義的鹽分地帶文學。附近麻豆的綠社、鹽水的月津吟社等詩社屬於舊文學範疇，新文學有組織農民運動與提倡寫實主義的楊逵。

觀察台南地區發展的文學軌跡，可以注意到幾個重大的現象：第一，市區的文學發展走向純文學的趨勢，而寫實主義的發展在鄉村。第二，結合政治運動的左翼文學明顯萌芽於鄉村。第三，新舊文學論戰中的語言問題被廣泛討論，原因與台灣本土意識覺醒有關。鹽分地帶的佳里，在這些台灣文學的重大議題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中村哲認爲佳里地區應該與台中、台南並列，成爲人文薈萃之地。

實際上吳新榮早年即有成立「土曜會」的構想，聚集本地青年讀書、討論各種問題，性質類似今日的讀書會。其名稱發源自日文中的「土曜日（どようび，星期六）」意即「星期六的聚會」。據成員之一林芳年的說法，該組織「完全沒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僅由吳新榮提供同仁們談話場，及鼓勵青年們的讀書風氣而已。⁶⁵」然而在吳新榮的日記裡，透露當初籌組該會的最初構想即是「交換社會的知識」⁶⁶、「獲得郡下的知識青年」⁶⁷、「問題不拘如何，凡其週間所發生的社會上一切的事眾都可以」⁶⁸這個方向是以知識分子討論時事爲目標，吳新榮在集社之初已經意識到其中必然不乏政治敏感議題，在最後一點補上「會的存在可能的範圍內，不使他人所知」⁶⁹，秘密集社的目的並不如林芳年所言「完全沒有政治色彩」。事實上，成員之一的陳培初就是台灣農民組合書記、台灣農民組合決

⁶⁵ 林芳年：《南瀛文學選—論評卷(一)·鹽窩裡的靈魂》，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22。

⁶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一 1933年9月10日語，頁12。

⁶⁷ 同上註。

⁶⁸ 同註66。

⁶⁹ 同註66。

算委員長；吳新榮與革命家蘇新也頗多往來，與左翼思想的淵源可謂相當密切。

「土曜會」後來的發展路線逐漸明朗，成為「青風會」的前身，而吳新榮對青風會所抱持的信心，在成立宣言裡表露無遺：

我們不能不依靠知識的交換，提升我們教養的水平。我們為要活得像個人，要求文化的恩惠，而我們佳里青風會將要為它行動。……青生的風是和平的景象，青春的風度，是進步的氣象，建設性的霸氣！那些不久將會以佳里為中心擴大到全部。⁷⁰

吳新榮在回憶錄裡提到他認為青風會是初期社會運動的一個原始形態，既與社會運動結合，便不能滿足侷促一隅，必須擴大到全島。青風會身為地方團體組織，向來即備受日警監視的壓力，但最終的破局竟是在二個月後因黃清澤與莊老得酒醉打架一事，莊氏提出訴訟官司，而使眾人有意解散。吳新榮在日記裡重新檢討青風會的缺失，並難掩失望地寫下〈弔青風〉一詩；幸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尚有一句：「各人眉間各有表示再起的暗約」⁷¹，為後來的「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埋下希望的種子。

一九三四年台灣新文學的文學組織「台灣文藝聯盟」，以帶有政治目的文學運動，集結了台灣全島思想進步的作家。這個聯盟結合了各種路線的作家，主要對抗的是日本殖民思想，中文部分為賴和、楊守愚、吳新榮等人主筆，創辦人楊達負責日文部分。他們致力於文藝大眾化，不標榜特定的意識形態，強調出自台灣本土的真，企圖容納各種理念與派別。吳新榮於一九三五年與前青風會成員郭水潭、徐清吉、鄭國津、王登山討論後，決定成立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文聯佳里支部成立宣言中確立了本土意識的基本主張，如下：

⁷⁰ 施懿琳：《台灣歷史名人傳：吳新榮傳》，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頁54-55。

⁷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一 1933年12月23日語，頁59。

支部的成立，不單只是聯盟機構的擴張強化，我們也將本於我們鮮明的本土意識，開拓前行，在我們的鹽分地帶，意氣風發地種下瘦小的文學之花，並且我們深信它必將結成果實。⁷²

有別於青風會的前車之鑑，這一次佳里支部的成立工作分配明確，宣言中所揭櫫的「鮮明的本土意識」是重大指標。其一，這可視為鹽分地帶文學目標的本質宣示。其二，亦能管窺佳里支部路線明確與總部裡百家爭鳴的不同——文藝聯盟集合全島各派別，在各方主張拉鋸之下，總部企圖尋求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點，但這也表示各路人馬必須有所犧牲、讓步、妥協，時間一長，「團結合作」有可能只淪為口號。另外，吳新榮在〈佳里支部成立大會通訊〉一文中提及：

尤其有關編輯，甲論乙駁，大有一番論辯。就中，林茂生提出「藝術只為完成藝術而藝術，斷不能被任何目的所利用。」的看法，相較的，張深切則以「藝術不應該只為藝術而藝術，而必須為了人生而藝術。」二位互相議論，特別引人注目。⁷³

林茂生與張深切代表文藝聯盟裡的二種聲音，林茂生的弦外之音指出藝術本身即為目的，不該成為政治工具，這是藝術與政治的理性劃分；張深切設定的藝術性質建構在人生基礎上，立場傾向表現生活，而生活是離不開政治的。但必須注意，張深切將藝術與生活二相結合，乍看之下是寫實派的言論——然而，他所發表的〈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中所言的「春秋筆法」、「不必拘束於既成的形式、內容、取財、描寫等。」又不全然吻合鹽分地帶的寫實主義。鹽分地帶的寫實主義不僅立足於表現生活，精確地說，是指向表現普羅大眾的生活，因此在內容的選擇便以鹽分地帶的農民、鹽工為主，投注在被壓迫剝削、奮鬥抗爭的

⁷² 黃勁連、羊子喬主編：《鹽分地帶文學選集》卷一附錄1，自立報系出版，頁307-308。

⁷³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一〈佳里分會成立通信〉，頁379。

主題上，以直抒胸臆的寫實方式，直白袒露地表現出對無產階級的同情。吳新榮曾論及文聯佳里支部的意義在於它是日治時期農村地區所發展的農民文學，因融合經濟弱勢、階級受迫與種族壓制三個因子，往往帶有強烈的左翼色彩，具有左翼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指標意義。反觀《台灣文藝》雖然網羅了當時台灣全島的作家群，但台灣文藝聯盟企圖融合左翼、右翼、中間路線、純文藝等團體的策略，勢必模糊了某些政治考量。然而其核心宗旨本身即帶有政治目的，既要達成政治目的，又不要標榜意識形態，路線不明確就容易引起成員的疑慮，成為分裂的隱憂。當「文聯」的路線逐漸趨向純文藝的性質，成員之一的楊逵便與之出現分歧。分裂的最終導火線是起於楊逵與總編輯張星建之間，為了是否刊載藍紅綠的小說〈紳士への道〉（〈邁向紳士之道〉），雙方爆發激烈爭執。由於這篇小說的內容是幻想成為仕紳的主角將努力的妻子視為生產的工具，以諷刺手法鮮明而深刻地呈現了日本政府對殖民地的剝削，相較於當時其他直接鋪敘無產階級痛苦的作品，這篇作品的思想價值與藝術手法受到楊逵的激賞，然而張星建卻極力反對刊載此文。最後張星建的意見勝出，卻也引發楊逵對於《臺灣文藝》的不滿。趙勳達認為，這是「意識型態的衝突，這便關係到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理想狀態和文藝大眾化路線的個人見解不同。」⁷⁴楊逵向來注重以文學反映生活，《臺灣文藝》逐步走向純文藝的創作取向終於無法滿足他的理念。一九三五年他脫離「文聯」，另發行《台灣新文學》，結合左翼作家，這是對文聯發出的警訊。在這段期間內，楊逵與吳新榮之間往來頻繁，在吳新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的日記中，文聯佳里支部討論可否參加台灣新文學社，並談新文學之意義。這次的對話顯現二個重點：第一，佳里支部對台灣新文學社的出現產生高度的關心與興趣，顯然雙方對話逐步深入文學新定義。第二，對於新文學的討論已從基本盤面的提綱，演變為全面性的細節耙梳。同年的十一月十六日，由於楊逵來訪，吳新榮召集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員座談，討論台灣新文學社創立之是非。當中說「知新文學社不是台灣

⁷⁴ 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分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2009年，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頁74。

文聯的對立團體」⁷⁵，所以獲得普遍支持。然而從後來的發展來看，二方的存在本質和對日立場實則截然不同。日記中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記錄了劉捷(郭天留)自台北來訪一事，郭水潭與吳新榮召集鹽分地帶同人於酒類記銷所舉行歡迎座談會，討論主題為《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的統一，統一的方向應為對日立場的再確認，但這仍屬大綱式的討論，無法觸及創作核心——實際上對日立場是不會產生變化的大方向，創作理念才是造成雙方歧異的關鍵。直到八月十四日，台灣文藝聯盟核心成員張星健與吳坤煌來訪，吳新榮再次召集文藝聯盟佳里支部成員進行討論，這時才真正明顯表露雙方創作理念的不同：鹽分地帶與楊逵的寫實主義彼此產生共鳴，左翼思想是他們創作的核心，很難再與文聯總部採取曲折隱奧的抗日文學並肩而行。很快地，八月廿五日，吳新榮計畫組織台灣東京醫學士會，佳里支部的成員也決定擺脫文藝聯盟佳里支部的工作。此決定一出，年底的文聯佳里支部會議便決議解散支部，整理殘務，但共議仍可稱呼支部成員為「鹽分地帶同人」，至此，鹽分地帶終於成為左翼文學的代名詞。

二、與機關雜誌的往來

吳新榮早年在東京醫專時代，常投稿至《里門會誌》、《蒼海》、《南瀛》等刊物，當時主要以戀愛或具有戰鬥意識的作品為主。返台後帶領鹽分地帶時期，除了與台灣各地的文學社團往來密切，也積極投稿至各機關雜誌報紙。僅以吳新榮日記裡所提及的報章雜誌，文學方面就有《文藝》、《台灣文藝》、《文學評論》、《台灣新文學》、《文學案內》、《愛書》、《台灣文藝叢誌》、《台灣詩薈》、《文藝台灣》、《台灣藝術》⁷⁶、《台灣文學》、《南方》、《民俗台灣》、《台灣文化》、《南瀛文獻》、《讀者文摘》、《文史薈刊》、《文星》；

⁷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一 1935 年 11 月 16 日語，頁 159。

⁷⁶ 1944 年改為《新大眾》，1946 年改為《藝華》。

學術方面有《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政治方面有《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時局新聞》、《台灣新聞》、《中央公論》、《台灣日報》、《大阪朝日新聞》、《旁觀雜誌》、《進步論壇》、《政經報》、《內外時報》、《自立晚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經濟方面有《經濟往來》；醫學方面有《醫事新報》、《日新醫報》、《台灣醫界》。這僅僅是日記中有提及的閱讀刊物，已能一窺吳新榮的嗜讀習慣與數量。雖左翼刊物(如：《中央公論》、《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載不多，但當時政治環境不利發展左翼活動，即便閱讀也不一定會在日記中留有詳實的文字記錄，僅能以鹽分地帶文學流派的實際運作來觀察左翼刊物的流動。在論及鹽分地帶與台灣當時各機關雜誌的往來時，必須特別關注的是《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這二大具有代表性的文學雜誌，因為這二份文學雜誌中，前者標榜聯合陣線的主張，使它成為日治時期壽命最長的刊物；而後者的左傾路線極為明顯，在楊達與吳新榮的密切交遊下，鹽分地帶文學自然與之有所聯繫；報紙方面則以「台灣新民報系⁷⁷」的討論為主，新民報系的歷代演變象徵台灣報章雜誌界裡的風暴總是不斷進行，每一次的改組更名都在凸顯它的政治風向，一九四四年被迫統合為日方官媒後可說已經整個褪去台灣色彩；至於風俗考察則以《民俗台灣》為主，文獻考察的工作是吳新榮投注最多、最長遠的一項事業，也是政治議題之外能夠落實愛鄉惜土的展現。本處就以此為方向，討論鹽分地帶文學同人與它們之間的關係，茲論如下：

(一)《台灣文藝》

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時期，吳新榮投稿到《台灣文藝》的日文詩作有：〈世界的良心〉、〈故里與春之祭—將這首詩獻給鹽分地帶的同志〉、〈煙囪〉、〈南鯤鯓廟祭〉。這些作品注重文化、藝術美感，在反抗主題的技巧呈現上，與當時張文

⁷⁷《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統稱為「台灣新民報系」，1940年改稱《興南新聞》，迄1944年台灣總督府迫全台六家日報統合為《台灣新報》，成立唯一言論的日方報社。

環等人所提倡的溫和抗日文學較能貼近。由於《台灣文藝》強調在非常時期下必須努力保留發言空間，因此廣納不同主張的作家組成聯合陣線進行對抗，然而因為不能有露骨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在實行上需要經由不斷的溝通協調，選擇登錄的作品在文字、思想方面仍盡量追求平穩，避開挑釁、爭議等可能煽動情緒的作品。而鹽分地帶同人中的郭水潭，號千尺，時任文聯佳里支部的編輯委員，後來雖也加入楊逵的台灣文學社，但從他曾為「南溟藝園」成員，以及一九四〇年加入西川滿主編的《華麗島》詩刊這些過程來看，郭水潭是比較傾心於文學創作的，政治立場不如吳新榮來的明顯。所以，郭水潭在文學表現上與《台灣文藝》當時的訴求是相對貼近的。另一位是莊培初，筆名青陽哲、嚴墨嘯，曾任《台灣新報》、《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亦為文聯佳里支部的會員。一九三五年他與同為鹽分地帶同人的林芳年共創《易多那》文學雜誌，創作以新詩為主，作品主要抒寫個人浪漫情感，追求純文學創作，重視寫作技巧。他的文學創作內容與政治議題距離相對較遠，否則以他新聞記者的特殊經歷，應該對文學、政治、時事有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可惜戰後放棄寫作，在台南從事貿易工作，絕口不談文學。

(二)《台灣新文學》

吳新榮投稿到楊逵主編的《台灣新文學》有日文詩二首：〈農民之歌〉、〈疾馳的別墅〉，內容是描寫農民的辛酸與階級壓迫制度的醜惡，這部分的作品放射出強烈的抗日思想與戰鬥精神。楊逵一向為農民發聲，早先他曾至佳里拜訪吳新榮，共同參與第一回的台灣文藝聯盟大會。然其後楊逵因不滿《台灣文藝》淡化左翼色彩，朝向模糊籠統的中間路線前進，便脫離《台灣文藝》另組《台灣新文學》，以期彰顯他的左翼精神，所以吳新榮投往《台灣新文學》的詩稿主題也以階級問題為關注焦點。另外，曾加入「南溟藝園」的王登山，同時也擔任了《台灣新文學》的編輯委員。但他在文學創作的表現上，非以階級問題見長，而是以鄉土的自然風光為描寫對象，予人清新之感。王登山起初專攻日本古典文學俳

句，其後轉向新詩創作，作品擅長描寫鹽村風光，有「鹽村詩人」之美稱，被日本詩人黑木瀨子譽為「新感覺派詩人」，從「新感覺派」這個稱號能稍微探知，王登山的詩作具有追求純文學的趨向，與鹽分地帶文學同人習慣的寫實筆法頗有不同，或許王登山「新感覺派」的詩風與「超現實主義派」的楊熾昌，在跳脫寫實主義的文學理論層面是可以連結上的，如此，王登山也將成為鹽分地帶文學中一朵異色的鹽分之花。

(三)《民俗台灣》

吳新榮在戰前已經投入民俗研究，除了日記裡有記錄投稿到《民俗台灣》的〈我的內台生活之交流〉和〈蕭壩剿姓邱故事〉，還有一九四二年就投稿的〈飛番墓與阿立祖〉。我本身是佳里人，自小知道篤加村⁷⁸庄內幾乎為邱姓，卻不知原因，直到閱讀吳新榮的文獻考察後才明白這段來歷。而〈飛番墓與阿立祖〉的民俗研究相當深入。我的外祖父母是番仔寮人，據說是平埔族的後代，因此對於年幼時曾跟著外祖母祭拜阿立祖一事還有些許印象，撰寫本論文期間我曾隻身前往奉祀阿立祖的慶長宮、西拉雅平埔文物村查訪，不過地處偏僻而人跡罕至，甚為可惜；往北走一小段路，就是北頭洋⁷⁹，我意欲尋找文獻中所提到的荷蘭井。我母親憶及她的童年時光時曾感嘆道，當年的北頭洋曾是眾多孩童玩耍探險之地，歡笑聲不絕於耳——不過現在的番仔寮村人口外流嚴重，北頭洋已是荒煙蔓草，歸於沉寂；荷蘭井也早已被封存，不可使用，僅立標示牌記載此井的歷史；幸而慶長宮每年農曆三月廿九仍持續舉行特有的夜祭，尚得以延續平埔族僅存的文化。

另外一位鹽分地帶作家徐清吉，對於保存文化也相當不遺餘力。戰前他以新

⁷⁸ 篤加位於台南市七股區，在臺 17 線以西。西鄰中寮里、東邊連佳里區、北接城內里、南到大埤里。當地居民皆姓邱，當地最大活動為冬至祭祖，聞名全台。篤加社區為台灣最大的單姓血緣社區。

⁷⁹ 平埔族語，原意是巫山。

詩創作為主，閒及隨筆，但作品不多；戰後則全力投入鄉土俚語與歌謠的蒐集、研究，著有《台灣俗諺新注》。由於俗諺能反映不同歷史階段或地區、族群的生活面貌，傳遞生活的經驗和智慧，因此具有很高的史學及文學雙重價值。有些過去的生活習慣或習俗已經消失，透過俗諺的流傳得以保存給後代，因此除了田野調查文化遺跡之外，語言研究也是文獻工作的重要環節。

(四)台灣新民報系

《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興南新聞》一脈相承，合稱「台灣新民報系」。雖然三個報社有深切的淵源，但三個名稱其實分別代表不同時期的發展。吳新榮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的日記中，記錄了鹽分地帶同人歡送莊培初任職台灣新民報社一事，當時鹽分地帶同人與《台灣新民報》偶有稿件往來，莊培初的參與，或許能使鹽分地帶文學在台灣新民報中佔有更重要的份量，不過顯然莊培初的影響力並不明顯，鹽分地帶同人的刊登作品未因此大幅增加。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台灣新民報》所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一九四一年改名為《興南新聞》後整體言論風格大不如前。一九四四年進入戰爭後期，日本政府由東京派員來台，將台灣島上較具規模的六家報紙《興南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灣日報》、《東台灣新聞》、《高雄新報》統一合併為《台灣新報》，成為日本官方唯一對外發言的媒體；《台灣新民報》於次日發表《停刊之辭》，結束自《台灣青年》以來廿五年的歷史。

談起台灣新民報系的演變史，其實是一段左翼政治力量消退的辛酸史。李承機分析，台灣新民報系從週刊轉型為日刊之後，為了符合檢閱制度的標準，左翼意識形態的文章已大幅減少。改組為興南新聞之後，更是失去為台灣人發聲的功能，從吳新榮投稿到《興南新聞》的〈獻給大東亞戰爭〉一詩來看，《興南新聞》時期所能接納的作品，大約只剩歌功頌德的應制之作了。

三、與革命家的往來

鹽分地帶文學流派與左翼抗爭人物之間的往來，最有指標性意義的是台共份子蘇新。吳新榮留日時期時值日本政府打壓日共，遭牽連而入獄，但回台後與台共的交流仍不平息。

蘇新是台南佳里人，吳新榮與蘇新二人就讀公學校時成績都非常優異。成績優異的二人對現實環境的感受相當強烈，但在選擇職業方向上二人有不同考量。吳新榮關懷現實的文學性格，在必須負擔家庭經濟的重擔下，僅能暫時壓抑著興趣，選擇就讀於台南總督府商業學校預科；蘇新則選擇社會科，進入台南師範學校。日本政府多方限制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目的在於防止政治反動，師範學院是少數當時開放給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同入學的學校。此即一九二二年以來，日本總督府頒布了「共學制」教育令，原本僅招收日籍學生的師範學校，也開始招收臺籍學生。然而蘇新發現臺灣人雖與日人共學，津貼卻有所不同：當時日籍學生每月領十五日圓津貼，臺籍學生僅領九日圓。蘇新對此種差別津貼極為不滿，常私下與同學議論。他認為：日籍學生功課不一定比臺籍學生好，為何所領的津貼較多？何況日籍學生的家長所領的薪俸原來就比臺籍家長多，而且大部分的臺籍師範生家境都很清寒，才是真正需要公費津貼的⁸⁰。在就學期間，不僅經濟方面有歧視問題，環境方面也充斥種族歧視、階級壓迫。蘇新在當時已深切感受台日之間的差別待遇，民族主義的火苗已悄悄燃起，年僅十六歲便加入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臺南分會。一九二四年，蘇新因忤逆師長⁸¹、校運潑糞⁸²二事

⁸⁰ 〈聞人留影：傑出的戰士——蘇新〉，台灣週刊，2003年9月，資料來源：

http://big51.chinataiwan.org/tsh/mtx/twzhk/200708/t20070801_403115.htm

⁸¹ 蘇新不滿一位日籍體育老師，屢次體罰一位年紀小而體格瘦弱的同班同學沈乃霖(新營人，後來為醫生)，蘇新向體育老師提出抗議，卻引起軒然大波。校長召開校務會議，判定他思想有問題，令他停止上課，每天在宿舍寫悔過書。

⁸² 校內運動會，校方依一貫的種族差別待遇，命令學生為日籍家長準備看臺與座位，但是臺籍的家長卻沒有任何座位、看臺。運動會前夕，蘇新與幾位同學由學校農場挑來糞便數擔，潑撒在運動場的看臺與座位上，此舉被視為不可原諒的行為，蘇新以「不適合為人師表」為由，被校方勒令退學。其他被退學的，還有沈乃霖、孫武虎、林加才等數位。

件遭台南師範學校停課及退學處分，赴日求學。赴日一行使蘇新更有機會深入接觸社會科學，在相對自由開放的政治環境中吸收各類意識形態。此時中國共產黨已加入共產國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也已成立二年⁸³，左翼思想從亞洲大陸延燒至日本，相關書籍被大量翻譯，蘇新正值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發展階段，便在這種氣氛下長期的、積極的從事左派社會運動，而吳新榮也持續與蘇新保持聯絡。吳新榮日記裡有一段記錄：

傍晚，外出往診回來，蘇新君在家中等著。他說昨天才出獄。在東京別後至今已十四、五年了，看不出他渡過了十年的鐵窗歲月，精神相當充沛。在此時局，提早一百天把他釋放，可謂受到了大恩典。蘇新一走，有許多人聞風來訪。⁸⁴

蘇新出獄隔天即前往拜訪吳新榮，足見其交情匪淺，離台期間應仍與台灣左翼份子有相當程度的交流。日記中提到「許多人聞風來訪」，卻不明白紀錄問訊者，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多數問訊者是鹽分地帶同人，而吳新榮可能考慮人名有曝光的危險，便不予以明白紀錄。

四、作品文字使用的問題

語言文字作為一種符號，不僅是溝通的工具，更有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意識形態等象徵意涵。日治時期殖民政府以語言劃分族群，甚至進行資源分配，主導了日語的強勢存在。皇民化時期更直接以政令壟斷語言的教育權、傳播權、使用權，使台灣人喪失語言權與主體性。

⁸³ 原稱蘇維埃俄國(簡稱為蘇俄)，成立於 1918 年；後於 1922 年更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

⁸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六 1942 年 9 月 25 日語，頁 339。

當代能以流利日文進行創作的作家如吳新榮、郭水潭、林芳年、吳濁流、王白淵、楊逵、楊熾昌、陳火泉、翁鬧、黃得時、張文環、吳天賞、龍瑛宗、劉捷、巫永福、王昶雄、周金波等人，平時能以河洛話和人溝通，書寫或創作則以日文思考，戰後便無可避免地面臨語言的轉換問題。許多作家必須重習漢文的書寫與邏輯思考，背後的重重大意義是擺脫臺灣或日本意識，重新學習並接受中國觀點詮釋戰爭、文化、社會制度等議題，因此，語言的跨越並非單純的工具使用問題，而是一種政治問題。一個國家的「語言多樣化」(linguistic diversity)不一定導致政治衝突；但若在語言背後存有更嚴重的政治問題，「語言」、「文字」就成為分裂的表徵。故政權尚未穩固之際，必先統一文字，而後才邁向政策面的改造。客觀而言，真正造成族群衝突的各種因素，是比如政策造成族群在政治、經濟、或文化資源上的分配不公，引起被支配族群菁英出面動員，而菁英之間的不妥協心態或撩撥更助長既有的憤懣。⁸⁵因此，語言多樣化的國家相對可能助長政治衝突。對於執政者而言，多樣化的語言似乎強烈暗示了多元種族、多方立場、多種意識形態……等衝擊「統一」的元素，這正是歷代政府想憑藉政治力量塑造單一通用語言或歧視他種語言的原因，而吳新榮等人則成為時代變遷中政治下的犧牲品。

三〇年代台籍知識分子所關注的語言消滅問題，是台灣意識覺醒的萌芽階段，這場戰爭的起始標記，是旅居日本的黃石輝於東京挑起了「鄉土文學論爭」。他在《伍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鄉土文學」的內涵必須在內容上書寫臺灣，形式上則透過臺灣話文的使用以達成言文一致，所要對立或者試圖切割的是日文和中國白話文，引爆了關於建設臺灣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之論爭。他的主張有二個重點：其一，挑明「台灣文學」的地域性，內容限定描寫台灣的事物，他所指涉的台灣事物是必須能夠引起普羅大眾感動的作品，自然以廣大的勞動者、小市民為主要讀者群。其二，既已設定讀者群為普羅大眾，那麼作品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也必須貼近大眾生活，達到所謂的「言文一致」方能消除隔

⁸⁵ 施正鋒：〈語言政治與政策·語言的政治關聯性〉，頁3。

閱。這番主張發表後，郭秋生站出來呼應黃石輝，並更進一步挑起台灣話文論戰，倡言作家應當使用台灣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在語言使用的激烈論戰中，語言已明顯被賦予政治意義。以民族劃分，日語使用族群主要是日本人；閩南語使用族群主要是來自福建的漢人以及被漢化的平埔族，及其出生於台灣的後代。以社會階級劃分，日語多半是掌握權勢者，或具有一定社經地位的台灣人；閩南語的使用者多為平民百姓，語言使用族群幾乎是壁壘分明。吳新榮留下來的詩作中，日文詩佔 52 首、中國白話新詩 4 首、漢詩 9 首、台語詩 4 首，日文詩所佔比例約八成，語其他語言的詩作比例相當懸殊。

在這些主張當中，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當時所稱的台灣話文是指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弱勢語族並不在此列討論中——然而使用人數的多寡是否就足以作為台灣話的代表？以存在台灣島上的語言而言，光是南島語系的原住民語就種類繁多，遑論其後的客語族群，但在當時的語言論戰中它們並未受到注意。

另外，三〇年代的討論串所提倡的「鄉土文學」，考究其探討的問題其實跟原鄉意識仍有一段差距，乃因它把大部分的重點聚焦在文字的表現形式，與七〇年代的鄉土精神本質不同。若依此而論，吳新榮作品中的日文詩、中國白話詩是否將被屏除在鄉土文學之外？答案未必公平。但以內容而言，〈歌唱鹽分地帶的春天〉表現對鹽分地帶的信心與展望；〈農民之歌〉站在農民立場發聲；〈故里與春之祭〉是獻給鹽分地帶同志的詩作；〈煙囪〉如實呈現日本殖民政府壓榨台灣蔗農的苦境；〈南鯤鯓廟祭〉描寫台灣地方特有的宗教民俗；〈疾馳的別墅〉批判階級制度的不公，此類皆屬社會寫實的創作，只是它們在形式上全屬日文詩，如此一來，語言形式與內容素材便無可避免地發生衝突。因此在語言問題與內容素材是否以台灣為選擇，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相關人士激烈爭論的焦點。

中島利郎在《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彙編》一書裡，大致劃分了當時鄉土論戰的幾個派別，如：張我軍提倡中國白話文；郭秋生支持以漢字作台灣話文；蔡培火主張以台語羅馬字來書寫台灣話。黃石輝不斷重申要以台灣的語言事物寫作的理由是要用最親近的語言書寫。只是，當時的台灣人受日本教育者亦不在少

數，最親近的語言不見得是閩南語。以吳新榮為例，他最熟悉親近的語言是日語，但他明白指出日語只是一種紀錄生活的工具，與抗日意識並不產生衝突。

除開日記，仔細分析吳新榮的散文，中國白話文和閩南語夾雜混用的情形非常多。可以合理推論，貼近庶民真實生活的狀況可能是日文、中文、閩南語交替混用，且普遍存在於社會中，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會造成溝通不良。但是，由於日文挾著強大的政權、地位、制度等力量，扮演著宰制台灣島內其他語言的角色，所以三〇年代的語言問題，表面上是工具使用問題，實質上牽連的是民族認同與意識形態的問題。日本學者上田萬年曾提出，「標準語」(即「國語」)的定義是「受過教育的東京人所說」的話語，「其正確地超然卓越於各方言之上」⁸⁶，這段話將「標準語」以尊貴之姿凌駕於各方言之上的優越心態，成為日本殖民政府逐步計畫消滅島內其他語言的支持，勢必引發台灣知識分子的反抗，例如支持黃石輝論點的賴和，將他的作品命名為〈鬥鬧熱〉、〈一桿「稱仔」〉……等就是以閩南語發音，內文也有大量閩南語詞彙，是有意識地以閩南語為創作藍本，顯見閩南語在當時的確是某些創作者用來對抗日文的工具。

此外，黃石輝認為使用閩南語進行創作，能使讀者有親切感，他將語言與寫實主義連結起來，影響的層面也進一步地深入創作理念的實踐。鹽分地帶同人一向高舉寫實主義的旗幟，作品中將受壓迫的大眾苦境、不畏強權的戰鬥意識，以淺白生動的文字，達成迅速傳播並引發共鳴的效果，這也是三〇年代關於台灣話推行運動的最終目的。

台灣話文的論戰烽火，在一九三七年的皇民化運動開始之後被強制禁聲。但是它的價值在七〇年代翻躍上升，成為台灣本土意識出頭的契機。彼時文學本土化與政治民主化運動相繼展開，在國民黨的壓制行動下，台灣話再次面臨更徹底的消滅危機。於是新一波的鄉土文學論戰重燃戰火，除了語言形式的舊問題之外，「現代性」也成為與「鄉土」對立的一個論戰關鍵概念。論戰中的各成員有

⁸⁶ 安田敏郎：〈國語・日本語・帝國—隱藏語言性的暴力〉，收錄於村田雄二郎《漢字圈的近代：語言與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頁42。

其不同的政治理念、文學信仰以及族群認同等的差異，使交鋒過程備顯艱辛而漫長。雖然論戰的發生乃因台灣本土意識受到打壓，卻也顯示台灣社會對語言權利的意識已經覺醒。而且，鄉土論戰的深層意義在於一步步形塑出台灣文學的雛型，成為八〇年代台灣文學正式出場的楔子。

第二節 吳新榮的文學觀

一、寫實主義的理論與落實

吳新榮曾在日記中寫道：「我所求的是更使人振奮的、更切實際的作品。所以我們非讀不行的書，既非古代名作，也非神品；應該是現代的、實際的，觸及現代人的心靈的，盡滲入現代人生活的，表達現代人之所求的、所想做的。」所謂「切實際」是呈現現實社會的作品，要能滲入現代人生活，且能表達現代人所求所想。他所領導的鹽分地帶文學主張寫實風格，明確的文學方針在〈致吳天賞〉一文中展露無遺，他說：「到底文學抽掉了社會性乃至思想性，則還剩下什麼呢？那不是只有文字的殘骸嗎？」⁸⁷可見吳新榮所主張的寫實主義，是建立在社會生活、庶民生活的基礎之上，具有思想意義的作品。因此，文學作品必須能夠清楚傳達它的思想內容，使大眾容易理解，或甚至得到啟發。這是鹽分地帶貫徹寫實主義的目的，主要就在於達到大眾傳播的效果。

另一篇〈象牙塔之鬼〉強烈反駁新垣宏一認為「文學是少數人的佔有物」之觀點，他說：「好的文學不該永遠是少數專家的專利品。……好的文學本身已具有大眾化的主要條件。譬如三國演義如何被大眾化，可想而知。」⁸⁸新垣認為文

⁸⁷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一〈致吳天賞〉，頁402。

⁸⁸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一〈象牙塔之鬼〉，頁405-406。

學不需要來自社會現象、社會生活的批評，是脫離大眾而獨自成立的學問。吳新榮承認文學有某一區塊的確無法剖析，亦即文學的本質；然而文學本質必須藉由文學手段來表現，而文學手段又是根據社會條件而決定其巧拙，因此，「否定來自文學以外的科學之批評，便是證明他(案：指新垣氏)對文學以外的科學之無知。」⁸⁹再者，藝術是否能脫離生活？吳新榮明白地指出，藝術是爲了人類而存在，如果藝術不能爲人生而藝術，而離開大眾生活，走向純粹爲藝術而藝術的象牙塔中，這是把文學當作「鬼」了。他在〈談詩〉一文中說：「其實詩境每時都在我的環境中，詩意每時都在我的生活中。」⁹⁰文學來自於生活，而文學的表現手法應該合乎時代性，「加添時代精神，使能趕上太空時代，而貢獻於國家社會。」⁹¹這樣的期許也表現在其他藝術作品的鑑賞方面，他認爲書法字應該具備四個條件：文獻性、鄉土性、文化性、藝術性，才算合格的藝術作品。文化與藝術是構成任何一種藝術作品的基本條件。較特別的是以文獻性而言，作品必然與歷史結合，使文字保有歷史情境下深刻的意義，才有保存的必要。鄉土性所包含的概念，兼指地域範圍或農工階級主題的書寫。這些主張帶有濃厚的左翼色彩，因此在它所領航的鹽分地帶文學之下，其所主張的寫實主義必然具有社會主義思想。

二、社會主義思想與鹽分地帶文學的結合

台灣抗日進程從武裝抗日階段推進到社會改革階段，期間歷經廿年(1895-1915)的動亂武裝，才逐漸邁向社會改革(1916-1945)階段，鹽分地帶文學誕生於一九三二年的社會運動時期之中，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如果要從社會主義的角度切入鹽分地帶的文學作品，就必須先了解：社會主義的不同路線對鹽分地帶文學是否產生變化？又或者，鹽分地帶文學與當時社會主義的路線紛爭始終保持

⁸⁹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卷一〈象牙塔之鬼〉，頁 405。

⁹⁰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二《瑯琊山房隨筆》〈談詩〉，頁 102。

⁹¹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二《瑯琊山房隨筆》〈談詩〉，頁 101。

距離？當鹽分地帶作家群有意識地進行關注於社會現象的創作，吳新榮所信奉的社會主義成爲其思想精神，以寫實主義爲其文學手段，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主題來觀察社會主義與鹽分地帶文學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細微變化：

(一)對殖民統治的批判

一九二七年的文協分裂事件，是社會主義路線分歧浮出檯面的至高點，當時紛呈並進的政治光譜劃分了派系的運作，也連帶影響不同路線的操作方式。當中王敏川一派的極左路線，逼退連溫卿的左傾一派，使得左派社會運動的陣營產生分裂，連帶波及文學作品。但是，一九三二年後的吳新榮，左翼思想表現在反抗殖民統治這個主題上，主要是以文學手段呈現而非社會運動，因此鹽分地帶文學即使有受影響，也非正面直接受到衝擊。以吳新榮一貫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來看，他所關注的反日本殖民議題，有民生問題、有刑事問題，在日記裡不斷以各種真實的情緒出現，醞釀一段時間之後才轉化爲文學作品。有時候則是直接在日記中寫下詩作，並未對外發表。如：日記中有一首無題日文詩，漢文翻譯如下：

用方便決定友情的／野蠻人們呀／用感情支配同志的／奴隸們呀／你們
若是人類的話必可感受／龐大的力量統一切／把一切結合起來／既有
龐大的力量在呼喚著我們／野蠻人們呀，奴隸人們呀／高舉雙手呼應吧⁹²

這首詩的反抗意識表現在於喚醒只見利益不見道義的野蠻人，以及善用煽動情緒來支配同志的奴隸，這二種人應爲握有權勢地位的人；所謂結合一切的龐大力量就是指普羅大眾的力量，提醒掌權者切勿忽視這股力量。普羅大眾一直是吳新榮關注的焦點，當他聽聞台灣拓殖會社要漁民提供土地作爲鹽田，吳新榮認爲漁民的處境可能像蔗農一樣淪爲傭工，在日記中他僅能表達知識分子的無可奈

⁹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一 1936年10月17日語，頁254。

何。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及閱讀《文學案內》，這份左翼刊物主張「站在勞動者立場的文學」，亦為鹽分地帶高舉的文學主張。勞動者一詞顯然是針對階級問題，以當時台灣社會的現實狀況而言，勞動者幾乎可以等於被統治的一方，因此台灣的階級問題也同時帶有民族色彩。吳新榮的抗日意識常以文學形式表現，在他的日記中曾提到，佳里文聯開會討論台灣新文學社的是非及新文學的意義，這是關於抗日文學中路線的再確定。而文學來自於現實生活，他在日記裡曾說：「缺了政治性的熱情，就無法寫出詩篇。」由此可知他的文學詩篇有一大部分是來自於對政治現實的反抗。

(二)抵抗資本主義潮流

吳新榮在一九三三年的日記中提到「米價暴落，大眾窮乏」的慘狀，這一點他認為是日本殖民政府與日本資本主義家聯手造成的情況。他在〈故鄉的輓歌〉詩作中寫道：

同胞們啊！
你不要忘了你的少年時，
在那明月亮亮的前庭裡，
看那兄嫂小孀杵著米，
聽那原始時代的古詩。
現在呢！
各地各庄都有舂米機器，
日日夜夜鳴著聲哀悲，
啊啊你看有幾人餓快死，
你看有幾人白吞著籤枝。
兄弟們呀！

你敢忘你的後壁宅，
蕃薯收成萬斤米千袋，
前季自用後季賣，
年冬祭季樂天地。
現在呢！
登記證已屬別人的，
稅金不納不准你動犁
生死病痛不管你東西，
又嚇又罵說這是時世。

早期農業時代以人力舂米，稻米尚未進行大量交易，當時農民生活富足，生產的稻米若有餘裕才會銷售到市場上。「舂米機」的出現，改變了農業時代的步調及生活方式，機器代替人力，也暗示資本主義開始進駐農產品的生產過程，因為舂米機器是高價商品，非一般農家所能負擔，專業的碾米廠取代了慢速生產的人力。諷刺的是，稻米開始大量交易之後，農民反而只能吃番薯籤，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呢？史明從日本國內稻米需求量大增來分析，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崛起，使得稻米需求量大增，造成日本境內米量供不應求，使得米價不停上漲。臺灣總督府為了因應日本國內米穀的需求，便積極移植本國稻種，亦即俗稱的「蓬萊米」，政府透過水利支配及獎勵栽種，終於推廣成功。由於種植「蓬萊米」的經濟收益比種植「在來米」及「甘蔗」來得好，因此很快地便普及全島。但是，培植蓬萊米原非為了島內消費，所以培植成功後，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輸往日本。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的稻米生產方式，加上高額的佃租，農民往往因為貧窮，只得將自用的稻穀拿到市場銷售，自己以蕃薯充饑；造成蓬萊米輸出愈多，農民愈貧窮的情況。⁹³

白米大量輸往日本的結果，不但沒有促進財富累積，反而造成勞動人口餓

⁹³ 參考自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上冊》，加州；蓬島文化，1980，頁 374-375。

死，乃起因於日本殖民政策與資本主義聯合壓榨農民。這也是吳新榮一生信奉社會主義的原因，畢竟他見識過蔽護在國家主義羽翼下的資本主義，是如何犧牲農民利益：將登記權狀掌握在手裡，不顧農民生死病痛的劣行。當資本主義向舊時代的社會生活侵襲而來，不僅農民的經濟能力被剝削，也強迫改變了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他在另一首〈故里與春之祭・河流〉裡寫著：

難得春祭我歸鄉的時候

我必不忘訪問這條河流

可是我再也看不到映波的竿影

向對岸高呼

也聽不到渡頭老爺的怪腔調

啊，河流的新主人是這座水泥橋嗎？

而客人就是即駛過的公車嗎？

「映波的竿影」應為當時釣青蛙的竹竿，竿上綁著繫蟲餌的絲線，一根根立在河邊。早期台灣漁村的兒童們很流行釣青蛙，因為青蛙容易上鉤，上鉤之後即使有機會脫逃，也常死心蹋地緊咬蟲餌不放，因此兒童在釣青蛙的遊戲中往往能獲得很大的成就感，還能替晚餐加菜。看不到這些竹竿，代表這些捕捉遊戲已然消失，消失的原因沒有明說，但讀者能隱約感受到社會型態在悄悄轉變，使得童趣不復存在。「渡頭老爺」應是傳統社會中的擺渡人，以人力運送渡客，不僅花費的時間長，且一次的運輸量也有限，新建的水泥橋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可以提供較大的運輸量，但卻冰冷、堅硬，象徵資本主義的無情冷漠、追求快速的都市節奏。而都市的興起同時也帶動公車業者的興起，公車的運輸量方能跟上都市的需求。在吳新榮的眼裡，原本記憶中純樸的故鄉已經變質，資本主義挾著現代化的快節奏滲透到故鄉的各個角落，改變村莊原有的生活型態。

(三)社會改革的發聲

除了批判、抵抗之外，吳新榮更進一步建構社會改革的藍圖，主要表現在醫療制度上，在他的醫論篇章中談及「醫業國營論」、「醫藥分離論」、「產兒制限論」也是後來台灣醫界所注重的議題，他在這些文章裡明白指出：國家須以社會主義的思想為理論基礎，建立完善的醫療制度與明確的實行政策。並且進一步強調，身為醫生要具備社會責任的意識，批判某些國家民族利用民族醫學以取得或保證世界的優越權。因此無論是民族醫學、體育醫學或治療醫學、預防醫學，都必須在健全的社會制度下運行，才不致於淪為商業利益或征服資本。

另外他引用了《中央公論》裡安田博士所論述的「醫學的偏在性」，說明高社經地位的人多患了「過剩營養與過少勞動」所引起的疾病；大多數的勞動人口則因「過剩勞動與過少營養」生病，且因貧窮大眾的經濟能力無法負擔高價醫藥費、獲得完善的醫療資源，往往使勞動人口貧病交迫。要平衡這樣的現象，他主張設立大眾醫院來解決。在醫業國營論中所提的「大眾病院」，主要在解決病人所能負擔的經濟問題，這與現行健保制度的理想不謀而合。吳新榮以醫生身分發表醫療公營論，因他身處醫界，處在醫療第一線的位置上，了解當時台灣社會大多數病患因經濟問題而放棄治療，希望能保障病人接受治療的權利。他這篇〈社會醫學短論·醫學的偏在性〉所提及的階級性，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病患粗略分為二類。其一是有產者的疾病，主要是缺乏勞動所引起；其二是無產者的疾病，乃因過度勞動所引起。吳新榮以社會學的角度去觀察病患，自然意識到生活環境與勞動程度，對於疾病種類之生成、培養有莫大影響。醫學既然有其偏在性，設立大眾病院便相形重要。但因為吳新榮主張大眾病院由地主或資方出錢，對無產者的診療一律免費，這在實施上有一定的困難，因為無論地主或資方幾乎都是商業取向，必須要靠政治力量才有可能達成。即使部分資方設立勞工病院，名義上替勞工作健康檢查，然而一旦檢查出疾病，便要求員工離職，反而使勞工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至於他所提出的慈善病院雖是低醫費，但指出其問題是偏向收容學

用病患，不斷作動物實驗，又或者做為解剖材料，病患沒有基本尊嚴。凡此種種醫藥相關問題，吳新榮將其整理而後發表於雜誌，值得注意當時醫療體系的結構問題。

三、鹽分地帶文學中的鄉土意象

鹽分地帶這個名稱本為地理名詞，當它成為一種文學名詞，背後的象徵意義與土地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北門七子以吳新榮為首，還有徐清吉、郭水潭、王登山、林芳年(原名林精鏐)、莊培初、林清文一共七人，創作內容充滿許多北門地區特有的鹽鄉、鹽村情懷。

他們發表的文章與「土地、人民」息息相關，除了「鹽」還有「糖」，如林芳年發表於《台糖通訊》的〈談儲運叢務的實際問題〉，還有〈台灣糖業史〉，都能明確指出現實生活中的糖業問題。而他的日文詩〈在原野上看到的煙囪〉以文學手法直批日本殖民政府壓榨蔗農。在鹽分地帶的文學作品中，寫實主義能迅速、實際地描繪庶民生活百態，而且容易傳播出去，造成廣大的影響力，因此，從社會關注議題乃至於日常生活的描寫，只要能夠表現地方特色，都是鄉土意象。

除了文學作品之外，風土記錄是另一種更貼近事實的文字紀錄。吳新榮在戰前便已開始注意風俗文化的調查，落實他左翼思想中關懷社會底層的部分。所謂的社會底層，也就是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會弱勢，不僅指人民，也包括弱勢語言、弱勢文化等一切被壓制的族群。

吳新榮除了文獻訪考的資料之外，還有對當代烏腳病的訪視與記錄，記錄妹婿王金河與其妻毛碧梅在北門奉獻畢生心力照顧烏腳病患的事蹟。烏腳病據推斷應為飲用水中含砷量過高所引起，初期由於四肢末端血液不流通，無法獲得足夠之營養及氧氣，皮膚會變成蒼白或紫紅色。患者會感到末端麻痺、發冷及發紺等症狀，若受壓迫就會產生刺痛感，有時亦會間歇性跛行等。若病情更進一步惡化

會造成靜止組織的營養缺乏，產生劇烈疼痛。根據記錄，病人往往痛到顏面變形、身體扭曲、在地上打滾，趾部發黑、潰爛、發炎，甚至造成壞疽再自然脫落。嚴重者發炎區域會擴散，腳組織可能悉數壞死，只能以手術切除。王金河夫婦忍受病人患部發出的陣陣惡臭，長年照顧鄉村中的烏腳病患，這些病患往往又是社會上屬於經濟弱勢的族群，貧病交纏，受人忽視。若無這些文字紀錄，也許只能淹沒在歷史洪流之中了。

而北門七子之一的郭水潭，在他的〈宋江陣〉篇中則記錄了民間廟會流傳的習俗。它是一種結合武術與舞蹈的民間藝術，起初成立的背後精神在於平定地方亂事，甚至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發展到後來便賦予宗教意義，有了驅魔避邪、保衛人民的力量。宋江陣原本是屬於農閒時期農村子弟學習武藝的活動，日治時代因高壓統治，才成爲宗教活動酬神娛人的武術表演性陣頭。國民黨戒嚴時代，宋江陣因需使用刀械，所以遭到政府刁難或禁止。至今還保留宋江陣樣貌的有：西港烏竹林廣慈宮、麻豆謝厝寮紀安宮的金獅陣，和七股頂山代天府的宋江陣、樹仔腳寶安宮的白鶴陣。這些歷史與文化，本來是可能被冷落的記憶，幸而鹽分地帶的作家們將文學觸角延伸到鄉村中各個幾乎被遺忘的角落裡，記錄了值得被保存的人、事、物，爲後代留下彌足珍貴的文化資產。

四、與風車詩社的對照

鹽分地帶文學是台南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寫實文學指標，而與此同時，台南市區也出現了超現實主義的風車詩社，主要領導人物是楊熾昌，筆名水蔭萍、南潤。此外還有林永修(又名：林修二)、李張瑞(筆名：利野蒼)、張良典(筆名：丘英二)，以及日本人戶田房子、岸麗子、尙梶鐵平(筆名：島元鐵平)等人。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產生於法國巴黎的超現實主義在日本文壇引發一陣風潮，當時日本作家有

百田宗治、西脇順三郎等人提倡，有《詩與詩論》、《詩·現實》、《椎木》等雜誌響應。當時留學日本的楊熾昌，所接觸的超現實主義並非直承法國體系，而是過西脇順三郎所認知，進而轉介入日本文壇的超現實主義。所以在論及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之前，須先了解日本文壇對超現實主義的解讀。一九二九年西脇順三郎撰寫《超現實主義詩論》大幅影響日本文壇對超現實主義的認識。法國的超現實主義源自於對理性主義開始產生質疑、反動的藝術體驗，在達達主義的基礎上，得到佛洛伊德的夢與潛意識的啓示，以奔放的想像力分離固著的文化、秩序，再以「知」重新結合不相連的元素，形成認識世界的樂趣。西脇與波特萊爾都否定詩走向純粹抒發情感的基調，意即詩必須走向知性、合乎理性的概念，所謂的「超現實」是一種理念世界的超現實世界，能夠想像，能夠反諷，能夠破除習慣，這種與現實世界的衝突與不協調，將形成全新的美感經驗。

然而《風車詩刊》刊銜標題為法語，採不定期出版，且只刊登同人的作品，每份數也僅限於七十五本，用粗糙的台灣竹紙印刷，在文學界中及市場上的影響力遠不如寫實主義。鹽分地帶文學所追求的是書寫社會底層的憤怒，表現普羅大眾受壓迫的面向，語言文字明朗而容易閱讀，自然也容易引發社會共鳴。而風車詩社的超現實主義，提供了另一個角度來切入台灣社會，以第三者的眼睛觀察並尋求文學的新形式。但以當時台灣社會封閉保守，文壇盛行寫實主義的情形，的確缺乏能夠培養超現實主義發展的空間。尤其作品裡出現的遣辭用句一旦趨近主觀化，雖能創造文學唯美氛圍，但是否能引起大眾的共鳴則未可知，如：「黃昏使玻璃色的少女恍惚」以玻璃色形容少女神態是具有美感的，也充滿想像空間，但同時也可能造成閱讀理解上的困難。再者，將異質事物並列，試圖連結不同元素之間的關聯，形成跌宕的畫面效果，在當時是相當前衛的語言形式，但大眾的接受度則相當飽受考驗。茲以楊熾昌的〈靜脈與蝴蝶〉為例：

灰色的靜謐敲打春天的氣息

薔薇花落在薔薇圃裡

窗下有少女之戀、石英和剝製心臟的
憂鬱……
彈著風琴我眼瞼的青淚掉了下來

貝雷帽可悲的創傷
庭園裡蟾蜍鳴叫
夕暮中少女舉起浮著靜脈的手
療養院後的林子裡有古式縊死體
蝴蝶刺繡著青裳的褶襞在飛……

余玉琦在分析這首詩時曾說：「少女的手布滿針孔導致靜脈浮腫，而後在療養院裡選擇自縊，結束己的生命。之後蝴蝶翩翩起舞，使原本凝滯的氣氛又活躍起來。」⁹⁴靜脈是少女，蝴蝶也是少女；靜脈是趨近死亡的象徵，蝴蝶是美麗與重生的象徵。靜脈與蝴蝶之間，透過自縊的儀式產生了連結關係。一般論者認為這首詩的少女應該是指楊熾昌的戀人——今井民子。詩中所牽涉的物品意象，呈現跳躍的隱喻特質，如「石英是堅硬的礦物，剝製心臟是將心臟標本化，象徵不改變的心意。同時也暗暗呼應民子的胸疾難以承受戀愛阻撓的痛苦和憂愁，只好將之標本化，讓死亡維持永恆的心意。」⁹⁵以堅硬的「石英」、「標本化」來使愛情達到永恆的目的。作者所挑選的詞彙，彼此之間看似各自獨立毫無關聯，然而背後卻有一股精神意象流動、串聯其中。

風琴的音樂聲令人聯想到教堂中喪禮的儀式，在這場儀式中無法承受悲傷而「青淚掉了下來」。「青色」能夠聯想的範圍非常廣，可以是青澀、迷濛，也可以是或藍或綠或黑的冷色調。現實生活中眼淚不會有顏色，然而在詩人的想像中，眼淚是令人怵目驚心的青色，不是暖色調，這是經過「知」與「理性」的選擇，

⁹⁴ 余玉琦：〈詩人與戀愛——水蔭萍詩作中的女性形象〉，台師大《海岸線》第四期，2008年5月7日。

⁹⁵ 同上註。

也是超現實主義中強調理性世界的想像。

鹽分地帶文學的寫實風格往往語言質樸熱烈，充滿浪漫感性的色彩，表現反抗主題時追求強烈明朗的風格；相對於風車詩社的冷調理性，甚至是耽美，不僅在寫作主題上呈現隱晦手法，政治上則選擇避開爭議，既不歌頌也不批判，讀不出抗日意識，楊熾昌的發言也明白指出面對政治議題時風車詩社屬於「不予置評」的明哲保身。

爲什麼在台南這塊土地上，能同時孕育出二種不同面貌的文學風格？從大環境的因素來分析，抗日文學固然是主流，然而在殖民政府嚴密的審查制度下，書報雜誌及任何形式的出版作品都在層層把關之下，許多作品面臨被查禁的命運。楊熾昌認爲文學應與政治做切割，相較於鹽分地帶文學強烈反映寫實的抗日精神，風車詩社的作品沒有政治色彩，所以未受日本當局的干擾，這或許是一種另求生存的方式。

再從文學內部的因素來分析，在寫實文學一片轟轟烈烈的撻伐聲中，憤怒與悲哀與犧牲，過多的呈現反而容易使這些深沉的悲痛逐漸變得廉價；風車詩社選擇轉入一條幽深蹊徑，踏著少數人的步伐，脫離現實世界，進入深層內在精神中探索各種情慾與感覺，毋寧是一種反叛，或可視爲是一種沉默的反擊，以此抵禦當代受壓迫的政治現實環境。「風車」面對強風時不逆風高飛，而是把這陣風轉化成文學動能，磨出詩的精髓——對生命中的苦痛愈感到無奈悲哀，對詩中世界的藝術要求就愈顯凝煉。

這種反動的現象在文學發展史上其實很常見。明代公安派的崛起，就是對秦漢派和唐宋派的反撲，在模擬風氣盛行的時代裡，公安派有意識的創作一系列清新自然且具有高度審美意識的小品文，成爲晚明跳脫模擬風氣的力量；而後來台灣現代詩社本身的發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民國四十二年紀弦的現代派主張「橫的移植」，隨後引來藍星詩社提倡「縱的繼承」，二方爭論不休之際，創世紀詩社倡導「超現實主義」，與現代詩社、藍星詩社相互抗衡，影響台灣詩壇近廿年。因此可以說，風車詩社的誕生其實是帶有強烈反省色彩的。它是一種質疑，

對權力、主流進行省思，揭開物質世界中各種情慾，直至碰觸死亡、病態等隱藏在社會角落裡的現象，那些不被攤在陽光下討論的憂愁，不被認可的煩惱，一一被提點出來，以晦澀的文字排列成星羅棋布的美麗意象。同時它也是對寫實主義的反向思考，風車詩社正是追尋破除絕對的表現形式之先驅，它開啓了五〇年代中被威權困鎖的靈魂鎖鑰，以墮落、沉淪、頹廢的負面書寫構築抗拒虛偽的力量。那麼，或許風車詩社所發行的詩刊雖只發行一年就停刊，火種卻似乎並未熄滅，只是以餘燼之姿小火慢燒，留待後人點燃薪傳。

五、鹽分地帶文學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定位

台灣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台南素來是最早發展文化的都市，而鹽分地帶文學作為日治時代台南鄉村的文學流派，在民族認同、土地認同、語言認同等主題的呈現上，有其獨特的時代精神以及特殊的地域風貌。

鹽分地帶文學流派從成立之初就立意走向鄉土文學、寫實文學的道路，接連有大量屬於地方文學的作品出現，成為台南地區印記鮮明的文學流派。

在文學派別尚未產生之際，鹽田、魚塢早就存在於北門郡一帶，這就說明了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來自於生活，它的目的在於重現，或者以另外的姿態呈現幻想中的境界。遠離了「生活」這個元素，文學作品將可能成為沒有靈魂的文字方塊。鹽分地帶文學同人所進行的努力就是找尋「人」與「土地」的連結關係。北門郡土地的鹽分含量決定了人的生活方式，鹽分地帶文學所主張的寫實主義便從人的生活方式作為起點，往前尋求歷史、文化的蹤跡，往後啟發人的新生活方式。從吳新榮考察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發現歷史是公平的，公平的讓每種文化與風俗存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然而它也是不公平的，誰掌握發言權誰就留下記錄，沒有獲得記錄者只能被悄然吞沒，然後被遺忘。所以鹽分地帶文學以各種文字記錄——無論是詩或散文——為鹽分地帶留下歷史，留下文學足跡，留下生活的記錄。

它不只是日治時代的一種地方性質的文學現象，更是見證歷史的文學派別，因為它所包含的文字記錄跨越了政權轉移、多元種族、文化交替、多重信仰等等複雜的議題，甚至跨越時空留存至今。

當文學能夠跳脫為單一政權、單一族群服務，才能顯現它真正的歷史價值，也才能為文學本身留存命脈。透過閱讀鹽分地帶文學作品，對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產生理解與同情，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社會衝突，這是鹽分地帶文學的力量；此外，了解先民的奮鬥，更讓後人學會珍惜目前所擁有的資源，這更是鹽分地帶的貢獻。在研究鹽分地帶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鹽分地帶文學想傳達的鄉土意識，實際上是一種包容多元文化的進步觀點，從吳新榮研究的荷蘭時期，到明鄭時期，到清領時期，到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掌權，無論執政者如何轉變，原住民文化(包含平埔族)、漢人文化、日本文化始終兼容並蓄地存在大眾生活裡，影響我們至今。即使曾有強制性的政策企圖消滅其他文化，但被文字記錄保留下來的，就保有了它的歷史價值。

唯文學與歷史最大的相異處在於，歷史記載已經發生的事實，而文學不只可以重新詮釋已發生的事實，還可以討論假設性的問題、勾勒未來的輪廓，更可以討論各種文學形式與技巧的呈現。鹽分地帶文學除了吳新榮研究的歷史文獻之外，同人們也積極與當代的台灣文學匯流，密集參與台灣北中南各地的文學集會，在左派右派的抗日路線中不斷磨合，產生大量的寫實文學作品。縱使現在討論鹽分地帶文學主要是以日治時代為背景，但鹽分地帶至今仍有作家持續加入，寫作題材也因時代轉變而有不同延伸，日後在文學史上的定位還有可能朝新的方向邁進。

第五章 吳新榮作品分析

第一節 戰前作品分析

吳新榮對外發表的作品以詩作為主，兼及散文、隨筆、評論、日記、回憶錄，還有歷史文獻。本節所討論的範圍在二戰前所創作的作品，而戰前作品主要以大量的詩作為敘述主軸，除了因詩作數量豐富，更因其詩具有相當深刻的社會意義，強烈的戰鬥意識、反抗意識，能夠完整呈現吳新榮當時的社會環境，反映其政治家國之思。根據《吳新榮選集》所收錄的詩作，依主題區分可劃分為：戰鬥意識詩作 20 首、青春戀愛詩作 16 首、社會寫實 9 首、感慨省思 5 首、思鄉情懷 4 首、悼念親友 4 首、家庭親情 3 首、寫景抒懷 3 首、文學思想 1 首、詩社句集 1 首、其他 4 首。其中戰鬥意識的詩作佔絕大篇幅，70 首中有 20 首，幾乎佔去三分之一，也凸顯吳新榮在戰前最關心的主題就是抗日意識；青春戀愛的詩作也佔有相當多的篇幅，這部份將與《亡妻記》綜合探討其寫實派的抒情美學概念。

一、詩歌內容中的戰鬥意識

吳新榮的文學創作以詩歌為主，因此將以詩歌作為探討的主要對象。根據《吳新榮選集》中所收錄的詩歌作品中，戰鬥意識類占多數篇幅，肇因於他關懷時事而創作，茲選以下幾首詩歌進行分析：

(一) 〈題霧社暴動畫報〉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爆發霧社事件，此一事件不僅震動日本政府當局與國際社會，也連帶引發一連串的文藝作品出現。對於關心時事的社會各界人士

紛紛以他們熟悉的方式，呈現對這事件的看法。但是敢直接挑明霧社事件主題者，只有賴和與吳新榮而已。吳新榮於當年十月廿九日寫〈題霧社暴動畫報〉⁹⁶，主標題點明事件發生地點：霧社；「出草」是早期原住民獵人頭的風俗；副標題寫明以山歌曲調填詞，山歌，亦即原住民居住地：山，俗稱原住民的歌曲為山歌。主副標題都象徵這是以原住民的情感基調書寫這首詩，表達他對賽德克族抗日事件的支持。以下就內容句意分析：

雖然生番也是人，日日強迫無錢工；古早都趕反一過，這時敢就去投降。
搶我田地占我山，辱我妻女做我官；高嶺深坑飛未過，冬天雪夜餓加寒。
我有一族數二千，雖然無刀也無銃，但是天地已寒冷，眼前哪有紅頭兵。

第一句的斷句應為：雖然(原住民是)生番，但(他們)也是人，應該受到同身為「人」的待遇。在整首詩中的第一句就明白揭示「人皆生而平等」的概念，強調不分種族、國籍皆應享有同等的基本人權，可視為詩作中心思想。第二句具體闡述日本政府剝奪工作權、財產權，紀錄日本政府以「強迫」的手段，除了壓迫原住民這份人力資源，更惡劣的是以無酬勞方式，達到以最低成本掠奪各項資源的目的。僅此一理由就足以令原住民群起反抗，故帶出第三、四句的抗日意識。第三句說「古早」時候曾經反抗過日本政府，指的是一八九五年起所進行的一連串武裝抗日行動。據張炎憲的觀察，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反抗運動，是以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為分水嶺。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五年屬武裝抗日時期，一九一五年之後至一九四五年統治結束，是政治抗日運動時期，當時最大社會運動是以林獻堂為首的請願設立臺灣自治議會。進入政治抗日階段，意味著統治者與台灣的緊張關係進入稍微趨緩的狀態——未料一九三〇年爆發霧社事件，代表日本政府的政策仍然不脫高壓本質。正因如此，吳新榮才說，繼承祖先精神的原住民們難道此時要選擇投降嗎？這是一個激問語氣，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詩的第二

⁹⁶ 本詩又名：〈霧社出草歌(唱山歌調)〉

段，更深刻的將日本政府的卑劣手段嶄露無遺，不僅剝奪工作權、財產權，更進一步直指政府佔據自然資源——亦即剝奪生存權，甚至是婚姻權、政治權也一併被犧牲。當時的吳新榮無法預知一九三七年的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後，連宗教信仰權也會受到侵襲，否則必然寫入詩作中。詩中的「高嶺」、「深坑」，除了是原住民居住地的地形描寫之外，也象徵或矗立、或橫阻在原住民眼前的種種困難。「飛未過」是閩南語的說法，翻成中文是「無法飛過」的意思。以無法飛越深險的地形象徵無法穿越現實生活中的阻礙，是非常有文學想像的手法。這樣的表現手法在春秋時期的《詩經》中也屢見不鮮，如〈蒹葭〉：「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寫實文學中的地形隔閡，不僅是空間距離，往往也是心理距離的暗喻，寄託理想與現實差距甚迥的無奈。下句的「雪夜」既是現實世界高山當中會發生的場景，也象徵弱勢族群的苦難。在雪夜中挨餓受凍的不是養尊處優的日本人，而是辛勤付出的原住民，漫漫長夜正如賽德克族心中壓抑許久的太陽旗被蒙上黑夜的陰影。面對不公不義的處境，詩人在第三段的心情急轉直下，表明原住民人數雖少，卻敢勇於反抗強權的堅韌意志。「天地已寒冷」呼應原住民「雪夜」的艱困；「紅頭兵」是日本兵的代稱，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可看見這個流行民間的稱呼，如：鍾肇政《姜紹祖傳》⁹⁷中有一段流傳坊間的歌謠：「早知日本東洋鬼，打進雞籠港口邊；禽獸紅頭兵匪類，每逢婦女就強姦。」當中所提到的「紅頭兵」即是日本兵。這個稱呼的由來是人止關事件⁹⁸，賽德克人因此役日軍士兵頭戴紅色軍帽，日後稱日本人為紅頭人"tana dudu"。吳新榮詩中「眼前哪有紅頭兵」為豪情萬丈之語，即使無刀無銃，也不把日本兵放在眼裡，更可解讀為誓死殺盡所有日本兵。整首詩在豪氣干雲之中戛然而止，餘韻無窮，反抗強權的戰鬥意識迴盪不已。

⁹⁷ 鍾肇政：《姜紹祖傳》，近代中國出版社，1977年10月1日。

⁹⁸ 人止關隸屬南投縣仁愛鄉，為埔里通往霧社必經之地。當地因眉溪流經於仁愛橋至大觀橋之河段形成峽谷，地勢自成天險，故於清代令禁漢人上山止步之地而得名「人止關」。一八九七年日方為開闢道路，派出測量隊至霧社一帶進行探勘，遭到賽德克人攻擊而全數被殲滅；日方因此視賽德克族為抗日族群，對霧社展開經濟封鎖。一九〇二年更試圖將既有隘勇線向深山推進，與賽德克人發生人止關之役，日方慘敗。

(二) 〈不但啦也要啦〉

另一首〈不但啦也要啦〉，又名〈呈南方的青年〉，以複沓章法造成反覆吟詠的聲情效果，期許來自台灣的青年們致力於目前的研究，以求貢獻台灣社會。

南方的青年呀！
我們學醫：
不但要治自己的空腹
不但要圖家族的幸福
我們學醫：
也要治社會的病毒
也要圖民族的光復！
南方的青年呀！
所以我們
不但要努力現在的研究
不但要實現眼前的要求
所以我們
也要奪還一切的自由！
也要打倒人間的怨仇！

這首詩以情緒高昂的呼告法起始，是吳新榮一九三〇年的作品，原中文發表於南瀛會誌第二期。南方，是相對吳新榮在日本而言，故鄉(台灣)的方向。詩人不斷提到「我們」，表示他對於台灣當時的知識青年們心中是抱有期許的，尤其是學醫的青年，在當時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因此他勉勵自己也勉勵同志，

學醫不該只是「治自己的空腹、圖家族的幸福」更應該跳脫經濟因素，涉足社會、教育、思想等領域，醫治「社會的病毒」，此處用了借喻，指出台灣社會有「病毒」的存在。病毒雖有強烈傳染力，但可以被治療。正如台灣人民的思想、心靈被病毒控制，但若能持續努力，有朝一日可以將病毒驅逐體外。這個病毒所指為何？在下一句的「民族光復」，顯而易見的令人聯想到就是日本殖民政府。因此詩人說「要努力現在的研究」，研究什麼？除了專業醫學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的病情，所以詩人加入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前身即社會科學研究部)，所研究的就是社會科學。吳新榮寫這首詩的時空背景，前一年才剛發生四一六事件，所謂「實現眼前的要求」，不過是要求「自由」與「平等」這類的基本人權，然而這些基本人權卻必須用「奪還」、「打倒」的方式才能獲得，凸顯台灣人民的悲哀。詩的韻腳從ㄨ韻轉為ㄩ韻，都是發音深沉的韻母。一般而言，韻腳的選擇與詩的感情方向有所關聯。大凡押ㄨ韻的詩歌音調會比較上揚，ㄨ韻或ㄩ韻等發音深沉的韻母，情緒多偏幽深孤峭或悲怨憂憤，聲音大抵與情緒有關。

(三)〈農民之歌〉

題目很清楚地指出描寫對象為農民，但詩中的焦點不在受迫的陰暗面，而是從奮勇抵抗的強悍表現戰鬥精神。

咱們的祖先還擁有更偉大的東西

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他相信那是一種火

那火——由於發自全身

所以他們什麼也不怕

遇上大敵就戰鬥到底

為生活就不屈不撓地工作

最後不忘把讓子孫繼承那火

咱正是繼承這把火的

經過所有的世紀和制度

這火永遠沒有熄滅

說來夠多愚蠢的傢伙呀

叫喊咱是無知的人喲

咱要那樣叫你們

再一次什麼都不帶

空手握鋤拼拼看

那麼你們將會徹底明白

這火不像燧火的火花

這火有時會暴跳旋轉如雷電

它曾在大陸燒盡一切不正和不義

就是現在也在這裡那裡

撲向暴虐和壓迫在戰鬥

那麼兄弟們——永遠的叛逆者喲

歷史總是毫不留情地

把咱們趕到最後的線上

這條線——雖然過重

但咱們還是要繼續守下去的

祖先身上所擁有的火，就是戰鬥精神，一種對抗艱困現實的勇氣。吳新榮的先祖吳廷谷當年冒險率領子孫渡海來台，篳路藍縷、披荆斬棘，僅憑手中的工具和險惡的氣候、環境開創吳家的基業。這份頑強不屈的精神傳到後代子孫身上，展現出來的是對不公制度的質疑和勇於推翻的勇氣。詩中說再一次空手拚搏，對

抗的對象從祖先時期的自然環境轉變成社會環境，在呼告的語氣中，吳新榮熱烈澎湃地將微弱的燧火點燃，而後燃燒，最終成爲暴跳旋轉的雷電，由燧火突發爲雷電般猛烈的反抗，散落在人間各地，這裡、那裡，燒盡人間的不正與不義。他在這首詩的結尾強調後代必須繼承祖先的這把火，即使歷史上的反抗者永遠是艱辛而困苦的，但還是要緊守「這條線」，這條線就是正義的防線，也是社會主義的防線。他出身於農村望族，但同情農民，因此在農民主題上同時有社會主義的關懷與犀利的批判，這是他的詩作裡表現戰鬥精神最明顯的地方。

(四) 〈煙囪〉

〈煙囪〉是吳新榮詩作中圖像色彩最鮮明的作品，詩中藉著強烈對比色隱喻勞資雙方的悲喜，運用貌似和平的景像刻畫出被壓抑在殖民社會底層的痛楚。

青青甘蔗園連綿的大平原

五月風

涼爽吹來時

葉尾顫顫

次第傳著波浪

一幢白色壯觀的屋宇

浮現於遙遠的彼方

黑高的煙囪聳立

直接碧空

青——白——黑——碧

微風和葉波

那太過於和平的光景

任何畫家也畫不出來

但一到冬天
這白色屋頂下
資本家嗤嗤而笑
這黑色煙囪上
喘出勞動者的嘆息
啊，榨出甘甜的甘蔗汁
流出腥腥的人間血！
於是煤煙與砂塵染遍了
陰慘灰色的平原
沉悶的天空
終至腐蝕了人們心胸
啊，任何畫家也不能畫出
這歷然光景
不久結帳的日子來到了
煙囪底下聚集的黑影
人人手裡二張白紙
「領狀證」與「借用證」的金額
不平又奈何
哀嘆的妻子
挨餓的孩子
指著這白圭的高塔吧
白色的屋宇是枉死城
黑色的煙囪是怨恨的標的

這首〈煙囪〉是一九三五年的作品。詩中先從一大片連綿的甘蔗園入筆，鋪排在大地上的顏色是「青青」蔗葉，夏季五月時分，蔗葉在風中翻騰，畫面優美平和。鏡頭由低而高，由遠而近，再拉遠。從青色的平原往上帶到白色製糖廠，再聚焦於黑色的煙囪，最後拉遠，收束在碧藍的天空。在天地廣袤的青與碧之中，黑與白是極不搭調的顏色，詩人特意以顏色凸顯他欲表達的重點，就是與這片平和景象格格不入的黑與白。但是這首詩並不是寫景詩，這種平和的畫面與接下來所敘述的血汗工廠形成強烈對比，處處充滿諷刺意味。

詩中第二段的場景從夏天拉到冬天收成的時候，製糖工廠開始裁切、壓榨甘蔗進行製糖。裁切與壓榨，本為製糖的進程，然而台灣蔗農又何嘗不是被日本殖民政府放到製糖工廠裡裁切、壓榨呢？每根甘蔗被送進工廠裡，都要經過二次裁切、與多次壓榨，在一次次的壓榨過程中，每一分資源都務求達到最高使用率，即使連蔗渣也都回收再利用成為工廠動力。正如蔗農的勞力被利用殆盡，成渣之後也要再被剝削所得金額，直至屍骨無存。資本家的「嗤嗤而笑」對照勞動者的「嘆息」；工廠榨出甘甜的甘蔗汁，同時也榨出腥腥的人間血。在這一笑一喟、一甜一腥之間，控訴的是台灣蔗農在過度勞動之後，利益幾乎被資本家抽取殆盡，所得與付出不成比例。第二段的顏色意象豐富，除了黑煙囪與白屋頂，還有腥紅的勞動者的血，以及被煤煙、砂塵染成灰色的平原。這是一種調色盤的概念，將黑與白調和、擴染，直到平原蒙上灰色，「終至腐蝕了人們的心胸」。流竄於這片灰色地面的，則是腥紅的人血。煙囪是直的，而人血橫流，無法可管，這一縱一橫的線條所構畫而成的竟是人間慘景，且遍布全台。

第三段說明了資本家嗤嗤而笑的理由，因為拿在蔗農手上的二張證明，一張是領狀證，是土地登記證；一張是借用證，類似借據的法律文件。這二張證明幾乎互相抵消蔗農應得的金額。當時民間流行的一句諺語「天下第一蠢，種甘蔗乎會社磅」，此指最愚笨的人就是種甘蔗給會社秤重，因為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種甘蔗，而且收成後不可自由出售，只能賣給製糖會社，所以價格任由會社宰割。而製糖會社又在稱重量時將甘蔗成品的重量任意壓低。

一九〇五年後藤新平推行糖業保護政策，開始實施「採收區域制度」，意即甘蔗只可賣給該區域內的糖廠。郭弘斌將糖廠與蔗農之間的關係可分為三種情形：

一、雇蔗農耕作；二、自耕農與會社訂契約提供原料；三、蔗農耕種會社的所有地，成為會社的佃農。在第二種關係中，會社往往先提供前貸金，待收成後再結算並償還。然而會社低價購蔗的結果，使得蔗農在扣除前貸金後，還需另借現金來清償。第三種關係實則等於農奴。因為在「採收區域制度」下，價格任由會社訂定，蔗農不得拒絕；秤重量時刻意減少原料斤兩；蔗農耕作，會社刈割，但刈割工資卻由蔗農負責；其他規定如耕地要六道犁及四尺壟，否則每千斤扣二角，要施肥二十五包，否則扣二角，收購時若含有雜物又需扣，蔗尾要完全保留給會社。在此種環境下，蔗農扣除生活所需每年要虧損二百至三百圓。在農地的取得方面，日人以政府暴力令日警拿著召喚令，把原台灣地主叫來，百般威迫利誘，強迫將土地賤售與日本糖廠，如此在一九二七年有六萬二千甲蔗作土地就落入了日本資本家糖廠的土地。⁹⁹

在終年勞動之後，不僅沒有收入還得虧損，無怪乎詩中出現「哀嘆的妻子」、「挨餓的孩子」。詩人將白色的意象，與民間喪禮俗結合，成為「枉死城」的象徵。枉死，代表無意義的死亡，反覆出現在詩中的白色，從糖廠屋頂，變為人人手中的白紙，最後化為枉死城的顏色。整首詩在「青、白、黑、碧」的冷色調中，唯一出現的暖色調只有人間血的「紅」，以顏色的強烈對比，定調整首詩的控訴氛圍，藝術手法很接近於十九世紀的巴比松畫派，這種自然主義對寫實主義的興起有很直接的關係，也可以間接證實吳新榮早年在日本所受的自然主義影響，與

⁹⁹ 郭弘斌：〈台灣人的台灣史——蔗農爭議與蔗農組合〉，台灣海外網，資料來源網址：<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86.htm>

他一貫的寫實創作理念互相吻合，在這首詩作中，吳新榮運用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的手法，完整呈現他的反抗意識。

(五) 〈疾馳的別墅〉

這首詩以更寫實的手法描述夜間搭火車的經驗，透過詩人的眼睛，在擁擠狹小的空間裡，階級制度在高密度的空間壓縮下更顯得尖銳而深刻。

如此擁擠連腳跟站的地方都沒有
我就注意到緊鄰的二等車廂
何等雪白的套子套在椅子上
到處都空著沒有人坐
對於這群婦孺與過勞的我而言
隔壁的車廂宛如天堂
至少這遠程的三分之一
至少這夜間的一兩小時
真想到那疾馳的別墅休息一下
我忘了這年關的逼迫
引率妻與子魚貫而入
我像償得了一生的願望
又像成了大富翁
昂然一個人坐了一個位子。
然後移目看了看四周
不意四五個穿和服或燕尾服的人種
正驚奇地望向這邊！
我突然注意到我古舊的西裝

和沾滿汙泥的鞋子
次一瞬間我悟出偉大的發現：
假若這地上沒有……的話
就沒有畫了界線的天國
隨著夜漸深我們愈感覺寒冷
還是三等車廂裡的人較溫暖
何況那體臭也令人懷念

這首詩可以分為三個部份來剖析。第一部分從「如此擁擠連腳跟站的地方都沒有」到「真想到那疾馳的別墅休息一下」，這部分是過度勞累的詩人心中的想望；第二部分從「我忘了這年關的逼迫」到「正驚奇地望向這邊」，此部分詩人將渴望化為實際行動；第三部分從「我突然注意到我古舊的西裝」到「何況那體臭也令人懷念」，回到詩人的自我觀照，並在結尾點出三等車廂的可愛之處。詩中從擁擠的車廂環境寫起，擁擠的程度「連腳跟站的地方都沒有」，按常理而言，這班列車應當每個車廂都是如此擁擠——實際上卻有空車廂、空坐位，原因是當時殖民政府依據種族或貧富差距，區隔出一等、二等，乃至三等的車廂，通常一列火車掛一等車廂、二等車廂各一，其餘都是三等車廂，這種區分方式是不平等待遇，保證日本人能夠享受特權。當時的台灣平民往往只能坐三等車廂，又因三等車廂的車票沒有管制售票數量，常常發生乘客爆滿，不得已而擠到二等車廂的廁所，遭到列車長驅趕人的糾紛。不同的車廂彷彿不同世界，無論是種族不同或貧富差距，這二種主題都是左翼思想最為排斥的障礙。在夜間的列車上，吳新榮注意到二等車廂中有許多空位，雪白的椅套象徵乾淨的空間，相較於三等車廂中擁擠而且有難耐的汗臭味，二等車廂「宛如天堂」。詩中說「忘了年關的逼迫」，是因過度疲憊忘記身分的限制，或者，所謂的種族身分並不是詩人所在意的，我們無從得知。總之，詩人拋開諸多限制，將想法化為實際行動，領著妻小進入二等車廂，從這裡可一窺詩人心中隱藏怨怒不平的情緒，並有挑戰不公的勇

氣與行動。進去之後，發現「四五個穿和服或燕尾服的人種」以奇怪眼神注視詩人一家。這裡以服裝來區分身分角色的不同：和服借指日本人，燕尾服是當時新式的西服，借指西洋人或者富人，詩人稱呼他們為「人種」，特別強調種族的差異性。接著詩人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雖是西服樣式卻古舊，象徵自己雖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卻仍舊是台灣人，「汗泥」更隱含卑賤之意。然而詩人並不感到慚愧，相反的，他領悟到「假若這地上沒有……的話」句中刪節號是不能明言的忌諱，暗諷日本殖民政策將階級制度伸向社會各個角落，天國本不該有種族的界限，在車廂中更不該出現人種的劃分。二等車廂宛如天堂但終究不是真正的天堂，真正的天堂不會因為夜漸深而使詩人感到寒冷，進而想念三等車廂的溫暖。這裡的溫暖除了是因擁擠而產生的生理觸覺，更是心理上的溫暖感覺，即使連體臭都顯得令人懷念了。同一班列車中，三等車廂如同貧民窟，二等車廂卻如一幢別墅，這給詩人強烈的衝擊。

二、日記的出版—〈亡妻記〉

一九四二年三月廿七日吳新榮的髮妻毛雪過世，在這一年的日記中，吳新榮寫下他最真實的情感。日記分為二部分，的一部份是「逝去青春的日記」，第二部分是「回憶前塵」。

面對摯愛的死亡，是世間最難承受的痛，卻也最無法向人訴說。每句安慰的言詞只會引起更強烈的哀慟，正如吳新榮所寫的：「最好是一個人靜靜地想你的事情。」然而這樣靜靜地想，回憶愈甜就愈傷人，每日醒來想的是髮妻；每夜醒來第一個想到的也是髮妻，這種傷痛每分每秒嚙咬著，直至眼淚決堤才罷休。日記中最動人之處，就在於樸實的文字、日常生活的描寫裡，才能讓我們看見時時刻刻圍繞在吳新榮身邊的人事物，每一件都讓他想起妻子，也不斷在提醒他妻子

已經逝去的事實。

〈亡妻記〉的出版，讓我們看見在戰鬥的靈魂下，也有一顆柔軟的心。相較於年輕時期的戀愛詩篇，〈亡妻記〉的文字深沉而冷冽。從三月廿七日起始，到四月廿七日共一個月的時間，詳實記錄毛雪病危到逝世的過程，與後來的心路歷程。讀至吳新榮看著圍繞在毛雪身邊的至親和五個小孩，和抱著毛雪遺體上車發動車子之後，小孩們突然安靜下來、停止哭泣，此情此景實在令人不忍卒讀。

在第一部分「逝去青春的日記」中，吳新榮白天除了忙於工作及家務，便是訪墓、辦法事；夜裡常有失眠、夜夢的情形。一向抱持無神論的吳新榮，至此也不得不聯想起妻子過世前的種種徵兆。雖然以科學理論視之，種種徵兆只是無稽之談，卻可見一個丈夫對妻子最為深切的懷念。

日記作為一種文學體裁，不同於傳統的創作文體，乃因它完整記錄作者隱私，對於情感反應也相當直白，劉永皓曾對日記文學作以下論述：

在文學的傳統當中，日記文學有著它特殊的書寫與閱讀契約。它必須具有私密性，真實性，與每日的辛勤書寫耕耘。許多的文學大家除了小說創作之外，日記書寫也是他們天天努力經營的文類之一。例如卡夫卡(Kafka)、吳爾芙(Woolf)、史湯達爾(Stendhal)、喬治·桑(George Sand)等人皆是很好的例子。然在西方古典文學當中，一般而言日記的出版是在作者前往天堂之後，日記才可以與它的讀者見面。¹⁰⁰

〈亡妻記〉的出版，是吳新榮生前日記中唯一出版的部分，關於這部份的相關書評，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記中有一段紀錄：「本季號的《台灣文學》中，有一篇黃得時君的〈晚近台灣文學運動史〉，其中有一節如下：『《台灣文學》中有詩人郭水潭、隨筆家吳新榮、張星建、陳逢源等，第五號發表的吳氏

¹⁰⁰ 劉永皓：〈日記文學與網誌文學：一個初步的美學的思考與比較與分析〉，第二屆網路文學研討會，新竹：交通大學，2004年。

的〈亡妻記〉，讓人聯想到《浮生六記》，賺得不少讀者熱淚。』又，前月號的《民俗台灣》中，雷公生評述如下：『《台灣文學》第五號發表的吳新榮氏的〈逝去的春天的日記〉中，從其夫人至第一個月期間的記錄，不僅有送葬民俗的貴重資料，即使文章方面有些缺點，但不失為富有表現力的、無限哀傷感的作品。』¹⁰¹

許多人對於日記的出版之可信度抱有某種程度的懷疑，認為作者是否在設想觀眾的意識下進行書寫，實際上吳新榮在出版〈逝去春天的日記〉之前，並無設定讀者的存在，書寫感情方面直抒胸臆，有很強的真實性；第二部分〈回憶前塵〉則比較能嗅出文學氣息，畢竟，時光能篩選掉以往的爭執與缺失，淘洗後的記憶就更加凸顯夫妻之間過往的甜蜜相處。至於現實生活中的繁瑣與怨恨，很容易在回憶的長河中被洗淨。對於自身應酬外務太多，導致妻子操持家務過度勞累的懺悔、其他日記篇章中記錄了吵架時對妻子的咒罵與怨恨、與酒家女侍的曖昧交往……這些文字相較於〈亡妻記〉而言，又更貼近真實的生活面貌。因此，閱讀〈亡妻記〉之餘仍必須理性地結合其他日記文字，方能零斷地拼湊出吳新榮感情世界的圖像。縱然如此，仍不免令人設想，發展婚外情畢竟不是光榮之事，為何要冒著被盤查翻閱的危險而寫進日記呢？尤其吳新榮青年時期曾因日記被政府沒收，應不至於全然放膽記錄不利於己的事實。然而值得去思考的一點是，假設在當時，逢場作戲是一種榮耀，可以證明自己魅力猶存，或證明自己的經濟能力可使女侍甘願賣笑，那麼寫進日記不僅並非可恥，反而還是一種炫耀了。這種心態不是吳新榮一人的獨特表現，實為當時的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男性思維。邁入日治時代之前，台灣社會主流思想仍存在著強大的沙文主義，表現在政治層面上，是種族歧視；表現在性別層面上，是父權主導。這樣的狀況到了日治時代更被推向高峰，無論是種族或性別，都備受高壓政治手段與社會風潮的考驗。在這樣的思維下，家庭內務瑣事，一向不是男人主動幫忙。吳新榮回想與妻的對話中，也時時可見這樣的思維。

¹⁰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六 1942年11月1日語，頁350。

我正輾轉反側，睡不著時，南河叫著：「媽媽，我要尿尿。」似乎想起媽媽已死，便改喚道：「爸爸，我要尿尿。」若在平時，你就起來給孩子尿尿。假如亞姬子吮著奶的話，你就說：「爸爸，你替我起來弄一下呀。」天已快亮了。廚房裡傳來了碰撞的聲音。必須叫南星與朱里起床，以便上學。要是平時的話，我真想說：「阿芬，你起來準備給孩子們上學吧。」但是雪芬呀，現在我要馬上起床，替妳做一切事情。¹⁰²

這段文字裡，可以感受到一個父親對於處理孩子們的生活瑣事是如何不熟悉，面臨妻子過世的苦境，除了要以理智抵抗愁悶，更要適應父兼母職的忙亂，顯然令人身心俱疲。只是，處理這些事務，其實是替「孩子們」做一切事情，而非替「妻子」做一切事情。這二者的出發點有顯著的認知差距。若要以現代社會「男女平權」的觀點來鞭笞古人，並非絕對正確的作法；然而也無須過度美化古人的行止，扭曲解讀當時的社會情境。從閱讀日記的過程中，除了看見丈夫對妻子的深情之外，也隱約窺見當時的社會結構，在父權社會下的女性為家庭所付出的青春與健康，幾乎是全盤奉獻。

作為個人情感、思想的私密紀錄，吳新榮個人為何願意出版毛雪過世這段期間的日記？他對「日記」的態度是否有預設觀眾的立場？上述提及與侍女曖昧可能是炫耀心態，也間接引出一個問題，即：向誰炫耀？從〈亡妻記—逝去之春〉卷頭語：「日記是遺留給子孫的悲歡記錄」所透露的訊息，可以知道至少他的日記有預備給子孫觀覽，出版〈亡妻記〉對後世子孫是具有紀念意義的。那麼，除了設定子孫是觀覽對象之外，對於往後「日記可能被公開」是否也有心理準備？這一點也應該是有的。自從四一六事件青年時期日記全被沒收以後，吳新榮本來已經打算不再寫日記，然而自覺彼時有太多重要事件不斷發生，個人的情感意志如果沒有被記錄下來，或許就可能隨著時間而被遺忘，他說：「因為日記可當我

¹⁰²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一〈亡妻記〉之一，頁 133。

們生命之記錄，因為日記可為我們生活之反省。」¹⁰³他留下紀錄除了是給自己當作生活反省之外，也說明它是生命的記錄。既然留下記錄，自然有可能再度遭遇青年時期被沒收的悲劇，因此他在日記中提到較常往來的蘇新便稱為S君，郭水潭稱為K君，如果不是出於保護自身及朋友的立場，何以不能直書人名？只是，日記畢竟是自由書寫的文體，當中仍有某些記錄對自身而言是具有危險性的，這一點吳新榮自己很清楚，所以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百日逃亡期間，吳新榮將日記掩埋在故鄉將軍鄉某處樹下，以躲避政府查緝。

第二節 戰後創作轉向與政治、文化意識之衝突

一、語言轉銜與國族認同

語言、文化有所謂強勢弱勢之差別，伴隨而來的霸凌現象無孔不入。日治時期的日文使用者往往具有較高的自尊心及優越感，隱藏背後更深層的意識是國族認同。

吳新榮日文作品的句子通順流暢，相較之下，戰後的中文創作用詞夾雜日語、閩南語，明顯表現出中文詞彙匱乏的窘境。一九〇七年出生的吳新榮，自幼所受的教育即是日文教育。教科書也充滿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思想，在長期的浸染下，思想上能夠不受影響已屬難能可貴，語言文字要全然放棄更是不可能。語言是文化的結晶，使用日文，在某種意義上代表接受了部分的日本文化，進而可能引發混亂的國族認同危機。在日記中有一段紀錄，顯現吳新榮當時對於「台灣」或「日本」的認同差異。吳新榮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曾大聲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我們，現在重新思考各種事情。一些矛盾思考，都

¹⁰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一 1933年9月4日語，頁3。

是因為內心的混亂而來的。我們看了史書，應能知道我們個人是多麼地無力。」¹⁰⁴當他意識到自身的努力處在時代洪流中有如滄海之一粟，不禁開始反思：以匹夫之力真能促使「國家興亡」嗎？又，如果匹夫無從選擇他所認同的國家，那麼這個國家的興亡是否真為匹夫之責？這個來自內心的混亂，或許就是國族認同的混亂。這種心情在遭遇緊急狀況時更為明顯，他的日記中寫著：「午後突然緊急召集防衛團。……恐怕這是台灣，不，是日本第一次的被空襲吧。」¹⁰⁵被美軍轟炸的到底是台灣還是日本？吳新榮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台灣」，而後才改口說「日本」。這是一種被矯正的認同痕跡，在矯正的過程中，勢必出現思想的拉鋸戰。吳新榮也曾在日記中產生這樣的疑惑，而出現一首詩：「如果你是愛的殖民地，而我就是那侵略者嗎？如果最後給你的是，文化和教養，幸福和和平的話，那麼侵略是罪惡嗎？」¹⁰⁶這樣的疑問，不僅是吳新榮個人的疑問，也是所有日治時期作家所面臨的難題。認同侵略者的心理狀態，某種程度上很接近「斯德哥爾摩症候群」¹⁰⁷。但是單一的心理情結並不能全面解釋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境況。因為身為被侵略方的台灣作家在情感上仍存有疑慮：一、台灣人是日本人嗎？二、台灣作家的作品需要配合戰爭國策嗎？重重的認同危機引發不斷的爭辯與拉扯。曾士榮認為吳新榮內在同時存有漢人意識和日本意識，二者在戰爭時期開始發生明顯衝突。引述並翻譯如下：

從一九三七年後期所開始的戰爭動員之後，他逐漸投入戰爭，內心的衝突進一步發展為不道德感。他對戰爭的評論有兩種層面的暗示，其一是做為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人，對中國具有某種同情，乃因台灣跟中國有種族跟文化上的連結。吳新榮在一九三五年有一首日文詩，詩名叫做〈四

¹⁰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二 1938年1月16日語，頁190。

¹⁰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二 1938年2月23日語，頁210。

¹⁰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二 1938年3月12日語，頁216。

¹⁰⁷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英語：Stockholm syndrome；瑞典語：Stockholmsyndromet）又稱為人質情結、人質症候群，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

月二十六日—南鯤鯓廟〉，他特別提到因為四月二十六日是鄭成功登陸台灣，驅逐荷蘭人的日子。自那時起，南鯤鯓廟就建立了，向鄭成功的勇氣與精神致敬，而這座廟宇正象徵了國家的文化和民俗藝術的本質。吳新榮作為一個漢人的意識在此詩中展露無遺，而這種潛藏於吳新榮台灣意識之下的漢人意識，正面地、直接地衝擊他的日本意識。¹⁰⁸

在這段文字分析裡，有三種意識同時存在吳新榮的內在思想。台灣意識來自於身處台灣的現實環境，漢人意識來自於種族與文化的記憶，日本意識來自政治與教育的政治環境。這三種意識以本質區分是截然不同的三個面向，台灣知識份子的思想剖面也往往是三方拉扯或三方各自表述。例如賴和、楊逵是明顯的台灣人意識；王曉波偏屬漢人意識；龍瑛宗、葉石濤則有日本人意識揉雜其中。吳新榮自身也不得不承認：「以日本方式來思考、處理事物，因為這樣較為方便。我們是迫於方便和必要性而被同化了的年臺灣人。」¹⁰⁹

吳新榮內心的日本意識並不純粹，這種意識本身亦矛盾叢生。因為他能接受的是日本積極、精準、效率、科學、法治精神等原則；卻不能認同侵略本質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違背他所謂「世界的良心」，違背公平正義的道德良知，這一點也是他產生所謂「不道德感」的原因。尤其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吳新榮面臨日本侵略中國的現實，內在衝突又再次達到顛峰。這種矛盾與衝突，後來出現新契機。他將日人統治台灣(中國)是為中國史上被外國民族滅亡的第三次。第一次指蒙古人建立元朝；第二次指女真人建立滿清。曾士榮指出：根據日記記載，吳新榮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間時常閱讀《中央公論》，而《中央公論》上曾出現一篇日文文章〈中國與日本的合作之道〉，作者暗示中國不應該抵抗日本的侵略，因為日本不同於蒙古或滿州的侵略目的，而是要在帝國主義精神之下，

¹⁰⁸ Tzeng, Shih-jung. From Ho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page 112. (中文書名：曾士榮：《從本島人到本省人：台灣國族意識的起源與發展》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年，頁 112。)

¹⁰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二 1938年1月19日語，頁 192。

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這種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企圖合理化解釋日本侵華政策。顯然吳新榮閱讀《中央公論》後才在日記中寫下如此的論述，這樣的解釋給予日本發動戰爭一個強大的背景支持，也成為日後官方正式對外的宣稱。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一方面去推測：吳新榮在日本政府的監控下，日記中不能表現太多反對日本侵華的想法。不過比較折衷的解讀應該是，如果反對這樣的說法，保持沉默會比記錄在日記中來得更合理。

回歸吳新榮日記中所記錄的閱讀面向，以日本作家觀點出發的作品占多數，包括所收聽的廣播節目、所欣賞的電影，也是以日本作品居多。尤其他在戰爭時期仍然保持大量閱讀的習慣，並且不定期到台南戲院觀賞電影作品，長期接收日本觀點所產生的意識型態轉變，的確有可能讓他在國族認同上發生混亂。

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之後，他思想中的日本意識才順勢退場——然而此刻的台灣意識和漢人意識的衝突戰真正開始。這種不斷發生自我意識衝突的心理過程，表現在語言文字使用的爭論議題上更為明顯。後來在七〇年代鬧得沸沸揚揚的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這種意識之間的角力戰，只是當時尚屬萌芽階段。觀察戰後吳新榮的創作，可以發現他中文、閩南語都有運用，卻難臻成熟之境，畢竟日文還是他熟悉自如的語言。

二、戰後的政治處境與遭遇

台灣地方文獻的考察不該僅被視為左翼文學的實踐，也該被視為知識份子在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下僅能從事的工作。台灣政治白色恐怖時期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廿日開始，直至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二日為止，期間長達四十三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政權退出台灣。吳新榮立即在隔天改以中文書寫日記，以此表明回歸中國的欣喜之情。起先吳新榮在戰後積極投入政治運動，乃因對國民黨政府抱持信心與希望，包括籌組國民政府歡迎籌備會，以及三

民主義青年團，甚至投入選舉活動，當選台南縣參議員，這份對台灣政治的熱情直接表現在政治活動上。無奈這份熱情被緊接而來的整肅左翼、清除共產黨等運動擊碎。最直接的致命點是二二八事件，以當時台灣人民的法治觀念而言，國民黨政府的處理方式不僅粗糙，更是以欺瞞人民的手段進行殺戮。

三、左翼文學的實踐：鄉土文獻考察

日治時期，吳新榮已經開始著手研究台灣民俗，並與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人密切來往，並多次投稿至《民俗台灣》。當時所持的理由與自覺的責任是完成南方島國的民俗記錄。這種基於日本意識的創作基調，是否在戰後投入文獻考察時，已經有所轉變了呢？戰後的情勢讓他重新審視文獻考察的工作。

吳新榮所主張的寫實文學，本質在紀錄現實世界裡的底層生活，左翼書寫充滿批判與戰鬥意識，卻在生命後期轉向研究不具爭議性的文獻考察，成為溫和的左翼份子。鄉土田野調查可以有二層意義：其一，它是左翼文學的實踐，是寫實文學中保存文化根源的珍貴紀錄，挖掘先民的歷史有助於瞭解現實環境的變化，可以藉由找尋文化傳承的脈絡，尋求歷史定位。其二，它是白色恐怖政治下少數能從事的左翼文學活動，政治環境一旦不利於激進左派的發展，民俗學、考據學……都是很好的掩護外衣。因此，這類的文學轉向在文字獄或思想禁錮的各個時代相當興盛。令人好奇的是，日治時代許多不平等的嚴刑峻法沒有令吳新榮怯步，然而國民黨執政時期，吳新榮却從一開始懷抱熱心的政治參與者，逐漸轉化為一個冷眼旁觀的紀錄者。影響吳新榮面對政治態度丕變的原因，以下從幾個層面討論。

羅詩敏認為台灣人民深受日治時期的法治觀念所影響，政權轉移後人民普遍無法適應國民黨軍政府的集權統治，這一點可以解釋吳新榮態度轉變的部分原因。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軍政府二者本質同為掠奪，然而在法治觀念的落實程

度上則有相當大的落差。國民黨政府的軍隊與警察制度不僅對人民具有強制力量，更常以欺瞞手段進行檯面下的殺戮，甚至有與黑道合謀暗算政治敵手的嫌疑。日治時期法條雖然不平等，但是人民有明確的規則可循，甚至在一定範圍內有集會及公開演講的自由；相較於國民黨政府，法律制定與執行，雙方時有落差，賄選、關說層出不窮，民無所措手足。

另一層面是執政能力的表現與人民期待的落差過大。國民黨執政時期，不僅承襲日治時期各種資源分配不公的剝削政策，挑起省籍惡鬥，更衍伸出通貨膨脹、糧食危機等民生問題，人民對現實政治的情緒非但是失望，更是憤怒。尤其米糧危機的問題足以動搖國本，卻不見執政黨拿出因應辦法。在糧食問題的對策討論，實際結果就是供出制度(供應國共內戰米糧所需)不能停止，已經引起民眾憤恨；配給制度也無法實行，因為自八月十五日之後，食糧營團各級機關大都停止配給工作，而各自買占食米，擅自提高米價以圖謀龐大利潤；而公價制度則有執行上的困難，要在物價普遍高漲的時節，單獨抑制米價，是違反經濟原理的。然而這些政策即使有執行困難，也並不是完全無法可想。消極的方式包括：限制酒、米粉或餅類的製造；嚴懲賣價超過最高單價的販售商；推動糧食節約運動。積極的方式如：打破地方圈經濟，使物資自由交流；修復交通工具優先運輸糧食；進口外國肥料以應付稻作；接收水利事業以利灌溉工作順利進行。這些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執政者雖可預見糧荒發生，卻依然將糧食大量運輸到中國以應付當時的國共戰爭，自然民怨四起。

此外，教育也是一個影響更長遠的問題，蘇新點破所謂「教育平等」的盲點：

光復後，省署所施的教育制度，由表面上和形式上看來，學校的門戶是無不開放的，無論男女貧富，均有就學的權利。但是在實質上，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在教育方面所受的痛苦，是比日人時代更加深刻。……百般物價日日飛漲……家庭不能負擔，致已就學的兒童青年也不得不離開學校……這種現象在農村更加顯著……此風如再長去的時候，除生活富裕的家庭少

爺小姐以外，大多數勞苦大眾的子弟，恐永遠沒有就學的機會。¹¹⁰

教育問題其實是立足於經濟問題之上，如果經濟問題沒有獲得解決，教育不平等的問題只是其中一個層面，這種平等的假象很快就被戳破，因為日治時代的台灣人子弟尚能就學接受教育，但是到了國民黨時期，一般人民無法負擔子女的教育費用，反而造就更多文盲，成為社會進步的一大阻力。

最後，令吳新榮失望的還有三民主義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所信奉的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然而陳儀抵台不久後，三民主義青年團被下令重組解散，到了二二八事變後，又再次被國民黨解散。原本受命重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李友邦，二二八事變後則以通匪罪名被處死。於是三民主義的招牌，可以隨時被置於「因時制宜」的處境。吳新榮在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後，確實對國民黨接收前的秩序維護起了作用。然而也僅止於此作用，接收後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已然被視為地方勢力，受到中央政府的嚴密監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吳新榮在日記裡寫下：「四人各脫衣裝，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聲絕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¹¹¹顯見他內心對於回歸祖國相當感動，出席各個官方或私人會議可謂不遺餘力，如北門區建設委員會議、北門區隊幹部聯席會議、醫師公會。未料，其後當選縣參議員，擁有理想與實行的決心，反而是造成日後失望的根源。一年不到，就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的日記裡寫著：「青年團的縣政府幹部招待會，我們也不要去吧……不合作有形無實之輩，不合作貪官汙吏之輩，不合作假公弄私之輩，不合作無情無理之輩。」¹¹²當時的政治環境有省籍對立，地方派系的對立，政爭不休，貪官汙吏橫行，使得政令難以推行，社會上還有衛生條件低落導致霍亂疫情蔓延的問題，國民政府的無能終於使他萌生退出政壇之心。不過真正退出政壇的爆發點是二二八事件，由於吳新榮身任地方調解委

¹¹⁰ 蘇新：《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時報出版，1900年1月1日，頁329。

¹¹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八 1945年8月16日語，頁174。

¹¹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八 1946年5月18日語，頁268-269。

員會，深涉其中，被迫面對緊接而來的逃亡與入獄。諷刺的是，後來陳儀被調離台灣，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實際上並沒有為二二八事件受到任何懲處。

當吳新榮寫下〈洪水〉這首描述二二八事件的詩作，凸顯當時台灣的菁英們明白政治大勢已去，尤其國民黨對陳儀的處置令人徹底失望。出獄後的吳新榮，已經將政治的熱情轉移到文獻考察的工作，這段時間他蒐羅地方傳聞，實地到採訪地進行訪察、考古，整理著作為《南台灣采風錄》和《震瀛採訪記》。

在《南台灣采風錄》中，他談到台灣是否有原住民的問題。他認為以人種學和地理學而言，無法定論山地族和平埔族就是原住民，但能夠確定的事實是：「山地族比平埔族早，平埔族比漢民族早在台灣。」¹¹³從這些訪察紀錄來看，可知台灣原本就屬於多元種族雜處的環境，加上外來政權更迭，這些歷史導致今日仍存在各種爭論不休的政治議題。追尋歷史軌跡有助於現今的人們了解台灣土地上存在過的種族、政權，明白多元種族構成台灣歷史的一部份，外來政權也是構成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應該尋求共生並存，而非強勢消滅非我族類，這對於台灣人審視自我歷史的價值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他所收錄的南部農村俚諺，以閩南語為主，並且針對各地方言研究發音系統，整理出語族(語系)：「我台灣省內之語言大部分屬漢藏語族，只高山族的語言為印度尼西亞系，即為南島語族，台南縣下之平埔族語言亦有馬來語之痕跡此亦屬於南島語系。」¹¹⁴語系的研究與早期台灣種族的分布關係密切，可藉以推求各種族之間的發展脈絡。在村落型態與姓氏關係的研究中，追溯源流後往往發現屬於同一祖先。

宗教信仰方面，他主張只要不妨礙正當信仰生活的任何宗教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舉辦具有文化意義的「民族祭典」。在宗教研究裡，他看見某些珍貴的文化保留於信仰儀式之中，認為有保存的必要；也考察了祭神的來歷，從宗教去了解先民生活的型態。其中保生大帝又稱大道公，由於姓吳，又是醫神，與他自身

¹¹³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四《南台灣采風錄》，台北：遠景，1981年，頁17。

¹¹⁴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四《南台灣采風錄》，頁129。

家族淵源及職業有關，因此他在改姓名運動中曾考慮將姓氏改為「大道」。當然他也注意到，日治時期的宗教壓迫在光復後發生反動，神像、寺廟、巫覡復甦，連帶使迷信風氣也一併重新流行，尤其在選舉中常見到神棍橫行，他以文化研究者的身分實不樂見此情形，以科學信奉者的角度更覺難以接受，顯然當時底層民眾與知識份子的文化認知落差甚大。

在研究台灣歷史發展的民俗雜考中，他講述了史前遺跡、陳第《東番記》及英人甘維霖《三百年前的南部台灣》等典籍記載、荷蘭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的一連串的演變。歷史眼光一旦拉長，接觸民俗學的面向一旦廣泛，才有可能以更包容的心態去看待台灣多元文化的歷史內容，擺脫「歷史為政治服務」的包袱，這是他在文獻研究中最寶貴的貢獻。

四、新舊版本日記的對照—以「參戰立場」及「二二八事件」為主

本小節的討論前半延續吳新榮國族認同的問題，選擇戰前對台灣應否支持參戰的態度。台灣當時屬於日本領地，勢必被迫加入戰爭，因此只能討論立場是否積極支持。後半選擇光復後對二二八事件的想法。此二事件最能明顯表現出現矛盾，或者說最容易出現隱瞞，我將試圖在新舊日記的對照中，探究吳新榮的想法。未註明新舊版的文字即代表新版日記，舊版則另外括號註明。

(一)參戰立場

吳新榮在戰爭初期尚處於觀察階段，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他開始思考戰爭對日本的意義。他在日記裡主張日本北進與南下，往北獲取油礦、漁場、森林；往南奪得米、砂糖、棉，擴張物資並在不破壞舊文化的狀況下建設新文化，最重要的是由「白人支配」改變為「黃種人之自由」。這樣的論調使皇

民化運動的推行，在他的心理層面上減緩了阻力，也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表揚。他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的日記中寫著：「今天早上九時半到街役場接受表彰狀，皇民奉公會本部長齊藤樹以「率先挺身國語(按：日語)普及運動，對奉民奉公運動貢獻良多」為由，對我表揚。生平第一次得到的表揚，對我來說，總覺得有點過份。」¹¹⁵對於獲得表揚感到「有點過分」，因為這種率先挺身日語普及的運動，並非吳新榮主動去推廣，而是自幼受日文教育影響，日語的運用早已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戰爭時期的日本語，已經不僅僅是溝通的工具，而是國家意識的表徵，因此政府除了硬性規定報紙廢止中文欄，更以頒獎、表揚的軟性推銷方式，製造一種輿論氛圍，強迫台灣人使用日文，從根基剷除台灣意識。在日本政府的藍圖勾勒中，只要台灣人一旦認同自己是日本人，就必須義無反顧全面支持日本發動戰爭。

初期戰爭的殘酷還沒有落實到台灣，後期則被迫進入全面備戰的狀態，實際上當時的台灣人並沒有選擇的餘地，伴隨戰爭慘況開始具體發生在周遭，他在日記中開始思考戰爭的意義。他在一九四三年的日記中寫著：「今天，台灣徵兵制度實施的發表，感到在我們身邊有不小的緊張逼來。下午有北門郡醫師會常會，全體人員都志願當南方派遣醫生¹¹⁶(舊版：強制全體志願充當「南方派遣醫」)，再次表現吾人之決心。」新版日記中寫醫生們都志願到南方服務，當時南方指的是馬來西亞、新加坡¹¹⁷等地。離鄉背井到異地做戰時醫療服務，要全體人員都志願參加，在人性邏輯上是不合理的。舊版加了「強制」二字，應該更為接近真相。

隔年他的胞弟遇難，這種心情更加明顯：「今夕，叔父回來了，也帶回了壽山遇難的噩耗。……這場戰爭就此讓人明白了一切。那就是我的親人是直接受到犧牲。當然，這類的犧牲早有覺悟，由此犧牲釀成敵愾之心，也沒什麼不合理的。」

¹¹⁵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1944年9月1日語，頁432-433。

¹¹⁶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 1943年9月23日語，頁213。

¹¹⁷ 自1941年起，日本陸續佔領：英屬馬來亞、北婆羅、沙撈越、新加坡、緬甸、香港、美屬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等地。

¹¹⁸(舊版：由此犧牲直到最後的勝利。)」新版的文字將個人悲慟擴大到家國敵愾之心，舊版文字只說「直到最後勝利」，在他心中，對日本能夠獲得勝利是表達信心的，因此胞弟的犧牲雖帶來痛苦，卻還是忍耐著這類的犧牲。這種情緒在吳新榮感覺到又要再次失去兄弟的時候最為明顯，他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記段落：「在此刻接到通知，壽坤弟的陸軍幹部候補生考是已合格。我家已犧牲了壽山弟了，現在還要把壽坤弟送上戰場，命運如此！」¹¹⁹這種無法接受可能再次遭受失去親人的打擊，也是後期他對戰爭態度的流露。約莫一個月後，動員令落實到北門郡，吳新榮在日記中寫道：「前天又下了動員令，郡下相當多人應召入伍，決戰下的要求，大家只默默地出發南征。」¹²⁰默默出發的氣氛深沉而凝重，日記中的字裡行間也看不到當初積極參與戰爭的態度。自一九三七年開始，到戰爭結束，整個過程長達八年，在這些文字紀錄裡，起先能看見吳新榮充滿進取的戰鬥火花，隨著步入苦戰，能感受到的是面對戰爭的無奈。切身面臨生死關頭，龐大的犧牲不得不讓他反思戰爭的意義。

(二)二二八事件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事件，它所代表的歷史意義是台灣人意識達到頂峰。衝突背後是積存一年半(1945/08/15-1947/02/27)以來的民怨，以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抗為主。國民黨從日本政府手中接收台灣之後，多數台灣人抱持信心迎接國民黨，也就是吳新榮日記中所稱的「祖國」。懷抱祖國夢的人包括林茂生、陳炳等人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圍捕殺害。陳儀政府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表面政治交涉，暗地裡通報國民黨政府增派援軍強力鎮壓，大屠殺過後緊接著進行秘密的清鄉掃蕩工作，藉此肅清確認的及有嫌疑的異議份子。進行掃蕩期間，

¹¹⁸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1944年2月18日語，頁383-384。

¹¹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1944年10月22日語，頁447。

¹²⁰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1944年11月20日語，頁453。

不少人被挾怨報復，或被冤枉而死，社會瀰漫「道路以目」的肅殺氣氛。

一個龐大的社會運動之形成，非單一事件就足以推動。以二二八事件而言，它結合許多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包括歷史認知差異(多數中國人認為台灣人是被奴化的日本遺民)、新的法治制度朦朧混亂、資源分配不均(本省人依然位居社會階層底部)、米糧問題無法解決、物價飆漲……等大環境因素，此外還有軍警濫用公權力，雙方語言不通(當時有部分台灣人說日文、部分台灣人說閩南語，中國人說中文)、宗教歧視……等普遍存在社會的狀況。政府無視彼此的文化落差，加以手段殘暴，許多台灣菁英跟知識分子慘遭殺害。吳新榮的日記全被搜查，被迫展開逃亡。他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記中難掩傷心地寫下：「遇此事變以來，我們漸覺我民族的前途，我們國家的將來難禁傷淚，任你一個人如何活動，也難加減的。所以我當然是要由政治方面全部退場。」¹²¹

這段歷史直到解嚴後才慢慢有人願意討論，但以現今課程而言，二二八仍然被討論得不夠完整，遑論吳新榮舊版日記出版時，這件事還不是可以任意公開討論的時候。因此在日記中，許多人名被塗抹，或常以英文字母代稱某人，造成判讀上的困難。當中的用字遣詞若有被查嫌疑，也一律略去，例如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的新版日記中寫：「台中廣播電台放送台中市民同情台北的同胞，已經起義了。」¹²²起義與叛亂，在心理認定上是截然不同的字眼，叛亂罪在法律層面上可處以極刑，而吳新榮選擇「起義」的敘述用字，透露他對二二八事變的同情。為免去不必要的麻煩，舊版日記裡省略了這一段文字，另外也省略了出現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新版日記中的人名：「陳長發、陳天賜、賴石成諸君會餐於吳敏誠宅，舉杯祝賀台北事件。」¹²³以及出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陳華宗、呂榮輝等人，避免國民黨政府日後清算的可能。關於時局委員會的名單，舊版日記直接省略記載，新版則可以得知清楚名單，地方有勢者如高文瑞等人皆參與其中。至於台南縣民大會中眾人提議罷免袁縣長以下四十七名的逃亡官吏，並通過代理縣長的提

¹²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八 1947年3月18日語，頁364。

¹²²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八 1947年3月3日語，頁357。

¹²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卷八 1947年3月2日語，頁357。

案，在舊版中也隻字不提。

吳新榮逃亡過程中，應有保持記錄的習慣。新版日記中他補述了百日出奔的日記，自三月廿二日起到六月廿一日出獄這段期間，先逃亡而後自首，幾經交叉訊問，輾轉移送到台北，當中也記錄了獄中友人的名字、出獄後為其父奔走保釋而拜訪各方友人，這些記錄在舊版中付之闕如。

新舊版本的日記內容，落差最大的部分在於二二八事件開始之後。一九四七年的舊版日記刪除了相當多的篇幅，觀察自百日入獄後的日記，剔除過後幾乎僅剩一個月一篇，至多三篇；對照新版日記，雖然並無每日連續記錄，但每隔幾天就會有一篇日記。可以合理推測的是，在這些刪除的內容裡，還有作者偶爾自行塗黑的十幾個字，因為牽涉到事件過程和親友名單，這些人名一旦曝光，可能遭受政府追查。

相較於其他被捕入獄的思想犯，吳新榮算是幸運的例子。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台灣南北各地群起的平民，甚至是集會中手無寸鐵的學生也慘遭殺害，大批被捕入獄的思想犯逐一被槍斃——即使有幸保住一命也不見得能回復正常生活，如日記中提及出獄後的呂榮輝不僅衰弱太甚，且罹患精神方面的疾病。朱昭陽在回憶錄裡說：「政府雖於三月十七日派白崇禧將軍來台宣撫，處理善後，宣言事件已告結束，此後不再追究，但繼之而來的『清鄉綏靖』和『白色恐怖』，使台灣社會瀰漫著恐怖肅殺之氣，把二二八當禁忌，視政治為畏途，沉冤長埋近半世紀之久。」¹²⁴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最大的傷害，除了殘酷殺戮社會菁英，更深遠的惡質影響是以特務治國，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恐懼並沒有隨著事件落幕，反而與日俱增。太多人在事件結束之後，無故失蹤或者陳屍橋邊，政府對留日歸國的知識份子戒心尤其更重。藉機株連的手段，目的在解散各類非政府許可的組織，比如「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就是其中一例，藉由羅織留日學生各項罪名圍捕入獄。當時只要與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牽扯上關係，即使是家中收藏此類

¹²⁴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前衛，1994年6月15日台灣版一刷，頁102。

書籍，都可能被調查或殺害。

調閱官方統計罹難人數僅 10324 人，然而由截至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總共 2265 位受難者獲國家賠償的資料中發現，最年輕死者是在高雄車站前於母親懷抱時，遭軍人以刺刀殺害的一歲兒童；最年長死者七十一歲，在家中無故遭軍隊槍擊，隔日傷重不治。至於非官方記載而枉死者不計其數，這些沒有被記錄的受難者，完全無法列入人數統計。甚至有些家屬看到親人名字出現其中，才明白當年失蹤的原因與二二八事件有關。根據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公告的部分受難名單中，如湯德章被凌虐遊街死後宣判無罪、陳澄波未經審判被槍決於嘉義火車站、台南縣參議員黃媽典在新營被槍斃示眾、教師黃阿銃處理遇害學生時被闖入校園的軍人帶走失蹤、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與「三民主義青年團」重要幹部的許錫謙遭埋伏軍憲人員捕殺、李瑞漢受張慕陶邀開會為由被誘捕後失蹤、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林旭屏自認沒做虧心事而照常上班，卻被軍人騙殺於南港橋下、強烈批判行政公署的王添灯遭審訊時被張慕陶淋汽油燒死、而曾擔任王添灯辯護律師的林桂端則被憲兵從家中帶走後失蹤、企圖與彭孟緝談判的涂光明經酷刑後被槍殺、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檢察官王育霖受盡酷刑被棄屍於淡水河、牧師蕭朝金鼻子、耳朵及生殖器都被割掉後遭槍斃、東京醫專畢業的潘木枝慘遭酷刑，曝屍街頭多日不許家屬收屍，其兒時值十五歲，為營救父親遭國軍射擊頭部中彈身亡、嘉義市參議員盧炳欽擔任談和代表而遭逮捕，被槍殺於嘉義火車站前……這些事例僅冰山一角，但已可想見政府以各種欺騙、誘捕、酷刑、當眾槍殺的手段，意圖造成人民恐懼，已經對台灣社會帶來深不可測的創傷。此後的歷史教科書對二二八事件諱莫如深，以我本身為例，若非進修研讀台灣歷史，從我求學時代中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可說是完全空白。學校不教，長輩不提，這段殘酷的歷史等於被強行抹除。直到民國七十九年高中歷史課本才首度出現二二八事件的描述，但也僅止於「查緝私菸」、「撤換陳儀，宣撫民眾」等語輕輕帶過，並沒有解釋事件生成的原因與後來的影響。民國八十三年，才開始加入事件發生前的社會狀況，總算有了比較清楚的輪廓，然而對於其後真正造成社會創傷的

白色恐怖，仍未作解釋；而且在敘述方面，事件責任完全歸咎於陳儀，而與蔣中正無關。事實上，陳儀當年聽命於蔣中正，從日後蔣中正對陳儀的處置，也可以知道不應將責任完全由陳儀一人獨挑，然而教科書關於這部分也不作任何評論與剖析。民國一〇四年爭論不休的高中課綱微調，在公民科「人權保障與立法」章節部分，刪除白色恐怖、良心犯等詳細舉例，改為「政府濫用權力對人民的迫害」以及「殖民政府對殖民地人民的歧視」；歷史科「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接收」臺灣改為「光復」臺灣等語。可以看到存在教科書裡的意識形態，從「中國化」演變到「去中國化」，再轉變為「去日本化」，這個發展脈絡隨著執政者的意識形態而不斷被改寫。雖然目前台灣社會的歷史觀、文學觀，仍然無法全面擺脫意識形態的包袱，但至少可欣慰的是，二二八事件終於能夠被踴躍討論。我這一代自小被長輩殷殷告誡：「切勿碰政治。」這是二二八事件所帶給台灣人民最深刻的遺毒。幸而新一代的青年已經開始覺醒，意識到政治所影響的範圍如此廣泛。從野百合學運、野草莓、到太陽花學運，都是重要的覺醒標記。尤其是太陽花學運甚至影響了香港的占領中環運動。發生在世界上的每一個事件看似個別獨立，然而串連之後，便能發現它們彼此之間環環相扣。試問，若不了解過去的歷史，又如何能走出自身的未來呢？閱讀吳新榮日記的過程中，可以清楚看見二二八事件在爆發之前，社會各層面的問題不斷累積的推進狀況，知識分子與台灣大眾從懷抱民主夢想，到錯愕，到失望，到憤怒，到恐懼，一層又一層的轉折，醞釀了深厚的反撲力量；也能看到事件過後對台灣社會造成如何深遠的影響，這是歷史給我們的寶貴教訓。

第六章 結論

一九八一年由遠景所出版的《吳新榮日記》，當時台灣尚處在戒嚴時期，對於敏感議題只能省略原文，且因是吳家自掏腰包出版，礙於費用昂貴，必須縮減篇幅，省去大半原文¹²⁵；新版的《吳新榮日記全集》則由吳三連基金會編印，台灣文學館出版，完整呈現了他的政治態度和文學創作觀，相較於舊版的二冊，新版的十一冊不僅內容豐富，更加入許多註解，在閱讀上增添許多便利。透過日記，讀者可以清楚了解他的政治立場如何影響他的創作方式，也能明白台灣當年寫實主義與唯美主義的對抗，不只是文學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他在東京時期的詩文創作，已經透露著強烈的馬克思主義，站在社會弱小者的立場，指涉階級問題，對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資本家與無產大眾等對立的概念進行批判。但文學作品對於反抗、厭惡的情緒往往經過隱喻、象徵等藝術手法處理，不如日記中直書胸臆，對人對事的態度朗朗如日。從另一個角度，日記也可以視為他文學作品的序，說明著作動機及主旨。

二戰時期，日本政府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吳新榮其實少有應制之作，但仍有支持戰爭的作品出現。在研究他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時，有時會發現不同的政治立場，早期鮮明的左派立場，到了二戰後期竟然透出右派影子，似乎充滿矛盾。然而日記裡的他，在日日的詳細紀錄中反覆游移，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並將這種矛盾置入戰爭時代的背景中，就能發現他的自我意識與政治認同其實是不斷流動、變化的。他以台灣人的身分接受日本教育，另一方面也認定自己與漢文化之間有傳承的血脈，台灣、日本、漢民族三種相異的意識形態及文化價值觀雜揉，在精神層面上，很容易導致國族認同重疊甚至混亂，在他的日記裡，保留了這些意識形態上掙扎的痕跡。

此外，戰後初期他滿懷信心與希望，積極參與政治，在某些提案中可看到他

¹²⁵ 這個說法是採訪吳南圖先生時，吳南圖先生之自述語。

要求開放糖廠所有曠耕地以救濟失業民眾，打破剝削政策的主張，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吳新榮又再次面對通緝、逃亡、入獄等遭遇，逃亡期間所作的新詩〈洪水〉，正突顯了他心如死灰的失望與無奈。出獄後他逐漸淡出政治界，也不再大量創作具有戰鬥意識的作品，如果純粹從文學作品推敲他的左翼思想，可能誤以為江郎才盡。實際上，吳新榮在日記裡所呈現的面貌相當聰明且鏗而不捨，懂得如何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求生存，因此他全心投入地方文獻考察的工作，以關懷土地、人民、風俗文化為基調，持續拓展左翼思想的另一種向度空間。若將吳新榮的作品與日記相互對照，既是時代的側寫，也揭櫫了當代知識分子身處世界洪流之所思所感，是台灣歷史，同時也是文學史上珍貴的紀錄。

鹽分地帶文學從日治時代吳新榮等人成立至今，已有七十年以上的歷史。鹽分地帶文學對台南地區的歷史文化意義在於反抗強權的精神、關懷大眾的寫實精神。戰後自一九七九年開始，當時台灣仍處於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杜文靖、黃勁連、羊子喬、黃崇雄、吳明雄及林佛兒等人籌辦了第一屆「鹽分地帶文藝營」，稟持傳承台灣文學香火、培育文學新血輪並鼓吹文藝欣賞與創作風氣之精神，已成為最具本土精神、歷史最悠久的文藝營隊。對於推廣鹽分地帶文學可謂不遺餘力。我曾經參加第三屆的台灣文史營，聆聽台灣文學發展之際，深刻意識到文學離不開人生，離不開土地，也難與政治社會完全切割。然而文學的定位應該是反映人生，而非為特定意識形態服務。

吳新榮在日治時期留下日記或的文學作品或議論隨筆，都包含在社會主義思想底下，存有一份對弱勢的尊重，這份精神是真正寶貴的資產。一九九七年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在中山公園內，設立「吳新榮紀念雕像」與紀念碑文，以感念並表彰吳新榮對文學與保存地方獻等貢獻。五都縣市改直轄市後，台南佳里區的北門高中於二〇一三年成立鹽分地帶文學社團，圖書館特別開闢鹽分地帶文學專區，這些持續不斷的努力，將延續鹽分地帶的命脈與使命，俾使後世子孫永矢弗諼，藉由研究過去的歷史得到改善現況的啟發。

就我個人的意義而言，我在研究吳新榮日記的過程中，一步步追尋「佳里」

這塊土地的歷史、文學。從台南負笈北上求學，又往回尋求故鄉種種被埋沒的記憶，像鮭魚返鄉。在一次次的南來北往之中，有股力量冥冥引導我悠遊歷史長河，要讓我遠遠繞一大圈，再回來重新認識自己的生長之地。夜深人靜撰寫論文之餘，抬頭凝視窗外月亮，銀白月光每每領我轉入更深沉的省思。我與吳新榮在不同的時空裡踏著同一片土，流轉的不僅是時間，還有不同世代朵朵綻放的思想。他所留下的的身影，之於我，是一種探尋，一種仰慕，更是一種對故鄉深沉而綿密的愛，我在這份論文的書寫中，意識到佳里就是家裡，而所有離開的目的，其實就只是為了回家，如此而已。從此，當我從外地回來，心底響起：「我回來了，佳里。」那種情感，除了回家的溫暖與舒適感，還承載了歷史的重量，深深拓印在這片土地上了。



附表：日治時期台灣漢學詩社統計數量。

序號	詩社名稱	序號	詩社名稱	序號	詩社名稱
1	二西吟社	2	三友吟會	3	三孝人家
4	大同吟社	5	大成吟社	6	大治吟社
7	大東吟社	8	大新吟社	9	小鳴吟社
10	小題吟會	11	小瀛吟社	12	中州敦風吟會
13	中南吟會	14	六桂吟社	15	天籟吟社
16	文山吟社	17	文峯吟社	18	斗山吟社
19	斗南吟社	20	月津吟社	21	以文吟社
22	北郭園吟社	23	台北鐘社	24	台南市詩會
25	巧社	26	玉山吟社	27	玉社
28	玉峯吟社	29	白水吟社	30	白沙吟社
31	白鷗吟社	32	石社	33	仿蘭亭
34	仰山吟社	35	光文吟社	36	共同吟社
37	同勵吟社	38	在山吟社	39	竹林吟社
40	竹林詩學研究會	41	竹社	42	竹城吟社
43	竹音吟社	44	竹風吟社	45	竹梅吟社
46	竹橋吟社	47	西瀛吟社	48	汾津吟社
49	牡丹詩社	50	酉山吟社	51	來儀吟社
52	奇萊吟社	53	岡山吟社	54	岱江吟社
55	怡社	56	明仁吟社	57	東州吟社
58	東吟社	59	東明吟社	60	東林吟會
61	東港詩會	62	東墩吟社	63	東興吟社

64	松社	65	松鶴吟社	66	芸香室
67	虎溪吟社	68	青年吟社	69	青蓮吟社
70	南社	71	南洲吟社	72	南陔吟社
73	南瀛吟社	74	奎山吟社	75	屏東詩會
76	屏嵐吟社	77	春鶯吟社	78	星社
79	柏社	80	柏社同意吟會	81	洛江吟會
82	珊社	83	苓州吟社	84	香草吟社
85	香草吟社	86	崁津吟社	87	書德吟社
88	栗社	89	桐侶吟社	90	桐城吟社
91	桃園吟社	92	浪吟詩社	93	海外幾社
94	海東吟社	95	留青吟社	96	笑園吟社
97	耕心吟社	98	荔譜吟社	99	茗香吟社
100	茗香吟會	101	高山文社	102	高崗吟社
103	高雄市吟會	104	堅白屋	105	婆婆會
106	將軍吟社	107	崇正社	108	御寮吟社
109	梅社	110	梅社	111	淡北吟社
112	淡交吟社	113	淡如吟社	114	淬礪吟社
115	琅環詩社	116	連玉詩鐘社	117	陶社
118	鹿苑吟社	119	猗蘭吟社	120	富春吟社
121	復旦吟社	122	揖子吟社	123	敦山吟社
124	斐亭吟會 (斐亭吟社)	125	斯盛社	126	無名吟社
127	登雲吟社	128	登瀛吟社	129	萍社
130	萍香吟社	131	萍聚吟社	132	華僑同鄉吟社
133	華僑鄞江吟社	134	菱香吟社	135	菽莊吟社

136	詠霓詩社	137	貂山吟社	138	鄉勵吟社
139	雄州吟社	140	集芸詩學研究會	141	集萍吟社
142	集賢吟社	143	雲峰吟社	144	莢社
145	新竹朔望會	146	新和吟會	147	新柳吟社
148	新聲吟社	149	新鶯吟社	150	新鷗吟社
151	溪山吟社	152	道東書院	153	鼎社
154	鼓山吟社	155	嘉社	156	旗津吟社
157	旗峯吟社	158	榕社	159	滬江吟社
160	碧潭吟社	161	綠社	162	網珊吟社
163	聚奎吟社	164	聚星詩學研究會	165	聚鷗吟社
166	鳳毛吟社	167	鳳崗吟社	168	劍樓吟社
169	潛園吟社	170	潮聲吟社	171	磋玉吟社
172	稻艚詩鐘會	173	篁聲吟社	174	蓮社
175	蓬山吟社	176	學甲吟社	177	曉鐘吟社
178	樸雅吟社	179	樹村吟社	180	穆如吟社
181	興亞吟社	182	興賢吟社	183	蕉香吟室
184	錦文吟社	185	龍文吟會	186	龍江吟社
187	龍珠吟社	188	應社	189	聲社
190	臨溪吟社	191	螺溪吟社	192	鍾毓詩社
193	藏修吟會	194	雞林詩社	195	瀛東小社
196	瀛社	197	瀨南詩社	198	羅山吟社
199	鵬社	200	麗澤吟社	201	櫟社
202	鯤水社	203	鯤社	204	寶桑吟社
205	礪社	206	鐘亭	207	鐘樓
208	櫻社	209	蘭社	210	鶯社

211	鶴社	212	鷺音吟社	213	灘音吟社
214	聽濤吟社	215	讀古山莊	216	讀我書社
217	鷗社	218	鰲西吟社	219	鷺州吟社

資料來源：全台詩社資料庫，序號依詩社首字筆劃由少而多排列。



參考文獻

一、原著

- 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台北：前衛，1991年。
- 吳新榮：《金唐殿善行寺沿革志》，台南：金唐殿，1963年。
- 吳新榮：《南鯤鯓代天府沿革志》，台南：南鯤鯓代天府，1967年。
- 吳新榮：《震瀛採訪錄》，台北：遠景，1977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一《亡妻記》，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二《瑣琅山房隨筆》，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三《此時此地》，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四《南台灣采風錄》，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五《震瀛隨想錄》，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六《吳新榮日記(戰前)》，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七《吳新榮日記(戰後)》，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全集卷八《吳新榮書簡》，台北：遠景，1981年。
- 吳新榮：《吳新榮選集》，臺南縣新營市：南縣文化，1997年。
-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十一冊，張良澤編，台灣文學館，2008年6月初版一刷。

二、專書

- 《台南縣文學史》上編，台南縣立文化中心，2006年。
- 《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5年。
- George Kerr 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前衛出版社，初版四刷，1992

年 2 月。

Shih-jung Tzeng : *From Hontojin to Bensheng Ren*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
2009 年。

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海峽學術，2006 年。

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上、下冊，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
年 12 月。

王曉波：《台灣抗日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1997 年 7 月。

台灣分館特藏資料編委會《台灣文獻書目解題》方志類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1985 年。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加州；蓬島文化，1980 年。

羊子喬主編：《郭水潭集》，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 年 12 月。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1992 年 3 月初版。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 年。

宋冬陽：《放膽文章拚命酒》，臺北市：林白，1988 年。

李若鶯、林佛兒：《鹽分地帶文學》，臺南縣新營市：台南縣政府文化處，2010
年。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臺北：自立晚報，1990 年。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 年。

林佛兒、羊子喬：《鹽分地帶文學選》，林白叢書 122。台北：林白，1979 年。

林忠勝撰，朱昭陽口述：《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前衛，1994 年。

林忠勝撰，陳逸松口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前衛，1994 年。

林芳年：《林芳年選集》，台北：中華日報，1983 年。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台原出版社，1998 年 1 月一版二刷。

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時報文化出版，1993 年 2 月 25 日
初版二刷。

林德龍輯註，陳芳明導讀：《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一

版二刷，1992年3月。

林慶彰等編：《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在中國》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4年12月31日。

林慧姪：《吳新榮研究——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歷程》。「南瀛重要作家研究文集」1，台南：台南縣政府，2005年。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高雄市：大眾書局，1976年。

施懿琳：《吳新榮傳》，南投：省文獻會，1999年。

張良澤：《吳新榮日記》，臺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年。

張良澤編：《臺灣文學評論》，臺南縣麻豆鎮：私立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2001年。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紀錄：《悲情車站二二八》，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一版二刷，1993年3月。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採訪紀錄：《台北都會二二八》，一版二刷，1997年2月。

張炎憲編：《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市：自立晚報，1994年。

莊永明：《台灣醫療史》，遠流，1998年6月。

莊嘉農：《憤怒的台灣》，前衛出版社，台灣版第二刷，1991年6月1日。

陳木杉：《二二八真相探討》，台北市：陳木杉，1990年。

陳永興：《台灣醫療發展史》，新自然主義，2003年6月。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

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祕史：霧社事件至抗日全貌》，台北：武陵，1983年。

楊碧川：《二二八探索》，克寧出版社，1993年2月。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1987年。

葉秀菊：《文學陳千武》，晨星出版社，初版，2004年3月30日。

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1971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5年。

蔡慧玉編：《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北：中央研究院，1997年11月。

蔡篤堅：《台灣外科醫療發展史》，台北：台灣外科醫學會，唐山，2002年。

鄭喜夫：《吳新榮先生年譜初稿》，臺中縣潭子鄉：鄭喜夫，1977年。

盧建榮：《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 1950-2000》，台北：麥田，2003年出版。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三刷。

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1997年。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時報文化出版，1993年3月5日初版五刷。

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臺北市：時報文化，1993年。

蘇新：《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時報文化出版，1994年。

涂淑君：《南瀛二二八誌》，台南縣文化局，2006年5月初版。

三、單篇期刊論文

王曉波：〈兩腳立地的醫生作家—論吳新榮和他的思想〉，《台灣史和中國近代民族運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6年。

羊子喬：〈鹽田裡的詩魂—日治時期台灣寫實文學的重鎮「鹽分地帶」〉，《第26屆鹽分地帶文藝營研習手冊》，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年。

吳文星：〈試論鄉土誌之編纂—以《頭城鎮誌》為例〉，《史聯雜誌》22期，1993年5月。

羊子喬：〈從鹽分地帶文學看台灣農村的變遷〉，「雲嘉南地區文學會議」，嘉義市立文化中心主辦，嘉義，1993年5月8日。

黃勁連：〈略述「鹽分地帶」的文學傳統〉，「雲嘉南地區文學會議」，嘉義市立文化中心主辦，嘉義，1993年5月8日。

陳千武：〈論吳新榮先生的文學思想〉，「吳新榮文學作品討論會」論文，1997

年3月15日。

陳芳明：〈吳新榮與日據時期左翼文學〉，「吳新榮文學作品討論會」論文，1997年3月15日。

葉笛：〈紮根於鄉土深耕的詩人——試論鹽分地帶的前輩詩人吳新榮〉，「吳新榮文學作品討論會」論文，1997年3月15日。

陳瑜霞：〈日治時期郭水潭詩歌——「融合」觀的形成及實踐軌跡〉，《南台應用日語學報》第3號，2003年6月。

侯作珍：〈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現代主義在新世代小說中的呈現〉，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東華漢學》第10期，361-394頁，2009年12月。

四、學術論文

王秀珠：〈日治時期鹽分地帶詩作析論：以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為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2005年。

王昭文：《日據末期的台灣知識社群(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及《民俗台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1年。

王美惠：《1930年代台灣新文學作家的民間文學理念與實踐——以《台灣民間文學集》為考察中心》，成功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所，2008年。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成功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所，1996年。

村田雄二郎《漢字圈的近代：語言與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

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8年。

李文卿：《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台灣小說集》為中心》，暨南大學中文研究所，2001年。

- 何義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台灣的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1986年。
- 余玉琦：〈詩人與戀愛—水蔭萍詩作中的女性形象〉，台師大《海岸線》第四期，2008年5月7日。
- 周麗娜：《台南縣佳里鎮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2003年。
- 林佩蓉：《抵抗的年代·交戰的思維—蔡培火的文化活動及其思想研究（以日治時期為主）》成功大學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2005年。
- 林宗賢：《十九世紀末日本輿論界之台灣論述—以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為研究對象》，政治大學日文研究所，2006年。
- 林素珍：《日治後期的理蕃--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1930-1945)》，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2003年。
- 林雅鈴：《日本皇民化政策與台灣文學的反動精神》，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2003年。
- 林蔚儒：《帝國左翼與台灣書寫——伊藤永之介台灣作品研究》，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8年。
- 邵每招：《論 1940 年代《南方》中新舊文學論爭的起因與發展》，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6年。
- 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8年。
- 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的面貌》，成功大學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2006年。
-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4年。
-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2001年。

- 崔未順：《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3年。
- 張雅惠：《日治時期的醫師與台灣醫學人文——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為例》，台北醫學院醫學研究所，2001年。
- 張靜宜：《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成大歷史研究所，2003年。
- 莊曉明：《日治時期鹽分地帶詩人群和風車詩社詩風之比較研究》，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8年。
- 許光武：《帝國之眼：日本殖民者與他的「它者」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5年。
- 許倍容：《30年代啓蒙「左翼」論述——以劉捷為觀察對象》，成功大學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2006年。
- 曾巧雲：《未完成進行式——戰前、戰後的皇民文學論爭／述》，成功大學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2005年。
- 黃修文：《世紀之交的臺灣糖業與蔗農》，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5年。
-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遠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4年。
- 趙勳達：《「文藝大眾化」的三線糾葛：一九三〇年代台灣左、右翼知識份子與新傳統主義者的文化思維及其角力》，成功大學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2009年。
- 趙勳達：《「台灣新文學」（1935~1937）的定位及其抵殖民精神研究》，成功大學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2003年。
- 劉方瑀：《被選擇的台灣——日治時期台灣形象建構》，成功大學文學院歷史研究所，2005年。
- 鄭雅黛：《冷澈的熱情者——吳新榮及其作品研究》，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年。
- 賴松輝：《日據時期台灣小說思想與書寫模式之研究（1920-1937）》，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2002年。

簡明海：《五四意識在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2008年。

簡炯仁：《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抗日運動：台灣民眾黨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1977年6月。

羅詩雲：《郁達夫在台灣：從日治到戰後的接受過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8年。

徐千邦：《日據時期檢閱制度下的台灣左翼文學》，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3年12月。

五、其他

洪培修：〈吳新榮詩作的「台灣意象」之地方現代性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